

新中國

新中國

36

李亞譯 斯特朗著

北京書店發行

新波蘭遊記

著士女郎特斯
譯亞 李

行印居書世東

新波蘭遊記

著者 斯特朗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哈爾濱 佳木斯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延吉 富錦 勃利 鄭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輝南
肇東 安遠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每冊定價 一元〇〇〇

民國卅六年十月一日初版 5000份

關於作者

安娜露意絲·斯特朗女士，一八八五年生於美國的尼布拉斯卡，父親是一位教師，母親是早年少數女子大學畢業生之一。斯特朗女士自己是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得到哲學博士的最年青的一位女士。一九〇八年她自學院的研究轉向兒童福利的實際工作。在當地學校積極地工作了一個時期之後，她成爲西雅圖工會報紙的專欄編輯。一九二一年她至蘇聯，並且那以後長時間住在那裏做美國報紙的記者。一九三〇年她創辦了「莫斯科每日新聞」。她曾在美國的威斯里、哥倫比亞、斯丹福等大學教過書。寫過十幾本東西，包括評、小說、論文，最多的還是報告文學。

斯特朗女士一九四六年來中國時，九月初在人民的城市張家口住了兩個星期，十月初來東北解放區住了一個星期。之後又訪問了晉冀魯豫的邯鄲。然後轉至延安，直到國民黨不顧一切進攻延安之前，才依依不捨的離開那裏。

斯特朗女士今年已經六十多歲了，一頭銀白色的頭髮加上慈祥的面貌令人倍覺可親，尤其可

傾的是她的工作精神，有時簡直爲年青的男人所不及。美國名記者史諾先生甚至稱她爲「不會疲倦的斯特朗」。

她爲人熱情，富於正義感，對於勞苦人民有着深厚的熱愛，對於帝國主義的虛偽欺詐有着切齒的憎恨，當美帝國主義者以「調處」爲名實際進行援蔣內戰的時候，她是唯一的一位外國記者敢於當着美國的將軍上校們面斥其非，並且揭發這些衣冠禽獸的陰私的。

「新波蘭遊記」是她最近的一本著作，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預料不久的將來她可能會再寫一本關於中國人民，特別是解放區人民的報導的。

前 言——爲什麼去波蘭？

當幕幔垂下，電燈照耀在水晶掛燈上的時候，邱吉爾和斯大林一起站在政府包廂裏，爲足尖舞而響起的一陣掌聲，突然轉移到莫斯科歌劇院的後部中心，並且掌聲增高成爲一陣突發的雷鳴。各聯合國的外交官們，穿制服的盟軍人員們，都從他們的座位上站了起來，一致熱情地向首長們歡呼致敬。轟在走廊欄杆上的蘇聯官員和受過獎勵的工廠工人們，也狂熱地歡呼。

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的那一個晚上，是我在戰爭以來的這許多年當中，第一次感覺到莫斯科的那種緊張空氣鬆弛了。英國首相爲了參加一個正在制定我們戰後世界共同綱領而召集的會議來到了莫斯科。當他公開與斯大林然後與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握手，並向那擁擠的戲院中的掌聲躬身答禮時，一種和諧——不僅是從樂隊發出的——充溢在空氣中。在殘酷的戰爭廢墟上，透進了一息未來的和平氣息。

幾天過去了，討論比大家所預料的拖得更久。很容易猜到是爲什麼。我們這些記者並不需

要英國參贊在他每日記者招待會中有一天暗示說，「因為首相把他五分之四的時間都花在波蘭上」，就知道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知道倫敦波蘭政府的首相米柯拉茲克坐了邱吉爾的私人飛機來了，在波蘭從事實際工作的主要人物貝魯特和莫拉夫斯基也從盧布林民族解放委員會飛來了。四方面的商談正在進行着。由於一貫堅執他們正在「進展着」，顯然他們還沒有達到目標。最後，當邱吉爾在英國使館的大書房裏，面對着一爐喜氣洋洋的柴火，在英國歷史上各代君主威風凜凜的畫像下接待我們，並以講述波蘭戰爭的回憶來款待我們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波蘭除了若干一般的問題外，尚在「不能發表」的階段中。

波蘭並非新的爭執點。自從中世紀以來，它就一直是戰爭的一個目標或泉源。在那決定命運的一九三九年夏天，當波蘭拒絕了蘇聯的援助以反對希特勒的建議後，因此中斷了英國、法國和蘇聯之間的軍事商談時，它就同時為戰爭的目標及泉源。盟國商談的破裂給第二次世界大戰扭開了綠燈，而波蘭人就做了這個戰爭中首當其衝的犧牲者。在整個五年戰爭中間，仍然是這個波蘭政府與莫斯科之間未解決的分歧給同盟國的團結投上了陰影，並威脅着未來和平的穩定性。

把英國首相帶到莫斯科來的最急迫的問題就是三分之一波蘭土地的解放。一九四四年夏天，紅軍向西推進並且在維斯杜拉河岸上建下陣地，正準備着繼續前進。在蘇聯所組織的一支十萬波

蘭人的波蘭軍隊也參與了這些勝利。蘇聯政府正式宣佈紅軍不預備在波蘭建立任何行政機構，而認爲它自己是「在一個獨立的，友誼的同盟國的領土上」與波軍合作。到此爲止諸事如意，但這並不能解決下面的問題：蘇聯與什麼波蘭當局辦交涉？它將承認什麼波蘭政府？

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仍然被英美兩國承認着。它對蘇聯的敵視一貫繼續着而且衆口昭彰。它認爲紅軍的前進是侵略而非解放。蘇聯政府最後與倫敦的這些波蘭人斷絕了一切關係。除非波蘭境內一些反希特勒力量能團結鞏固，並以同盟國的姿態來對待紅軍，否則波蘭在它被解放的一刻可能沒有任何政府，並且陷在內戰的混亂中。

波蘭境內有遠見的波蘭人看出這個局面，便於一九四三年除夕的夜裏和一九四四年元旦的清晨在華沙的一個秘密集會中組織了克拉熱瓦·芮達·拿若多瓦（波蘭國會），從二十餘個地下組織——包括政黨和游擊隊——派來的代表們積極從事於抵抗納粹和歡迎同盟解放者的紅軍的工作。他們宣佈擁護一九二一年按照民主法國所制定的波蘭憲法，並反對一九三五年由一個崇拜納粹的軍事集團所火速通過的憲法，該憲法給倫敦波蘭人的權力造成了合法基礎。他們決定了地下黨的黨綱和芮達（會議），預備在解放的那一刻即執行職務，並組織一支由游擊隊改組的地下人民軍——隨時準備與紅軍配合行動。

這個新組織致向各國的敬禮於一九四四年正月由一架電力薄弱的電台向莫斯科，倫敦和華盛頓播送，但顯然並未播送到。因此，在組成了若干地方芮達與人民軍支隊之後，新的芮達就遣派了一個代表團通過前線到莫斯科「與各聯合國政府連絡」。莫斯科的英美大使館很少注意——那時是一九四四年五月。但斯大林立刻看到這個芮達可以幫助紅軍經過波蘭的反攻，並且可以解除蘇聯需要在一個友善的隣國領土上建立軍政府的困難。他與他們商談，並將武器送給他們的人民軍。

七月裏，當紅軍進入波蘭時，這個芮達·拿若多瓦——在德佔領區依然是地下組織——便在盧布林建立起一個民族解放委員會，在解放區執行政府職務，蘇聯承認這個委員會為事實上的內政當局，並且甚至把那在蘇聯所組織的有着優良裝備的十萬波軍移交給芮達統轄。倫敦的波蘭人斥責着芮達與委員會是莫斯科的傀儡。因為這些倫敦的波蘭人依然被英美承認為波蘭政府；世界輿論便爆發出極辛辣的討論。這局勢已嚴重到使英國首相不得不到莫斯科來，並在那裏進行長時的商討。

我們當時還不能料到這些商討要拖上八個多月，比戰爭本身還更長些，而且引起了克里米亞會議與在舊金山各聯合國的注意。這些商談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底以蘇聯所承認的芮達為基

礎，加上英美所建議的一些知名人物成立了全民團結的臨時政府時才得到解決。

對我來說，波蘭是面對着整個歐洲許多問題中的最尖銳的一個例子。怎樣在納粹留下的混亂中產生出若干新的政府來？他們怎樣可以把他們的人民團結成若干民主國家？那些與本國隔離了五年的流亡政府到底可以演怎樣的角色？這些新國家將採取什麼政策來消除希特勒的歐洲？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和什麼樣的政體？他們與西方各民主國的關係如何？與蘇聯的關係如何？是否他們的不可避免的内部衝突會擴大他們與大同盟國之間的國際磨擦？或者他們在自己的國家中爲調合民主的各種理想而做的許多實驗將有助於各國之間更廣泛的了解？

我想到波蘭去的欲望開始於當英國參贊很神氣地告訴我們邱吉爾把他這麼多的時間都花在該國身上的時候。假如波蘭人真是那麼重要的話，那麼該是找出其原因的時候了。我在莫斯科英美大使館的圖書館中尋找材料。我找不到任何關於波蘭的書籍，唯一所能得到的經過編輯的材料就是大英百科全書中的一篇文章和世界史百科全書中的幾節，兩者都是幾年以前出版的。我驚異於出版知識的貧乏。於是我說，讓我們來寫一本關於波蘭的書吧。

我碰見那些到莫斯科來開會的波蘭人。他們屬於兩種十分不同的典型。從倫敦來的波蘭人聽動講究；他們可以在一些不肯定的事實上造起高樓大廈來。在他們要求東部地區這一點上，我緊

緊追問他們。我自己在一九一二年曾爲「美國女人服務社」在波蘭工作過，並且看到過那些烏克蘭與白俄羅斯農民的悲慘的村莊，這些農民比波蘭大地主統治下的農奴並不好多少。但是倫敦的波蘭人狡猾地歪曲了這些事情。他們使我相信波蘭人都是圓滑的外交官，除非是另外一個波蘭人，別人很難玩得過他們。

從盧布林來的波蘭人——後來從華沙來的——使我相信了迥乎不同的事情，那就是波蘭人可

以是坦白和誠實的人們。不是我們心目中半封建的東歐的那種類型，而是我們在西部美國平原或世界上任何有辛苦單純工作做的地方所碰見的那類型。他們看起來是現實主義者和具有現代思想的人。他們明白，像波蘭這樣大小的一個國家，不能利用一個強國對抗另一個強國的手腕來使自身富強起來，而必須和它東邊的巨大隣人友好共處；並且不管過去的若干衝突影響了這一點，這些衝突必須趕快解決，不容其繼續存在。他們打算建立一個民主的波蘭，並且要獨立，或者至少要在今天這個相互依賴的世界中儘量達到做爲一個國家所能有的獨立。

這些問題不僅僅是波蘭的，也是我們大家的。目前波蘭正以一種新的方式直接面對着這一切。所以當他們邀請道：「來波蘭吧，你自己親身看看我們的困難以及我們的對策吧，」我就決定一行。

目 前

關於波蘭當前諸問題直接報導的迫切需要，使我寫下我在那個國家所看見及經歷過的這個簡單的敘述，其中有最低限度的歷史參考，以便使這些經驗可以使人了解。我有那使我成爲美國或西方世界唯一的一個作家在這樣一段時間到這波蘭的好運氣，這段時間波蘭人來日也許會認爲是他們歷史的一個新的開始。

斯普蘭 ·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

目 錄

關於作者

前 言——爲什麼去波蘭？

第一章 到波蘭去的外交車……………一

第二章 盧布林……………二六

第三章 盧布林的食伴……………四八

第四章 國家的首長……………七一

第五章 波蘭新軍……………九五

第六章	華沙前線	二一六
第七章	波爾的起義	二三八
第八章	土地改革	二六六
第九章	拉金	二八八
第十章	一個政府誕生了	二一二
第十一章	華沙——首都	二二二
第十二章	他們站在一起	二四四

新波蘭遊記

斯特朗女士著
李亞譯

第一章 到波蘭去的外交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把你的行李拿到首都飯店前面的行人道上。飛機馬上就起飛。我們的汽車路過時會把你帶上。注意車前面的紅白色的旗子。」

莫斯科的波蘭大使館在電話中這樣講。帶着愉快的把握，我匆匆忙忙的跑到鋪滿寒霜的行人道上來。飛機只要四小時！下午就到盧布林了！一個和善的使館搬運伙把我的行李提到他那兩大捆「必須馬上送到盧布林去」的「重要公文」上面去。在這些公文裏可能有些什麼的這個思想使我緊張興奮了起來，我忘記去注意那泥污破損了的外部包裹；這些包裹可能已經告訴了我應該做何種預料了。

我們在飛機場坐等了三個鐘頭。他們說：「彼斯克上空有霧。」中午，我們又回到首都飯

店。「現在太晚了，今天飛不成了；我們明天再來看吧。」那個搬運快這樣說，他已經連續三天早晨都去過飛機場。「敘斯克上空的霧」是慢性的。從莫斯科到波蘭的飛行要經過歐洲最大的沼澤地，幾百方哩的潮濕地帶。在這裏從波羅的海和遙遠的大西洋海灣來的潮濕的風遇到俄羅斯平原的寒冷。但是這種慢性的霧並不厚；它常常可能在中午時散去。所以每天我們到飛機場去等待，因為還有幾小時的希望。正如同莫斯科與波蘭之間的一切別種形式的霧也有幾小時就澄清的希望。

我第四次的嘗試却不同了。頭一天晚上波蘭大使館慶祝波蘭獨立紀念日的晚會，把每個人都弄得很晚。我們到達飛機場的時候，發現螺旋槳正在轉。離我們兩百呎遠的地方，飛機正要起飛。但是機場的門已經關了，並且衛兵不讓我們通過。我們眼看飛機帶着一陣煙起飛去了。

「爲什麼你不坐火車去呢？」在波蘭電訊社——簡稱波社——裏他們問我。以前我會拒絕坐火車去，因爲我知道，在戰時的情況下面坐火車至少要三天；但是「坐飛機去」的結果我已經用去四天了。以後我得悉一節外交車要到盧布林去，載有金·德雷巧夫斯基博士，當時是在莫斯科的波蘭代表，（現在是在法國的波蘭代表），莫德奇列夫斯基上尉，當時是波社的負責人，（現在升爲上校，爲駐蘇聯的波蘭大使），幾個從維爾納和勒佛夫來的教授，準備去參加民族解放委員

會的，還有幾個要去波蘭軍隊的波蘭軍官，三天外交界的舒適加上談話到也不壞。

那一天晚上我在一個燈光陰暗的車站上摸索而行——莫斯科嚴格地執行了燈火管制，雖然離開前線還有三天的火車路程——並且在一個「硬座位」的普通車廂的進口處發現了熙熙攘攘的一羣人，這真使人大吃一驚，車是老式的一種，上舖放下來的時候，下舖的人就不能完全坐直。木製的臥舖上薄薄的墊子算是對外交官唯一的優待了。沒有什麼別人在訴苦，所以我也就把我的睡覺口袋加舖在墊子上。謝天謝地我佔了一個下舖。

開頭我對於我的行李的數量感覺得難為情。除了我的睡覺口袋和一個放在枕頭下面盛着三天口糧的小盒子外，我有一個老式的大箱子，一盒紙，打字機，還有額外的口糧，都堆在車廂裏上層的空架子上。這些東西不是我一個人所能攜帶得了的，這對於到戰地去旅行是很不合適的。當另外兩個女人，每人都帶着有我兩倍那樣多的行李走進來的時候，我良心上才覺得過得去。「搬運快這樣命令着我，於是我才發現我的下舖也有一個放行李的大格子。」

這兩個女人開始安排她們自己。一個是一位波蘭官員的漂亮太太，這位官員在蘇聯做了五年流亡者，現在正帶着家裏的一切回到盧布林去。另外一個是一位中年的教員，以前在華沙，她曾在西伯利亞過了五年，現在也正在回去。正在火車剛剛要離開的時候，一個黑頭髮的猶太女人走

了進來，後面跟着兩個搬運快，提著八件行李，其沉重的樣子說明裏邊有不少書籍。

另外的兩個顯然往後退了一點。這究竟是因為過於擁擠的自然反應呢？還是由於對新來者的種族的反感呢？跟着她們的態度變成幾乎太顯痕跡的接待，好像她們正在自覺的說：「現在波蘭應該是民主的了！現在猶太人也是平等的公民了！我們在蘇聯的五年不是白過的！」

最後四隻箱子放到這位新來者的舖上了——就是在我上面的那張舖。這一下子使得她在整個旅程中不能伸直了身體。這也就是說，她的舖永遠不能提起而我也就沒有時候能夠完全坐直。

一共四天，不是三天，我們在一條尚未完全修好的鐵路上顛波向西南行進。經過敏斯克的幹線不是被損壞了，或者，可能性更大一點，就是被紅軍在用着；自然，他們不告訴我們究竟是哪個原因。我們繞了一個大灣子，經過基輔。一千哩的被蹂躪過的土地，燒焦了的村莊，只剩下了陰森的骨頭架子的城鎮，破壞了的橋樑，燒過的鐵路車站。在西歐沒有可以和這相比的地方，那裏的德國人在某種程度上還遵守了所謂戰爭的若干法律。在所有斯拉夫的土地上他們執行的是——一個消滅整個民族，趕走所有牲口，驅逐一切居民，並且把剩下的全付之一炬的政策。

曲身臥在我那離窗最近的床舖的一角上，我聽着這幾個女人關於戰爭對於家庭生活的影響的談論。我進入了一個內心的世界，其悽慘和我們的火車所正經過的外面的廢墟一樣。

「我姐姐的六歲小男孩一直想加入軍隊，一波蘭官員的太太說道：『他看到他父親就在他們的家門前被殺死。他老舅祈求士兵們把他帶走。他跟他母親說：『媽媽，我一定得去。』』」

那位官員認識一個人，他把他的妻親子殺了，爲了使她不致落到敵人的手裏。「他們正在逃過一片離奧瑞爾不遠的土地。德國人就要追上他們；那個女人跟不上。男人想幫助她，但也沒有用。所以他就把她射死，然後自己跑到森林裏去加入了游擊隊。兩年以後他告訴了我這事，一面說：『當時只能這樣做。』」

開頭，猶太女人說得很少，直到第二天早晨我們才聽到她的事情。她是一個醫生，當德國向蘇聯的進攻開始時，她正在奧德薩出席一個醫院會議。她向東逃到中央亞細亞。她的丈夫，她的母親，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的小孩子們全在離勒佛夫不遠的一個小鎮裏被殺。

「在英國和美國，你們覺得很難相信這些故事，」她正在直接對我說：『但這一點也不使我驚異。當我正在離薩馬干不遠的一個集體農場裏做醫生的時候，我自己也不相信這些。我甚至不去讀那些關於種族暴行的官方報告。後來紅軍解放了我的家鄉，於是得到直接的消息，只有一件值得安慰的事，那就是他們都死在家鄉，並且死得很快。德國人來了就殺，他們沒有受到長期的折磨，不像那些被拖到像梅丹涅克那樣的死營裏去的人們。』」

在基輔，我們的車停到一條大道上去，等候掛往盧布林。我到城裏去看看那浩克萊斯卡提克一帶的廢墟，那彎曲的市街的美麗曾經一度聞名世界，德國人把建築物會有系統的加以破壞，在他們離開以前縱火焚燬。一羣一羣的德國戰俘正在清理着破磚亂瓦。大多數的烏克蘭人在走過的時候，看也不看他們一下。

我到旅行社裏去找史諾（西行漫記的著者——譯者）；他因為有一個特殊的機會去基輔比我早一天離開莫斯科，却不知道我去波蘭的途中也闖到了基輔。史諾出去了，但是由於我的打聽，經理相信了我，並且認爲做爲史諾的朋友，我有權在他的旅館裏吃早點。我給自己和陪我來的波蘭軍官都要到了煎雞蛋和菜——兩天以來我們第一次的熟食。

漂亮而樣子聰明的維爾克上尉，肩上有三顆星。長年的集中營生活——先在法國後在非洲——在他身上留下很少的痕跡。他很早就參加了對納粹的戰爭。一九三七年他在西班牙作戰。西班牙的民主遭到打擊以後，維爾克是逃過法國邊界因而被捕的一個。後來，當德國人佔領了巴黎的時候，他被送到非洲，在沙漠地裏迭破拖石頭，每天只有五小片麵包和兩盤稀薄的菜湯。

「差不多有兩萬波蘭人爲西班牙的民主而戰鬥過，」他告訴我，「只有十幾個人逃得性命。」

一九三九年越過法國邊界的時候，我們是一千五百人。我們被送到非洲去的時候是兩百人。集中營的指揮官是一個法國法西斯，他親自用他的手杖打囚犯。他恨我們，因為我們在西班牙的戰鬥。

當美國在非洲登陸的時候，在集中營的波蘭人做爲「多姆勃勞夫斯基縱隊的殘餘」，聲請現在願意爲波蘭而戰鬥。從倫敦波蘭流亡政府來的一個代表告訴他們說，由於爲西班牙愛國者而戰鬥的緣故，他們已經失掉了波蘭公民的資格，不過他要一個一個地把他們調查一下。

他問道：「你們願意對斯大林作戰嗎？」

「但是他是我們的同盟者呀！」他們抗議。

「政治不是你們的事情。當兵的叫你們在那裏打仗就得在那裏打。」對於他們的可靠性不信仰，他只接收了很少的幾個。其餘的人被放進了一個英國的勞動營。

最後，一個蘇聯的領事到了非洲。關於正在組織着的波蘭軍隊的消息傳了開來。「我們馬上白願參加。但是不知什麼地方的什麼人在從中作梗，因爲得要一年的時間才能從這些勞動營裏面放出去。終於我們可以走了。在蘇聯，他們把我訓練成爲一個駕駛員。我已經在波蘭空軍裏作戰兩個月了。這是第三次我設法爲波蘭而戰鬥：一次在一九三九年從法國，一次從非洲，現在是從

蘇聯。只有蘇聯人允許我們去戰鬥。就在第一次戰鬥中，希布諾，我們國際縱隊裏面的一員，就得了「蘇聯英雄」的勳章。」

在我們回到車上去的時候，他又加上道：「一百五十年以來——自從柯蘇斯科爲你們美國革命而戰的時候起——一直不斷地有波蘭人爲了別的國家的自由而戰鬥。現在我們應該得到爲波蘭而戰鬥的機會了，並且要使波蘭真正得到自由！」

過了基輔我們就成爲一列貨車的一部份了；我們這節外交車廂被夾在兩輛乾草車之間。我們在曠野中常常停下很久，地上不是雪就是泥。車變得冷了起來，燈和暖汽設備沒有一樣是好的，玩笑開了起來，說我們在「等待馬匹」，或者「盧布林的乾草供應還够兩天用的，所以我們仍無須前進」。我們全帶了食物，但全打算着路上可以找到開水沖茶。平時供給開水的車站，全被破壞了；我們車長最大的努力也不過一天給我們一次茶。

乘客之間的溫暖補償了身體上的不舒適。他們都是流亡者，正從世界各地回家去。他們從一間屋子串到另外一間屋子，彼此結識並分享吃的東西；他們看見我——一個美國的同盟者——也正到波蘭去，似乎很高興。

和我同車廂的那有褐色頭髮的紗師，曾在一九三九年從華沙逃到勒佛夫，一九四一年又從勒

佛夫逃到西伯利亞。「以前對於這不幸我們常說是『兩次的倒楣』。但是現在我們說『兩次逃亡』了。」顯然後並沒有失去她的幽默感。

海林——這是她的名字，至於她的姓我怎麼也念不出來——在她長期的轉移中受了不少苦，但也學到了許多。「那是第一次我親自碰見蘇聯的人民，並且他們非常和善和良好。他們在每一個站上都有廚房供給我們食物；他們看起來很能了解，不得不離家而逃亡的人們的感情。但是站與站之間的極大極大的空間使我害怕；那些廣大寂寞的原野使我緊張起來……」

「當我到了米瓦師並且看到那些蒙古型的面孔時，我覺得我是到了世界的末端了。但那學校負責人的談吐却和一個歐洲人一樣。他很高興我會德文和英文；他讓我選舉隨便教那種語言……我和那些米瓦師的孩子們有些困難，他們拒絕學那種『純粹的語言』，雖然儘管我解釋說這也是歌德和雪萊的語言。我現在不會那樣做了。想到梅丹涅克和特雷姆布林卡那些死替，現在我自己也痛恨德國語言了。但是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那時我想只有少數納粹應該對這一切負責。」

一九四二年夏天，海林在一個農場上工作。「那個夏天每個人都到農場上去工作，同時我也帶和孩子們更親近一些。」第二年她加入了「波蘭愛國者同盟」，同時在一個波蘭學校裏教書。「就是在那個時候在蘇聯的波蘭人開始聚集起來。高達·瓦西列夫斯卡（虹的作者——譯者。）

出版了一種波蘭報紙，我就給它寫東西。他們還組織了一支波蘭軍隊，並且許多我以前的學生都加入了。兩個和我一起從勒佛夫逃出來的學生已經在戰鬥中死去，另外一個在攻佔普刺格的時候失去雙腿。海林深深地歎了一口氣；接着她又開始道：

「我準備回波蘭做一個教員來使波蘭民主。使成年人變成民主主義者比較困難，但是我願意把孩子們造就成民主主義者，這將是我的工作。」

在隔壁車廂裏的，馬祖爾教授，準備代表勒佛夫的波蘭人到盧布林去。他是一個高而瘦的人，帶着思想家的前額，但是在他那消瘦的臉上有若若下深深的線條。他那皺襞的外衣——從前質料和剪裁都是極考究的——寬大的掛在他的身上，好像他比以前瘦了不少。從一九三〇年起他就是勒佛夫大學算學系的一位教授，他曾口語了這個城市近幾年來多變的歷史。

「一九三九年我們這個城市抵抗了德國人整整一個禮拜之久。隨後紅軍從東邊來了。勒佛夫城防司令投降了蘇軍，並且說：「波蘭政府跟着參謀本部走了，並且我也沒有接到命令和蘇軍作戰。」我們大多數在勒佛夫的人那時想，紅軍和德國人之間會馬上發生衝突。紅軍裏面許多人也這樣想。但是德國人撤退了，並且邊界做成後，使勒佛夫落在蘇聯這邊，那時城裏擠進來幾十萬難民。」

馬祖綱對於他的大學在蘇聯管理下那兩年的發展，表示滿意的驚奇。「我們的物理算學系從三個全時教授增加到十個；我們從華沙得到一些教授，還由勒佛夫得到一個猶太教授和一個烏克蘭教授，後二人由於他們的國籍，在戰前波蘭是不能取得這樣的職務的。我們的畢業生以前找不到職業，那時收入很好。甚至學生也有津貼。講授用波蘭話或烏克蘭話，隨教員的選擇。那以後德國人來了，並且關閉了一切。

「第一天，五個我們的算學教授就被槍斃了。別人都藏了起來；我自己也藏了兩年之久。我總想找有兩個進出口的地方，一旦警察從前門進來，我就從後門逃走。我的兩個妹妹協助了我；她們一個嫁給了一個麵包師，一個嫁給了一個商人。這種人尚不敢被追捕得很急，因為德國人特別想消滅波蘭的知識份子。當德國人來的時候，勒佛夫有三十位程度不同的算學教員。現在只剩下十五個了。

「三個我們的算學教授——巴拿赫、柯拿斯特和奧爾利茲，都給維格爾教授的抗傷寒研究做了一「蟲子的食物」，那裏從蟲子的身體製出血清來。製造的手續非常昂貴，而且產量只够德國軍官用的。蟲子一定得用人體來喂養。這些教授們每天去讓蟲子咬五百口。六個月之內他們全都病了。」

馬祖爾說，在那塊以前是東波蘭而現已變成西烏克蘭的土地上，有一百多萬的波蘭人正被允許來選擇他們的國家。他想像如他們被保證有職業或土地，他們大多數人是會回到波蘭來的。勒佛夫之沒有劃歸波蘭使那個城市裏的波蘭人「大為波動」。「但是你又有什麼辦法呢？在這個與我們的歷史和文化有悠久關係的城裏，波蘭人佔主要地位，但四郊却是烏克蘭的。勒佛夫是在一爾烏克蘭海洋中的一個波蘭的島。」

很高興在這個爭辯重重的問題上得到一個算學家的證明，我們馬祖爾關於那些彼此矛盾的人口數字。大英百科全書說在一九二一年「勒佛夫省」有百分之五六·六的波蘭人。別的權威，包括倫敦泰晤士報，又說戰前東波蘭在一千一百萬人口中只有二百五十萬波蘭人。

「這些數字並不像表面看起來的那麼矛盾，」他回答道。「看你在什麼地方劃界線。在東波蘭佔主要地位的常常是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按照凡爾賽條約，這塊土地沒有給波蘭。那時在英國卡頓停上下面的一個委員會研究出一個按照種族而劃出的界線，這以後就稱做「卡頓線」。線的東面，波蘭人只佔少數，泰晤士報的數字是對的。但是那裏的地主都是波蘭人；在他們的影響之下，皮爾蘇斯基政府在一九二〇年用戰爭白蘇聯搶來那塊地方。大英百科全書所給的勒佛夫省的人口數字是把西面的一塊波蘭地區包括在內而計算得來的。一九三九年，蘇聯在他們自己劃

在森河的德國人之間劃定了一條戰略上的界線。現在蘇聯正在把這塊土地的若干地區還一部分給波蘭。要決定這樣一個界線是不大容易的，因為烏克蘭人和波蘭人彼此交錯在一起。

「假如馬祖爾教他自已還是打算留在勒佛夫還是永遠的回波蘭，他回答說他還沒有決定。假如我們真能建設一個民主的波蘭，我願意參加到它裏面去。假如波蘭仍然像戰前一樣，那麼我將要繼續留在勒佛夫，那兒我有一個好的職業和一所好的房子。不管在那種情形下面，我希望戰後關係不要在國與國之間造成鐵柵。」

德姆伯夫斯基教授面對着一個類似的問題。他是動物心理學界裏一位著名的生物學家——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在美國伍茲侯爾的海洋生物學站，他曾在羅氏基金會下面工作過——他的名字落在以暗殺者稱的維爾諾內地軍恐怖主義者的黑名單上。因為這個原故，最初他不大講話，並且有點緊張，基本上是一個不願意參加政治鬥爭的科學工作者。他到盧布林去協助組織科學教育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他將留在波蘭或是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人家給他一個很好的科學職業。

「經過三十年的科學工作以後，」他終於告訴我說，「一個人願意在他身後留下一點東西。戰爭中斷了我的科學工作，在德國佔領期間，我做一個辦公室的職員。我們教授們把我們的學生

集合成若干小組，並且秘密地教他們。我們從一所房子走到另一所房子，因為在一個地方出現次數太多會增加危險；假如被捕，那就意味着死亡，或者至少是我們全體都進集中營。浪費了這些年以後，我希望在臨死以前做幾年科學工作；莫斯科的大學給我這種機會。我不知道在波爾將會有什麼樣的科學。我正要到盧布林去看看……」

「我不是預言家。」當我問他，依照他的想法目前波爾將會發生些什麼的時候，他從他的黑邊眼鏡後面注視着我說。「從長遠處看來，波蘭會成爲民主的，因爲農民正在取得土地。但是民主將會是不容易的，他們首先要將一些積重難返的壞習性去掉。」他歎了一口氣，好像他發現在這樣一個時代裏作一個科學工作者真不容易。

德姆伯夫斯教授關於「維爾諾問題」的分析——這個分析使他的名字上了波蘭恐怖主義者的『死名單』——和馬祖爾教授對於勒佛夫的解釋差不多。——維爾諾有一部長而複雜的歷史。立陶宛人聲稱是他們的蓋帝敏王子建立了這個城，但發掘物證明它比蓋帝敏還要早幾百年。可能最初它是白俄羅斯人的居住地。在中世紀它是立陶宛的首都，但以後一直都是波蘭的，今天這個城大部份還是波蘭人，但四週却是白俄羅斯人和立陶宛人。現在沒有方法可以把它加入波蘭，地理上不允許這樣做。——

和德姆伯夫斯基同一個車廂裏有個沉默寡言而又緊張的人，帶着屈就的樣子來聽這個教授所說的種種困難。那就是古倫特，一個工程師，華沙工藝大學畢業生——剛剛在莫斯科為波蘭政府的官方報紙選擇了一架印刷機——他曾在恐怖中渡過最後關頭。他曾被關在梅丹涅克的「死營」裏差不多有兩年之久，僅僅因為德國人要利用他的工程技術來設計營中的建築才保存下性命。

「我已經不再是一個正常的人類了，」他告訴我。『忍受過梅丹涅克的人沒有誰能再變成正常。』

古倫特曾經看見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裏，他們在梅丹涅克——僅僅一次就殺死一萬八千猶太人——的那一天。他曾在一個叫彼得維爾采耳的營指揮官的下面，這個人「喜歡這樣來殺人：用他的大皮鞋先跳上一個平臥的人的肚子上，然後是胸，然後用靴跟踩在喉嚨上，他當着所有的人，在一個方場上執行這一切，爲的恐嚇我們。」

「最壞的還不是身體上的折磨，甚至也還不是鞭打。是那種心理的空氣毒害了每一個人。是那種你知道每分鐘他們都可以決定殺你的緊張情緒。是那種屈辱的感覺，就是你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壞的，因爲你是一隻斯拉夫狗，一條斯拉夫豬，一個劣等的東西。你對於人類的信仰是被摧毀了。」

吉倫特曾用意工來保存一點自尊心。甚至這個受罪的奴隸也找到一種方法來阻撓納粹的戰爭機構。「在營裏有六個「場子」，而且場子的指揮官彼此互爭長短。假如一個場子有好的邊道，那麼其餘的也就都要。我設計場基和邊道的時候能用多少水泥就用多少，因為這是戰爭需要的，非常缺少。利用他們和互間的競爭，我使他們在浪費着水泥。在戰爭的第五年，我在一場場子上多用了好幾車的水泥，於是別的場子都照抄我的設計！」

他雙目炯炯地看着我說：「使我最痛心的是現在屠殺有些人，像英國人和美國人，甚至不相信我們所忍受的一切；因此正義的希望是沒有的。假如我聽見任何人說梅丹涅克的死是不可避免的，我要拿起一把刀殺了那個人。」

當他道歉的時候，兇光從他的眼中消失了。「我已然告訴了你，我已經不再是正常的了。」即使我對那使梅丹涅克的熱情有所懷疑的話，那時我也會不敢說出來的。

我踱進隔壁的車廂，發現英俊的維爾克上尉和另外兩個西班牙戰爭時的老戰士正在和一個新同志交換一些回憶。菲利浦茲克也穿着波蘭新軍的制服，但加入它的路却不同。他曾經在蘇聯加入了安得斯的軍隊，但在伊拉克開了小差，冒着生命的危險他又回到蘇聯來為波蘭而戰。

菲利浦茲克早年的生活爲凡爾賽條約所造成，這個條約把他的家鄉西利亞分割給德國和波蘭，曾經有過三次反抗德國人的起義。菲利浦茲克十四歲的時候參加了第二次的起義。『我坐了一個給起義的人送武器的卡車去的。人民向我們歡呼並且給我們極大的麵包。法國兵是我們的朋友，但英國人不是的。勞合·喬治不願意給予波蘭太多，他反對克萊蒙梭。』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英國，法國，意大利的士兵全都保證人民的選舉權。對於菲利浦茲克選舉權不是投票而是戰爭。他是在礦上長大的，並且逐漸轉到鋼鐵廠工作。他結了婚並且有了一個兒子。經過一個艱苦的過程，他明白了外國礦主有一個國家的資源究竟意味怎麼一回事。『外國礦工把我們的礦關閉了，使別國的煤漲價，從而使他們自己的礦賺錢。波蘭政府從來就不夠強大來執行法律反對他們，反而是他們執行了他們的意志來反對波蘭政府。人民想盡一切方法來取得民主，但是得不到。這樣我們進入了一九三九年和戰爭。』

戰爭使菲利浦茲克成爲一個在烏拉爾的流亡者。他在波爾姆附近的一個鋼鐵廠得到一個工作，隨後德國人進攻蘇聯，於是菲利浦茲克被徵入在蘇聯組織的波蘭人的軍隊，由波蘭流亡政府的代表安得斯將軍所指揮。

『起頭，軍隊中的每一個人都希望能到前線去把波蘭贏回來。但是，當德國人到達斯大林格

勒的時候，安得斯就一點也不隱蔽蘇聯不能支持的這個信念了。他把他的軍隊帶到伊朗，後來又到伊拉克。在伊拉克有一年多我們沒有武器，也沒有關於前線的議論。所談的則是「讓布爾塞維克嚼嚼德國的征服吧！當他們兩敗俱傷的時候，我們就將會有一個從黑海一直到波羅的海的波蘭了」。

「後來我們開始自無線電中去聽關於正在蘇聯組織的波蘭新軍。當我們在伊拉克留連下去的時候，他們却正在朝着波蘭推進。當我們聽到柯薩斯科師在列尼拿突入德國防線的時候，我們想：「爲什麼我們不在那兒呢？」一羣軍官和士兵給在蘇聯的貝爾林將軍的軍隊寫了一個賀電。安得斯把他們全逮捕了起來，並且把他們扔進一個老的巴勒斯坦的監獄裏去。」

苦於沒有行動，菲利浦維克開了小差去追求戰爭。一共花了他一年的時間才達到目的，這一年花在逃避憲兵上。幾個加拿大人幫忙他逃向印度。經過伊期的汽車的「美國人判不太嚴格」。他在德黑蘭停了很久，那裏他必須不合法地生活着，因爲「害怕英國的憲兵」。最後波蘭愛國者同盟的一個代表從莫斯科來了，於是才把他和別的人們救了出來。

「那時有許多人和我一樣的想法……許多人希望我順利，並且給我錢以便在路上用，但是和我一樣決定開小差的却並不多，因爲這是一個生與死的選擇，有幾個被捉到了並且給槍斃了，只

有少數人逃了出來。我很幸運能爲波蘭戰鬥。許多許多人從來還沒有得到過這個機會呢！」

一個有着紅潤的雙頰，藍色而有光的眼睛，充滿了生命力的白髮老人，也認爲他能給波蘭戰鬥是很幸運的。那就是佔着最末一間車廂的工程師奧肯斯基，他爲了這個機會是從阿富汗尼斯坦來的。他已經拋棄了他一生的積蓄以及一個有保證的職業。他在我們那些涼人的車廂間穿來穿去以及向每個人道賀的那種歲時的愉快，已經差不多可以使我們的車子溫暖起來了。

「我已經活了一輩子了，而這一輩子還挺不壞。現在到了六十歲，我却又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活！」

從年青的時候起，奧肯斯基就一直不斷地出人國界。他生在華沙，在達姆斯特特讀完了一個德國中學，又在彼得堡讀了一個工科大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沙皇軍隊裏一個道路組的負責人，並且在俄國的首都看見俄國革命。做爲新波蘭共和國公共工程部的部員——這個職務他在技術上負責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曾決定過西利西亞的界線，在英國研究過運輸問題，並且參加了一九三〇年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道路會議。

「美國政府對我們很好。你們的道路管理局局長麥克唐納先生——全世界在道路方面最偉大的人——招待得我們非常之好。我當選爲那個會議的一個副主席。」

國際聯盟邀請奧肯斯基到它的測量組工作，他被國聯派到中國造了數百哩道路，並且自蔣介石得到一個高級勳章，「中國的人民是非常之好的。我在那裏住了四年。」他是經過美國而回來的，坐汽車橫穿過美國大陸以便爲國聯研究美國道路。「我在阿瑞左拿洲與德克薩斯洲學到不少東西。」

戰前在波蘭的家鄉中奧肯斯基並不太成功。「我只看見不幸和一些蠻獷的計劃，並且我都不能同意。我希望有三條戰略上的大公路，因爲很清楚，我們的鐵路在戰爭中會被轟炸到不能使用的。我希望有許多好的三等道路把鄉村和市場聯結起來從而給農民一個更好的生活。我希望有發展良好的汽車運輸，以使我們的生活不致在戰時一下子受到停頓。」

「我和我們的軍人們談，但他們却喜愛騎兵以及那高頭駿馬的詩意！我出版了一本關於道路的書，使得部長非常震怒。僅僅爲了一本關於道路的書，要不是我們有許多朋友的話，我也就被扔進監獄裏去了；但他們使得我的工作很不愉快，並且尋找種種機會把我踢走。那以後我們和阿富汗人訂了條約，要給他們以技術上的協助。我願意到阿富汗尼斯坦去，同時部長也很願意把我打發走。我帶了我的最好的助手，佛蘭克·維却爾奇斯基，以便給他一個發展的機會，因爲在戰前的波蘭，我們的工程師是非常之不景氣的。」

奧普斯基喜歡上了阿富汗人。他們有一種很悠久的文化，他們很和善很可敬。看起來阿富汗人也喜歡上了奧普斯基。一九三九年初，他們把他送到歐洲去爲一個新的公共工程物色四十五至五十名工程師。他帶回來四十五個，其中大部份是波蘭人。他也談話過德國人，但是他們不願意在奧普斯基底下工作，他們已經嗅出了將要來到的戰爭了。

當世界大戰打到波蘭的時候，奧普斯基和他的人員打電報說他們願意犧牲自己國家的詞遺。回電讓他們等待。兩個星期的功夫什麼都沒有了，波蘭也沒有了。奧普斯基心裏恢復極大的空虛感，續爲阿富汗人尋路。他造了一百四十座子和許多地道，這些地道是阿富汗人第一次見到的。那以後在遙遠的卡布爾，每逢·瓦西列夫斯卡的傳聞來到奧普斯基的耳中。

「……見波蘭人正在蘇聯組織了起來，並且蘇聯人正在幫助他們以協助。我們得到他們的報紙，於是我說：這才是波蘭得救的時候。好幾百年以來我們和俄國人打仗而毀滅了我們自己，現在我們將要成爲朋友了。」

奧普斯基馬上寫信給莫達·瓦西列夫斯卡和她的波蘭愛國者同盟，說他隨時準備按照他們所願意的任何方式和時間來爲波蘭工作。但一年都沒有有一個回信來。卡布爾的波蘭領事——倫敦的波蘭人派來的——把奧普斯基叫做奸細，並且把他的外交護照拿走了。很久以後他才又得到一

張護照，「因為阿富汗人代他向英國人說項」。但那已不再是一張外交護照了。

「這一切全是因為我要和布爾塞維克做朋友的原故，」奧肯斯基解釋道。「告訴我，」他不安地問道，「布爾塞維克究竟有點什麼嚴重的毛病呢？所有我遇見的都對我非常之好！」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卡布爾的蘇聯使館把奧肯斯基叫了去。「我們有一個為你波蘭的轉移護照。看起來他們要你到那裏去。」

奧肯斯基在阿富汗尼斯坦有兩萬人在他下面工作。他是道路總工程師。究竟誰要他到波蘭去，或者他們是否會給他一件事務做，他連一點概念也沒有。但是他知道這是「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在這中間若干世紀的種種錯誤將被糾正。」並且他有一個去到那裏的機會。

阿富汗的首相把奧肯斯基叫了去，並且和他談了一小時。他說：「也許這時去波蘭是太快了一些……也許你將會失望……並且，你已經六十歲了。」他說：「在這裏你是別人不能代替的。」他答應把奧肯斯基的薪水加倍，把他的家眷從波蘭接來，把他的子女送到外國去讀書，給他終生的養老金，給他一所房子和土地。

奧肯斯基回答道：「沙德拉札姆（首相），阿富汗尼斯坦是我第二個祖國。假如沒有這個戰爭，我會在這裏呆十五年。但你自己也是在一次革命中來到卡布爾的。假如你是一個波蘭人，並

且你的國家像波蘭現在這樣，你將會怎樣做？」

當阿富汗首相回答的時候，兩顆眼淚流下他的雙頰：『我是你的父親，又是你的兄弟。願你和上帝同行！』

奧肯斯基帶了兩噸重的行李，所有一切他想到在他今後的餘生中或許會需要的東西——並且這些東西都是阿富汗內閣官員們親自從他的房子搬到汽車上去的。東方的人民知道如何敬愛奧肯斯基的人格。卡布爾的總督和一百五十個阿富汗官員向他告別，並且他們之中有許多哭了。但是在卡布爾的波蘭居留地的波蘭人沒有一個來送他起身的。奧肯斯基的意見認為：『他們害怕那個波蘭副領事。』

當奧肯斯基到達中央亞細亞蘇聯邊境的時候，他把他一生的積蓄——這以前是元——都依照官價換成盧布，沒有一個有常識的旅行者會做這種事，但奧肯斯基却認為這是正常的事。他把所有的錢都為他在蘇聯的用途而花光了，一切都按照市場上的價格付錢。對於另外一個人，這將是一個大的悲劇，但對於奧肯斯基，一生積蓄的損失不過是使他在波蘭需要人的時候回到波蘭去的一種當然代價。

『倫敦的那些波蘭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米柯拉茲克有機會可以回到波蘭，他怎麼能够忍心

不回去了。這就是他對波蘭政治的簡單看法。穿烏蘇特的一路上，他奇怪究竟是誰給他安排了那張轉移護照；他希望這是萬達德自己——他所崇拜的女作詞者——給安排的。戰前她給孩子們寫了多麼簡潔的愛國故事呀！

維拜爾奇斯基，帶着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和這個老工程師共一個車廂。他對於奧肯斯基的忠誠像一個兒子。奧肯斯基把世界展開給維拜爾奇斯基和他的家庭。維拜爾奇斯基的妻子一直不過是一個波蘭的主婦，而現在她曾經教過一個國王的女兒們！她是阿富汗斯坦第一個女子學校的指導員，這是一個走讀的學校，女孩子們都帶着面罩經過卡布爾的市街去上學。國王的女兒和窮人的女兒一齊去那個學校，因為阿富汗人也正在走向民主！

最後一個下午，已經很晚了，奧肯斯基請我到他的車廂裏去。我們正在慶祝我們的穿過國界。

當我們集合在一道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十二個人擠在一個容六個人的空間裏，把所有座位，上舖和靠門附近站着的地方都塞滿了。靠窗的一張小桌上，一瓶芬芳的櫻桃白蘭地——國際縱隊的隊員們從伊朗帶來的——把各種各樣的器具都斟上了，包括女車長的茶杯，乘客們旅行用的杯子，和半打由奧肯斯基從阿富汗尼斯坦帶來的，外面黝黑而裏面白得發亮的無柄中國高杯。

「爲我們的回來而乾杯，」奧肯斯基說。

我們在邊境上停了一會。在愈發暗下去的蒼茫中，帶雪的雨打在泥濘的溝裏。一塊地上滿是
株梗，鉛色的天幕下幾乎連樹都不大出來。靠左邊的污泥中站着一間草頂並口窗子破爛的小茅
屋。茅屋裏沒有燈，我們的車裏也沒有燈。

蘇聯邊境的官員最後下車去了。穿過車窗我看見他們 糊的形體在泥濘中蹣跚而去。車子向
前一衝就開動了。隨後在暮色中現出一條蒼白的河來，河裏漲滿了雨水，並且四濇成許多不規則
的小溝；一座破橋的鏽齒形的黑輪廓，東倒西歪在河上面。

車廂裏人的面孔在黑暗中消失了。只有那一圈伸出來端着杯子的白色的手，和盛着伊則黑酒
的中國高杯的白色的裏子還可以看出得見。

「我們的波蘭是多麼美麗呀！」黑暗中一個聲音說，我的呼吸停止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外面，慈悲的夜正在覆蓋着那悽涼的孤鷗。天地中間的一條線已經消失了。隨後女車長帶着一
隻蠟燭進來了。我看見奧肯斯基的面孔，那是一張朝進聖城的香客的面孔。

這樣我們過了河面進入那被蹂躪過的土地。

第二章 盧布林

在一面紛擾的海中，盧布林是一個生活上有組織的島。當七月間紅軍掃過波蘭東面三分之一的土地的時候，紅軍戲劇性的突破一下子佔領了這個城，使得它幾乎完全未遭到破壞。城市監獄裏的德國衛兵還有時間把犯人殺掉；當紅軍進來的時候，監獄的院子裏擠滿了死者的親屬，正俯在論千的屍首上痛哭。但是無論如何，沒有多餘的時間來破壞許多建築物了；因此，這個在南波蘭的有點擁擠的鄉村城市，在到那時為止所有被解放了的波蘭城市中，做爲政府的中心真是設備最好的了。很偶然地，波蘭在經過一世紀多的分裂以後，又於一九一八年再生的時候，盧布林曾經是那時波蘭共和國第一個臨時的首都。

波蘭外事局的幾輛汽車來迎接我們的列車，並且把我們分送到我們住的地方去。一個彬彬有禮的軍官走向我來說：「您將要到委員會來。」我幾乎要抗議說我首先需要的是一個旅館，洗一個澡和休息一下。但是從同行旅客的那種尊敬的樣子看來，我猜想這個「委員會」要比一個旅館

還要好。

我們在這中等大小頗欠整潔的城市的街道中急駛而過，爬上一個小坡，於是來到一所在後院中的普通房子，前面還有兩所相同的房子。當我走上一個波蘭教員家裏的三層樓上時，我想大概有點不對了，但是我的譯者却正在這裏給我指定一間屋子，他正在告訴女僕在我的荷蘭火爐中生一個火，並且答應「委員會」會供給煤。這所建築物——城裏最好的房子之一——曾經被德國人佔了五年，現在被接收過來給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僱員和客人們住。這所房子確實比盧布林的任何處高起來更舒服一些。

比一切都重要的是這兒有火；一個荷蘭火爐的燃料還不太困難。火一點的旅館都沒有生火；盧布林——被戰線自西利西亞切斷了——極端缺乏煤。我的屋子的燈也不壞，並且有一些相當舒服的長椅和一張大寫字檯。一個人圍桌，現在很不順眼地靠牆羅着，說明這間屋子曾經一度做過旅館。我的房東和他的妻子和小兒住在隔壁一間較大的屋子裏，穿過大廳是一個大廚房，帶有一間伸進去的小房間，裏面住着一個敏捷的女用人。她是教員家裏僱的，隨時都可以給我做一些零星事情。

我恐怕攪攪了他們，我試着用所有我所知道的語言向他們道歉。他們懂幾個俄國字，大約懂

更多的德文，但是不願意說。他們使我明白，我「沒有什麼不方便」，並且將「不要房租」。我的女房東甚至拿出她最好的鑲有花邊的被蓋來，做爲她高興與我到來的表示。最初我把這當做過份的招待熱誠，但幾天之內我發現在那時的房屋情形之下，沒有任何人的允許，並且在納粹的腳跟剛剛邁出門就搬進一所房子，他們不可能希望佔有比一間更多的屋子。因爲另外一間住了一個暫時的單身齊人而不是一個永久的家庭，他們確實感覺高興。

半條街遠的地方有一座巨大的三層的辦公室建築，那就是民族解放委員會的總部。進去的時候你給衛兵看一下通行證；既進去之後，你可以隨便跨進你所要去的任何一個部門，你可以看見一個政府所有普通工作部門的踪影。對每一所小一點但衛兵很多的房子住的是波蘭參謀總部。沿街伸出許多小房子供給軍政人員的伙食。我被指定到過街正對面的一個食堂裏覓食。

靠盧布林中心這一小堆稍爲高一點的建築物——委員會，參謀總部，食堂和住宅——成爲紅軍所已經解放了的那三分之一的波蘭的行政中心。在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寒冷的日子裏，這些建築成爲一支發展迅速的波蘭軍隊，一次劃時代的「土地改革」和我們普通包括在一個政府下面的各種經濟，衛生，教育，警察等活動的總部。

但是在盧布林，除了不經心的時候，沒有人用「政府」這個字眼。每個人都很謹慎地只說

「委員會」，全稱是「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和在法國，比利時，保加利亞，匈牙利，奧國的相類似的名稱一樣——它暗示了一個有限的職權和一個確定的期限。在波蘭他們認為這個虛虛的名稱將使它容易和在倫敦流亡政府的一些人員最後聯合起來。

二 同樣地，在這二層的大建築室內的各個部門，也並不像普通歐洲各國一樣地被加以「部」的名稱，它們都被稱做「處」，正如同在英文裏這個字暗示着爲了某種特別的目的你所要去的處方。「衛生處」是你爲了衛生而要去的地方，「學校處」是你爲了學校而要去的地方。爲了經濟，外交，勞工，實業和農業，你分別到各個適當的「處」裏去。幾乎全體都在這一個建築室內，各處很快就彼此搞熟了。

我不久就知道了，離開委員會那些建築步行都不遠的距離內，還有其他中心。往下去兩條街就是克拉考夫街，一條主要的通衢，兩頭都引到常有遊行和集會的廣場，可以舉行各種會議的人廳和劇院，以及做了各種政黨，工會和行政機構的總部的建築物。

我馬上就認識了到委員會官方報紙——日語或巴斯巴利人——的路，這個報館和官方的無線電台佔了一座大樓，在克拉考夫街剛穿過一個小公園的地方。波瑞斯查，那生力勃勃的主筆，是很容易和人搞熟的。他確實有一個新聞的頭腦，並且只要我希望見任何人，他卻永不疲倦地給

我接洽和約會。和他辦事情的困難在於普通至少有六個人在他的辦公室裏，此外還有兩個在電話線上，他正同時和所有這些人交涉一切。這是很興奮的但也很疲勞。除非一個人拼命抓住他的注意力，否則別的請求者永無終止的行列會把他的注意力拖去。

全波蘭以及世界各處的人們都正在往盧布林來。從被毀壞了的村鎮裏來的難民來找事情做，或僅僅來找一個住的地方。工程師，科學家，士兵們來供獻他們的能力，或者僅僅看一看這個新的機構將會做些什麼。成百的村長帶着他們的問題來了，睡在一排一排的小床上，或者在沒有火的建築裏就睡在一堆一堆的稻草上；他們和各種不同的「處」或政黨商討，並且參加短期的訓練班，以便成為合作社，學校或土地改革的組織者。各種團體開會，討論，並通過議決案。各種工會，合作社，政黨努力把受了五年壓迫的生活重新組織起來。

痛苦和紊亂不僅由於兩度掃過這個國家的戰爭所造成，並且也由於納粹統制下五年的隔絕所造成。在任何公共的集會中，只要我在記者席的桌子後面一坐下，人們就朝我來了，希望我，做爲一個美國人，用什麼方法可以使他們和更廣大的世界聯繫起來。

在一個擁擠的大廳中審判梅丹涅克戰犯的時候，僅僅在半小時的休息中間，就來了四個這樣的請求者。第一個是從維爾諾來的一個小兵，他要找那在西伯利亞的母親和那跟着安得斯軍隊走

了的，也許在意大利或巴勒斯坦的父親。第二個是一個體面的猶太女人，以前也會一度漂亮過，她希望能用什麼方法帶信給她一個在特爾阿維夫的弟兄，告訴他，他們的父母，兩個妹妹和十幾個親戚都被納粹殺害了，但是她和她的丈夫以及孩子們還活着。一個波蘭農婦教了我們，她把我們藏在她的地窖裏藏了四年。

其次一個外甥爾凡尼亞的大漢請求我設法把一張名片送到他的村莊裏去，那兒他留下了一個五歲的兒子。德國人夏天經過羅馬尼亞撤退時，把他抓去當做奴隸一直帶到華沙，在華沙八月的起義才使他得到自由。做爲一個志願兵，他打了兩個月的仗，直到波蘭將軍投降的時候。以後這個外甥爾凡尼亞人游過維斯杜拉河跑到紅軍這邊來，他們詢問了他一番就把他放了。

一文不名，穿著海水過來的衣服，他只有一個簡單的思想——回到他五歲的兒子那裏去。當我告訴他我沒有任何可能的方法和一個外甥爾凡尼亞的村莊通信的時候，他一再帶著寶羅的口氣說：「但是我留下一個五歲的孩子在那裏呀，」就好像渴望的強烈程度一定可以多少改變這種不可能的情況似的。當他離開我的時候，很明顯地他打算一路走回家去。我只害怕他那裏渴望回家的直覺，像一個移棲的鳥類的直覺，會使他在克爾巴阡山的某處碰上一個邊境衛兵的流彈。

那一天早晨的第四個請求者——信不信由你——是一個美國人！

巴斯維維茲，一個穿著波蘭制服，樣子很中看的人，說他是一九一九年在紐約生的。一九三九年在波蘭，戰爭將他擄進，並且他一直沒有方法逃出來。一九四〇年他找到在考那斯的美國使館，並且把他的護照交上重新簽署，但那個使館以後搬到莫斯科去了，跟着希特勒就進攻了蘇聯。因為缺乏公民證件，巴斯維維茲就被徵入了波蘭新軍。

「我並不在乎加入波蘭軍隊。從東面而不從西面來痛搗希特勒我也不在乎。我只擔心因為在一支外國軍隊裏作戰我將失掉我的公民身份。所有我家裏的人都在紐約。什麼時候會有一個美國代表到波蘭來處理像我這樣的人呢？」

除了這些個人問題之外，還有許多各種團體的問題。幾百萬的波蘭人要從那塊以前是東波蘭而現在變成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土地上轉移出來。他們的代表們出來調查他們可以移進去的處方。別的團體的代表們從德國佔區通過前線而來，以便在將來解放的時候使委員會可以了解他們的需要。

三個堅決的馬祖爾人提出他們要到東普魯士的要求，他們在「七百年前的條頓騎士」之前就移殖到這塊地方上來了。雖然我是在波羅斯查的報館辦公室裏遇見他們的，他們說話還是期期

際。「我們三個所以還活着，僅僅因為五年來我們一直都用了假的名字。」他們肯定地告訴我，馬祖爾人佔東普魯士人口的三分之一，他們是一個斯拉夫的民族，以前說波蘭話，但近幾代以來被強迫德國化了。他們不願意再做德國人了。

「德國的統計材料把所有的馬祖爾人都叫做德國人，」他們補充道，「但是納粹政治把我們看做劣等民族。甚至德國化了的馬祖爾人，在納粹統制下也不能取得好的政府職位。」這些馬祖爾人希望他們管理東普魯士的時候到了。

這就是那些來到盧布林的各種矛盾的問題。這就是那種紊亂，在這紊亂中，委員會已經組織了一些叫做「民主」的東西，在每次集中「一個強大，獨立，民主的波蘭」這句話，被每一個准說者像在戰場上高呼衝鋒一樣地喊出來。這個民主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

在波蘭也像在別處一樣，民主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對於我的好朋友奧肯斯基，它是一個光榮而遠的照眼的光輝。對於那些心懷惡刺的人——這樣的人在盧布林也頗不少——「民主」不過是委員會的一個新的政治口號而已，那些喊民主的演說者也不過是些傀儡和一堆沒有骨頭的人而已。他們這許多公開的冷言冷語至少無疑地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這個民主，不管它是否存在或能否存在，是正被很自由地討論着。我從來沒有到過一個地方聽到民主這樣不斷地

被分析着。

一個在土地改革中土地被沒收了的女人，寫信給政府報紙大發雷霆：「你們把我的家產都拿走了，怎麼能說那是民主呢？」——主筆波瑞斯查給我看了那封信，並且笑了，好像在笑一種對他是絕對荒唐的事情。對於他分配大地主的土地是民主不可缺少的條件，是它最後的保障。

在四個政黨的總部中——我有意地訪問了他們——民主有四種不同的顏色。

在那農民黨的寒冷而擁擠的辦公室中，一個慇懃和藹的秘書聲稱他代表了波蘭「農民的大多數」。他對於他那個黨的光榮歷史的敘述，時常被那些出出進進的黨員們的善意的補充和糾正而打斷。他承認 P P R——波蘭工人黨，「正從年青的農民中，特別是那些剛從大地主分得土地的貧農中取得相當數量的黨員。這一點對於他只是『正常，民主的競選』；老農民黨仍然『代表着農民』，在這裏，民主和鄉間倉房角落裏圍爐的討論一樣的友善，隨便和不確定。所不同的是這兒沒有任何爐子。」

離開他以後，我走錯了門而進入一間大屋子，地上鋪著一堆一堆的草。「不得不談到波蘭以後的農民來客常睡在這裏，」他顯然解釋道。

稱為「民主黨」的那個小小的但有影響的知識份子集團，對於民主具有十分精確的口味。他

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那就是衆所週知的西方民主。那在英國和美國成功了的而在法國不十分成功的民主。由於英美對於波蘭的新制度尚未承認，因此當然沒有英美的使館和影響，這個團體，比任何別的團體都更感覺到深深的不安。他們並不是反對紅軍的解放——他們忠實地爲紅軍乾杯和慶賀——但是很顯然地，他們希望在波蘭各處能佈着更多的西方民主的代表，來平衡所有那些共產黨！

對於那些波蘭社會黨總部——簡稱 P P S——裏的熱情的年青婦女們，民主的意義就是五年以來她們給她們的孩子們的第一個聖誕節聚會。：納粹們甚至於連幼稚園的小孩子都不許一齊公開出來。我們非常驕傲於孩子們在這第一次的聚會上所表現出來的同志精神，以及這次聚會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社會主義家庭的訓練。：

對於隔壁辦公室裏一個 P P S（社會黨）的高級幹部，民主有比較更嚴格的氣味。它意味着與波蘭工人黨——P P R——的競爭，不單在發展黨員上競爭，而且在若干破壞了的城市中爲好的總部建築而競爭。他有一點不滿意於「那些不徹底的共產黨向羣衆唱『唱』」的方式，那就是把蘇聯當做一個盟邦向它歡呼，但却不要求波蘭的蘇維埃化，而僅僅要求一些普通的改良。他自己對於蘇聯表示了一些暗中的懷疑，他願意接受蘇聯做爲盟邦，但却要保持和當前的距離。他希望現在

拯救了波蘭的紅軍會很快的向柏林推進，並且讓開波蘭人的路；於是 P P S（社會黨）就會建設一個不但是民主的而且是社會主義的波蘭。

「我甚至不反對一個蘇維埃的波蘭，」一個 P P S 的職員爲表明他將前進的深度向我說道，「只要波蘭不是蘇聯的一部份就可以了。我們是西方的，我們不和那廣大而寒冷的西伯利亞搞在一起，在那裏，一百五十多年以來，曾經死了不少我們波蘭的流放者。」對於他，蘇聯仍然得負責俄國沙皇所做的一切，他願意接受蘇維埃社會主義；但波蘭要純粹是波蘭人的，隔離，超然而獨立。

P P R（工人黨）相信一個職工的民主。它那座落在一個院子裏的高大建築物，由許多帶了衝鋒槍的士兵守衛着。另外還有帶着衝鋒槍的衛兵在每一個入口的地方擋住我來檢查我的證件。當我在一間大而暖的辦公室裏和瑪書維斯拉夫——一個態度溫和的人——討論的時候，他們對我那種可厭的懷疑的理由才搞清楚。

「我們是土地改革的原動力，」他告訴我說。「我們有一百五十個黨員在組織聯合的時候被暗中謀殺了。」民主對於 P P R（工人黨）是一件代價很高的東西。

維斯拉夫告訴我，以前的波蘭共產黨在戰前就被共產國際解散了，剩下一些散佈在各處的共

產黨員，但沒有一般的組織。一九四二年的正月，許多小組「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聯合成爲波蘭工人黨。「我們是在敵人佔領時期的恐怖中誕生的，我們組織了和侵略者的第一次的武裝鬥爭。我們的農民綱領是建設一個民主的波蘭而不是一個蘇維埃的波蘭，」他這樣肯定地說。當我問他將來的全民選舉還是按照西方的形式出許多候選人競選呢？還是像蘇聯似的只有一個候選人名單呢？維斯拉夫帶着一點被觸怒的樣子回答我說，這個問題還太早。「我可以告訴你這些，我們一定反對任何反動派，不管公開的也好，隱蔽的也好，跑到選舉名單上來。」他堅定地注視着我，看我能不能提出一個反動派來。

P.P.R.（工人黨）並不禁止向蘇聯高呼「我們偉大的同盟者」，和向紅軍高呼「你們解放了我們的國家」。它用這些做爲一面旗幟來集合農民的支持。它在年青和精力充沛的戰士中間的發展是很快的，在他們中間，幾年對希特勒的聯合作戰已經結束了他們長期的對俄國的仇恨。以少數有經驗的共產黨爲核心，這些新的擁護者也佔該黨十分之九的黨員。

對於普通的波蘭公民，民主的意思就是納粹的種族奴役是過去了，「因此一個人應該是一個人了」，並且每一個公民都一定得捲進來。它意味着生氣勃勃的農民組織發會，來到盧布林開會，再回家分土地。它意味着工廠裏的工人組織工會，派代表參加城市會議，它意味着所有各種

各樣的人民爲了新的觀念而號召，而組織。

甚至於波蘭軍隊也稱自己爲民主的，雖然它的軍官們仍然發號施令，它的士兵們仍然服從。一支民主的軍隊意味着農民和工人的兒子可以升爲軍官；並且這支軍隊是要保衛人民的，而不是統制他們的。戰前的波蘭軍隊，特別是它的軍官們，已經成爲一個特權階級了。

在波蘭沒有人認爲民主只限於選舉這件事情，但每個人都相信選舉，「只要有時間的話」，我考查了一個省農民大會代表的橫断面，以便確定有多少是選舉出來的，以及在什麼基礎上選出來的。他們是從許多分散的地區來的，並且清楚地覺到他們「代表」着這些地區；但是他們對於代表的技術還不如對於進行一件工作來得關心。他們是些用行動而不是用分析來表現自己的農民。

我所考查的頭十個是由各地市長或縣團長所指派的；我準備說：「隨手拈來的」。但正當我預備把這個諷刺的按語加給整個大會時，其次的十個代表則巧都是從一些特別召開的村會議中選出來的。進一步的探問說明每個人都相信選舉，但是有這麼多的會議和東西須得派代表去參加，以致於「你不能每次都舉行選舉」。想到在土地改革的高潮中，那些面對着許多農村地區的複雜工作，這些地區到目前爲止還都是無組織的，這個藉口似乎完全是真實的。

就在這個農民大會中，關於民主的整個概念我受到一次打擊。一個穿的衣服和機杼的面孔都不是農民型的，而且一直帶着欣賞的神氣注意着我的探問的代表告訴我，他是一個「國務員」，因為他的技術知識被縣政府派來的。他加上道：「自上而下的民主！」

吃驚之餘，我問他是香暗示着一種批評，還是意味着一種新的自上而下的民主，依然帶着欣賞的神氣他回答說：「民主有這許多種……有西方的民主，大多數老一點的農民都認為他們是贊成的；還有蘇維埃的民主，有些貧農需要它……我想我們在波蘭所正在取得的是一種兩個半的民主。」毫無問題，他暗示着那「第二個半國際」；這個人是過去二十年來革命國爭中的一個流離者。但是在他身上總有點東西微妙地使人感覺不舒服，好像他譏笑我們所有的人，所以我直接了當地請他說明他究竟需要那一種民主。

「我？我不贊成任何民主，」他扔出這麼一句話，「我主張無產階級獨裁！」

他完全以我的驚訝為樂事，所以他繼續說道：「我以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我沒有加入這個新的P.P.R.（工人黨），對於我它是太乏味了。為什麼他們只把我們看做像蒙古人民共和國一樣，認為成熟程度不夠蘇維埃化，而不把我做為同等對象加入蘇維埃聯邦呢？」

在說最後幾個字的時候，他的渾身變得更厲害。他使得這個世界的味道更苦。在審問任何人

的民主或國與國之間的任何信義上，他是一個能手。在這個如此急於組織他們自己國家的簡單人民的大會中，他究竟在做些什麼呢？他是在爲希特勒或倫敦的波蘭人在下毒藥，還是僅僅爲了他自己諂媚的虛榮心？這真是很難說。

民族解放委員會正在組織着一個國家，這個國家不但要在納粹所留下的紊亂中，並且要從誠實而不同的人民的意見中，以及所有敵人譏諷的面前組織起來，做爲它的協助不但有各政黨，各行政「處」，各種組織的代表大會，還有許多別的機構，關於後者，我這裏只提幾個。

八十個男人和女人，從十八歲到四十歲，集合在一個「宣傳學校」的大體育館中，所有的人都穿着冬天的外衣，因爲那正是臘月，沒有火的屋子裏冷得使人打戰。有些人坐在那些笨重桌子邊的長凳上，有些因爲沒有座位而站着。他們之中大多數既沒有紙也沒有筆，因爲那時兩者都很缺乏，當不同的演說者討論到新波蘭的希望，它的組織方法，以及它和倫敦的波蘭人不同之處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很注意地在聽着。我聽到金德雷克夫斯基博士——波蘭駐莫斯科大使，新近又派駐巴黎的大使——的演說；他之後是重建波蘭工業的負責人波斯博士，沒有任何人是太重要或太有學問，以致不對於把他的知識講給這些從工廠和田莊裏來的八十個男女聽。

學生們當他們知道我是從美國來的時候，大聲地鼓起掌來，當掌聲靜止下來的時候，我告訴

他們我不過是一個私人而已，因為這一天他們是準備來聽一個美國大使的。這件事情成爲我那天晚上到他們宿舍裏去的原因。學生們擠在小鐵床上，床是擺得這樣緊，以致屋子裏沒有地方再放任何別的傢具——他們講到過去的苦難和將來的希望。

「納粹們兩次燒了我們的村莊，」一個披著白毛圍巾，穿白毛衣，豐腴而雙頰紅潤的女孩子說，「他們把隔壁的男人，他的妻子和兩個小孩子都燒死在屋裏；我聽見那慘叫。一年以後當我們把村子重建起來的時候，他們又把它全燒光了。我們之中有些人跑到森林裏去。」

奧爾樂夫斯基，一個三十幾歲身體茁壯的男人，在德國人燒了他的家以後，並且將他同伴的人捧起來加以驅逐的時候，他曾設法穿過前線跑到盧布林來，一個從庫查瓦村來的年青男人，當德國人強迫波蘭平民代替德國兵建築工事的時候，曾看見不知有一「多少多少的人」在前進紅軍的砲火下死去。華沙的波伯爾斯卡談到「聖靈教養院」的成年男孩子們如何被吊死成一整行列，從走廊一直吊到大街上。「那是當納粹槍斃了阿維思神父，並且偷走那些金器皿的時候。」

萬達·皮乞，她的紅花頭巾蓋著一頭金黃色的辮子，下面是一張小孩似的面孔；她曾被當做了一個游擊隊員而被捕，並且被放進梅丹涅克的死營裏去。「但紅軍是很近了，紅軍的砲彈轟落下來，並且在混亂中我們的一個人割斷了鐵絲網，於是我們有八個逃了出來。」

一個從維斯克·馬索維茲基這個工業城市來的年青機匠，說出德國人如何把「全俄斯克頓以生活的」電廠和鋼鐵廠破壞了。人民帶着鮮花和水菓來迎接紅軍，並且開了一個羣衆大會，建立了市政府，並且得到許多機器，機器「有些是從盧布林來的，有些是從蘇聯來的，還有些是我們自己用手做出來的。我們已經正在出產農具了。但是我們還是在前線上，並且德國的砲兵還在砲擊我們。上星期就有幾個工人被打死了。」

迅速生長中的工會是組織這個國家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經過邀請，工會中的三個領袖到我的屋子裏來談論他們的工作。維他奇夫斯基，一個將近四十帶着愉快的教授風度的瘦瘦的人，在戰前曾經做過羅致紡織工會的秘書，他現在是波蘭解放區中央工會組織的秘書長。和他一齊來的還有斯奇爾文思基和庫茲克，盧布林省工會的秘書和主席。做爲游擊隊員，他們曾在德國佔領的最後幾天進入盧布林，並且秘密地組織了工廠工人來搶救機器和設備，正當德國人逃出這個城市的混亂時候，這兩個人正在召集工廠大會，選舉工廠委員會，並且派守衛來保護工廠的財產。

那時在盧布林還沒有市政府，「他們告訴我，」所以工人們不但守衛他們自己的工廠，並且還選出「候補者」來參加市政府。我們叫他們做「候補者」，因爲我們還不知將有多少或在什麼基礎上他們可以被接受。在民族解放委員會尚未到達盧布林十天以前，我們建立了一個「

十四個人的臨時市政府。我們繼續不斷地自各政黨，醫生，教員，商人中間增加人數。現在我們有一個五十個人的盧布林城市會議，其中有十四個是自各工廠中選出的。在戰後普選之前，這將是我們的市政府。

羅伯奇夫斯基說：波蘭到處的產業工人在解放他們的國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有理由驕傲，因為在德國人的下面，產業工人就是奴隸。『廠長有時甚至就用手杖來打他們。他們不能離開工廠而逃走，因為沒有一個德國廠主的工作證件，不論在什麼地方被捕都會被解送到德國的工廠裏去的，對於任何不能或不願工作的人，梅丹涅克在那裏像一個最後的恐嚇；他可能被判處死刑，無罪一然後拖出去處死。當紅軍日益接近的時候，德國人不但企圖破壞工廠並且企圖毀滅波蘭的工人階級。在普列格——華沙郊外的大工業區——他們把熟練工人解走，弄到實際上差不多一個也不剩。在別處他們殺了許多工人。』

『只要有工人還活著的地方，他們就組織起來保存他們賴以爲生的工廠中的寶貴部門，今天查莫斯的電廠還在工作，因為它的工人把重要的設備偷走並藏了起來，使德國人無法弄走它，斯台勒瓦，窩拉鋼鐵軍火工廠的工人們把所有的最好的精細機器都浸在一桶一桶的細油裏面，然後埋在地下，一方面使德國人拿不走，一方面使它不致生鏽。』

所有這一切和我幾天以前到一個小蘇皮製鞋廠去參觀的情形相吻合。那裏的女工們講到在德國人下面所受到的鞭打。在德國佔領的最後一天上，工人們被帶到梅丹涅克，並且被迫來挖一個深深的墳墓。「我們哭了一整天，因為紅軍正要到來，而我們將不能活著見他們了。但是紅軍比德國人所預料的還要來得快些，於是忽然間看守我們的人全跑了。我們不相信我們居然還要活下去。」

那些女工還講到當那一區的居民正在把所有製好了的鞋子紛紛穿走的時候，所有的縫紉機如何都自廠內失蹤的事情。「那時我們想機器被偷走了，可能是被偷走了。但當我們剛剛成立了工會的時候，縫紉機就在工人的家中出現了。他們響應了工會的號召而把機器送回。他們只不過要確保他們的機器的安全，或是放在家裏，或是放在廠裏。」

按照維他奇夫斯基，有十多萬的工人已經加入了工會。這對於大工業中心比較少的東波蘭來說，已經是很可觀的數字了。「工人們都很高興。」他解釋道，「因為我們在一種工業更只組織一個工會。戰前的波蘭工人們被分成若干政治路線不同的工會：包括社會主義工會，天主教工會，國家主義工會，甚至納粹所謂的工會。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工人力量的消滅。德國人取締了所有波蘭的工會，不管它叫什麼名字。目前在產業單位的基礎上，我們重新組織了起來。」

和維他奇夫斯基談話之後，當我去吃飯的時候，我在奇怪，這個民族解放委員會如何在經濟上支持它那些會議，工會，宣傳學校，以及政府各一處。所造成的網，隨後正當我走進食堂的時候，好像突然一道耀眼的閃電，我找到了那答案，有一個人說：「八月的時候真不得了，但是當農民在九月間開始送出糧食的時候，我們大家就開始有東西吃了。」於是我發現波蘭的這個複雜權力機構，追根到底，其簡單不過如此而已。

當德國人在一九四四年中夏撤退的時候，在波蘭所剩下的尚有價值的東西，僅僅只有那還立在若干城市和鄉村中的一些建築物和那些在田地裏尚未長熟和收割的秋牧而已。其餘別的東西全部破壞了，錢幣沒有用了，人民在饑餓和瘟疫中，而且常常連棲身的地方也沒有。

能够使委員會這樣自由發展的，不是錢或外國的承認，而是在盧布林某些房子的控制和某些糧食的積蓄。當委員會得到一些房子和辦公室的的時候，它就有了一個組織的基礎。當它說服了農民把糧食送來供應城市的時候，它的基礎就穩定了。由維斯拉河的波蘭軍隊所保護著的糧食和房——這些就是它的權力的來源。

在這以後，農民和工人們可以來參加盧布林的會議和學校了。他們可以躊躇走過破壞了的鄉村，糧環，赤足，沒有紙或鉛筆，不明一文的來到盧布林，但是他們會得到住的地方和食物。糧

出的工程師們和著名的科學家們可以供獻出他們的能力，於是委員會可以繼續不斷地吸收他們而擴大起來。永遠假設——這是一個偉大的假設——他們都是愛國者，都願意爲了他們棲身之地和一個公家食堂裏的一天三餐而工作。

只要委員會能夠喚起並組織那種愛國熱情，並且只要農民供給糧食，委員會就可以繼續幹下去。任何站在委員會範圍之外的人——不管是由於他的反對，或偶然的原因或尚未組織到他——可以繼續靠他的積蓄，他隱蔽着的東西，或靠黑市而生活，直到委員會擴大到把他吸收了進去。

我的同行者奧肯斯基的命運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我和當心這個動人的老人的前途，他知道關於道路的一切，但一點也不知道如何管理他私人的生活。委員會給了他一張床，並且指定他在我們食堂裏吃飯；於是他跑遍了盧布林企圖找出究竟是誰叫他來的，以及叫他做什麼事情，但他始終也沒有找出來。他開始表現出一種不顧一切的堅定的樂觀；大約在第十天上，他簡直是滿頭春風了。他已經找到知道他的能力的人們，並且被命爲波蘭道路和水陸的副委員了。當他熱誠地投身於工作中時，他仍然和五個別人共同住在一間沒有火的旅館房間裏。

「我們的青年工程師們，」他告訴我，「對於委員會還一直有點格格不入，但是我發現我在他們中間還有點聲望。與我們合作和照我們的方法看問題的人，正在一天一天的多了起來。」四

個月以後——但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了——我知道奧克斯基成爲但澤和蓋尼亞聯合港口的管理人，正在建築着波蘭到海的新出口。在他勝利進展過程的某個時間上——假如你關心奧克斯基的個人舒適的話——他得到三間房子。

就這樣委員會在盧布林建立了它的基礎，並且從盧布林伸展到鄉下去，在若干星期的觀察中，我日益懷疑在倫敦的波蘭人裏面，那一個可以適合於這裏的這種建設。

第三章 盧布林的食伴

在波蘭，生活的基礎是食物而不是錢，六個為高級公務人員不收費的食堂是這個國家的基石。類似的為市政府的僱員和工廠工人的食堂保證這些不可缺少的人羣可以生存下去。用紙幣——捷羅梯——所付的工資和薪水所值極少，在某一個食堂一天吃三頓飯的許可證比任何數量

的紙幣都還更值錢。

做為一個記者來客，我被指定就餐的食堂是最好的一個，我們的食物是以豐富的黑麥麵包和馬鈴薯——波蘭的兩種主要食物——為主，加上少量的肉，穀物和根菜。做為奢侈品，我們的茶裏有糖，麵包上有些黃油，並且偶然還有熟蘋果蜜餞，少量的牛奶只留下給那些在健康上需要它的人們喝；管理這個食堂的快活的老女人因為一個美國人之就食非常高興，所以她經常給我一些牛奶。

只要這些飯够我吃的，我連一分錢也不需要了。我第一次所花的波蘭錢是在盧布林的第二個

三

在期裏，用在買報上。但是當馬鈴薯和黑麵包吃厭了，於是我打發女僕到市場上去買點黃油和鹽來的時候，我發現每種按官價都差不多合到十五塊錢一磅。同時我也發現我可以把一雙普通的新絲襪子——戰前在美國買一塊二毛五——賣到一千八百茲羅梯（紙幣），合官價一百五十元，等於十磅黃油或蜜。於是我明白了在波蘭那些手頭上有點衣服和有用的東西的人們，如何在過去的五年中活了過來。

「我們全參加了投機買賣，」拉比博士，我的一個愉快而精神的食伴說道：「我們研究麵包和馬鈴薯的漲落，用禮仁和鞋子的價錢來表示。現在這些食堂開設了，我們可以集中精力於我們的本位工作了。」他是新國立大學的校長。

在飯桌上，我和許多盧布林的領袖們非正式地熟了起來，人們來的時間極不一致，在十二點和四點之間的任何時間內，都有人匆匆的吃着他一天最主要的一餐飯。沒有保留着的桌位，食堂裏同時坐不下就食者的半數。我們在兩個長桌——支在架子上的板子——上就食，那裏有地方就在那裏吃。這樣就自然使得我經常與不同的人們碰頭，所有他們遇見我的時候，都沒有正式的介紹，但全都熱誠地談起他們的工作來。這是一個新制度典型的擴張時期，它覺得自己的革命性，並且要向世界解釋它自己。

老年人之中有一個是捷巧夫斯基，「司法處」的處長。他那沉著的中年政府官員的典型面貌，很少暗示出他那高度革命的過去歷史，他是農民黨創始人之一，這個黨是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德國佔領期中，由一個在皮奧特可夫的地方團體組織起來的，後來與一些別的團體合併起來而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當凱色爾的軍隊崩潰了的時候，年青的卡西米爾協助組織了新波蘭政府。

「一九一八年羅茲爾斯基和我在盧布林建立了第一個政府，」他告訴我說，「二百年來第一個獨立的波蘭政府。」

那時他年青時的光榮。他對於這一點的記憶被悔恨投上暗影。「我們那時沒有徹底地實行土地改革，所以一切都丟掉了。地主的獨裁又取得大權，這就是所以我不同意米柯拉茲柯——他也是屬於我們黨的——的原因，因為他要把土地改革再度推延下去。」

不像許多年紀大的進步份子，捷巧夫斯基尚未失掉他早年的熱力。做為一個代表，他冒了生命的危險去參加第一次的非法西逃，這個西逃是一九四三年除夕在華沙秘密舉行的，四個月以後當他和李米爾斯基將軍冒險飛到莫斯科去的時候，第一次飛機就失事了，德國人在森林中搜索了五天來尋找那些不能起飛的人。很難想像這個安詳，兩肩前曲，帶着深色眼睛的人曾在森林中藏了五天。

經過他我遇到塞斯陸克，職犯特別法庭的檢查官。他向我問候的時候容光煥發，並且告訴我他有五個兄弟都在第特律爲佛特工作。他肚子裏充滿了令人毛髮森然的故事，都是關於蓋斯塔波（GESTAPO）（希特勒的祕密警察和特務——譯者）以及那些幫助拷打或殺害犯人的人們的故事。「這些幫兇者不說蓋斯塔波用了死亡或監獄來威脅他們這樣做，但這不是做爲一個人背叛國家的藉口。」

這些罪犯的審判正在解放區三個不同的城市中進行着，這樣被認爲安全一些，否則的話，受到迫害的人民會親手來懲辦犯人。法官們由「司法處」自至少有兩年經驗的律師中提出名單，他們的任命還要得到芮達主席團的批准，每一個法官有兩個市民助手，都是自教師，工會人員及其他負責人員中選出的，以便執行與一個陪審團相類似的任務。

「這是在盧布林所舉行的第一次有陪審團的審判，」塞斯陸克感覺光榮地說，並且解釋，盧布林在以前屬於帝俄的時代根本沒有陪審團，在波蘭共和國時代，盧布林不是一個司法中心。

一個被審判的人——以前在波蘭軍隊裏當過兵，叫做米塞爾斯基——曾經是克魯克馬爾那亞街第六號中心的負責人，在那裏從鄉間來的波蘭人被集中了起來，然後送到德國去做奴隸，證據中指出米塞爾斯基在那裏強姦過女孩子，並且在把她們送到德國去之前，他曾把她們爲他自己留

下過好幾個禮拜。還證明出他把一個盧布林工人委員會送給犯人們的食物扣留了。沒有一個年青男人敢把這項食物送法，因為他自己也會被抓了去。老太太們帶着食物去了，米塞爾斯基打她們，把她們踢出去，並且把食物扔在地上。在審判中米塞爾斯基被六個人認了出來，他們走上講台加上他們的證據。

「他被判決了，我親自參加了的，」塞斯陸克結束道。

達茲科——他的另外一樁案件——即使做爲使人打戰的恐怖小說都難令人置信。她站在台上，帶着她新燙的深褐色的髮髮，用她的色相向全法庭挑戰。證據中指出，做爲一個蓋斯塔波的特務，她曾經用出賣的方法害死她的後母和一個不同母的弟弟，報告他們把食物送給森林中的游擊隊。達茲科自己的父親要求判她死罪。

她爲了她的生命拚命的掙扎，判罪以後，她請求貝魯特總統發慈悲。當拒絕了她的時候，她又要求說她懷了孕。「這使她得到一個時期的緩刑，同時一個醫生委員會進行檢查，」塞斯陸克說：「假如她的話是真的，行刑就得緩下來。德國人從來不會因爲這些事情而緩刑的。」

在塞斯陸克的那些窮兇極惡的人物展覽中，最有價值的是一張名叫米斯特思卡雅的女間諜的照片，她出賣了許多附近的鄰人。「她自始至終盡無恥之能事。當她到了絞架的時候，她取下她的

全首飾並且要求我們把它給她的妹妹。做為她最後的願望，她要她的妹妹取得所有她隱藏着的東西，問她那是些什麼東西的時候，她說：「那是當我弄到猶太人的時候蓋斯塔波讓我去的東西，」她開始數說那些東西，一面說：「等一下，等一下，現在我想起他的名字來了，以及我藏東西的地方。那裏有六個真珠寶戒指。」她正在臨死之前爭取時間，但她真的相信她可以立下遺囑把這些東西都給他的妹妹！」

有兩個我的食伴，對於那些在納粹下面的猶太人的命運，知道得非常清楚，左羅斯泰因博士——白頭髮，白鬍子，態度仁慈——是援助猶太人組織的主席，而生氣勃勃的海森荷恩博士——戰前曾做過盧布林城市會議的代表——是關於猶太人情況的特別顧問。他們告訴我，在戰前波蘭的三百五十萬人中，剩下的還不到十萬人。

他們講到詳情，「盧布林本身曾一度有過四萬二千猶太人；當我們解放了這個城市的時候，我們只找到五十人。到現在為止，在整個解放區中我們只記了八千猶太人，但可能有兩倍或三倍這個數字的猶太人，還沒有來登記。在外邊，也許有二十五萬波蘭猶太人散佈在蘇聯各處，很明顯，被殺的在三百萬人以上。除此之外，大量的猶太人從納粹佔領的歐洲各處被送到波蘭的死營裏面來。」

「波蘭曾經是歐洲猶太人的一個大墓地。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出版印刷，和我們的學校的一切痕跡都和我們的人民一齊被毀滅了。在那盧布林的古老的猶太公墓裏，一百多年的墓石都被折出來做了邊道和地基了，在那新的盧布林公墓裏，只留下了一個磚瓦狼籍的地下墓穴了——那就是邁野拉比（猶太人稱法學博士爲拉比——譯者）的墳墓。他是盧布林的最後一個拉比了。」

阿特曼——勞工問題和社會福利的負責人——是這個悲劇的一個活着的例子。在我想到問他的工作以前，我已經看見過他那脆弱而不惹人注意的形體默默地出入食堂許多次了；隨後，他那薄薄的面龐下面一張消瘦的臉上的那些飽經憂患的線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他在戰前曾經是總工會的一個代表。

「我是現在波蘭所剩下的唯一的一個代表了，別的人不是逃亡到倫敦去了就是被殺了。」當我問他是否我可以在新聞電報上用他的名字的時候——我的許多食伴反對這一點，因爲恐怕危及他們尚在德國人的手中的親屬——我爲之大吃一驚。阿特曼安靜的說：「一點也不反對，所有我家裏的人和親戚們都已經被殺掉了。」未加以進一步的說明，他繼續討論起在建議中的若干新勞工法。他說，土地改革的主要組織者，不經常來食堂。因爲他要到鄉下地區做許多旅行。當我看見他的時候，他常常是被討論所吸引去了，是從別人處我聽到說他是一個農人的兒子，後來成爲一

開鄉村學校教員，一九三四年畢業於華沙的法學院。我在公共集會中看到他好幾次，在那些場合與他是一個有力的辯論家。假如我在他經過的時候抓住了他，他總是帶着匆忙而決斷的樣子交給我一些統計數字，但是這些數字很少與事實吻合，這並不值得奇怪，因為波蘭的疆界時常在變，同時耕地的界線也因為幾次的災荒而受到影響，甚至連農民人數都不能確定地舉出來，除非知道有多少人將自軍部地區遷徙出去，以及有多少人可以從德國的奴役中生還回來。

伯脫說，土地改革的目標是要給每一個農民家庭至少十二英畝地（約和我國七十畝地——譯者）。『我們認為一個農民家庭，合理地使用其土地，再加上國家的借款和以合作社的方式來購買機器及種籽，就可以靠這十二英畝地過得很好，在荷蘭他們的平均數是五至七英畝，但那些土地都是經過高度耕種的。在捷克他們有十八到二十英畝，在丹麥是十到十五英畝。只有加上東普魯士以及西面其他的土地，我們才可以達到丹麥的標準。』

波若維斯神父，一個穿着黑牧師袍的類似圓錐上的人物，每當他到城裏來的時候，在我們的食堂裏就很顯著。他是赫斯左夫區西述的主席——一個小省的省長。在戰前的波蘭，他在農民黨中會繞在那個地區很重要。在淪陷的幾年中，他從一個村旅行到另外一個村，『和農民們商討，看他們是否分得公平。』他是他那個地區裏的神父，其意義不僅僅限於宗教。

一天正午，我碰見那漂亮的斯特拉却爾斯基——比亞利斯克克區的區長；那個地方的工業幾乎全都被德國人破壞了。『有四分之三』的工廠得從廢墟中重建起來，其餘的最後尚可以修復。』他曾組織了產業工人在破爛堆中去尋找機器和零件，並且居然在瓦礫中找到一些有用的機器。在土地改革中，他的區域首先完成了分地。『我們的土地分得很容易，因為德國人把土地全霸佔了，造成巨大的德國地主，每一個都差不多有一千英畝地；當紅軍來到的時候，這些地主都跑掉了。那裏的土地不啻使每個農民家庭分到十二英畝，所以他們正向北邊的蘇瓦基地區遷移，在那裏德國移民扔下許多土地。』

衛生處的湖處長莫爾斯基是一個面帶憂容的人。他朝着那正在匆匆吃飯的數十公務人員頻頻點頭。『這些人充滿了樂觀，但我告訴你我正在擔心流行病。』他憂鬱地說，在淪陷時期流行病猖獗的時候，曾負責過掃蕩工作的他，知道什麼是可怕的。他曾經見過從未讓全世界知道過的許多事情。

『波蘭已經失掉了太多的人民。土地改革和進步的法律全都很好，但首先得使波蘭人能夠活着。在三千三百萬人民中至少有八百萬死於死難和流行病。你奇怪我的焦慮嗎？我曾經到過許多縣，十萬人口中有三萬人生殘傷殘。有些村子，人全死光了，我將永遠也不會忘記在一個農民

家裏的那副情形，在那兒我發現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都死了，還有一個快死的小孩子，這個孩子是那女人在她最後的痛苦中剛剛生的。

「德國人造成這一切。他們把好幾百萬的波蘭人從西方運到德國的中央政府去，既不給他們住的地方，換的衣服和肥皂，更不給他們醫藥。由於這種不衛生和貧窮，以及在猶太人區裏的饑餓和過於擁擠，流行病就散佈了起來。一九四一年以後，流行病自那些大的蘇聯戰俘集中營裏散佈起來，在營裏，俘虜因饑餓而死去，我在克爾巴阡山中看見過一個這樣的集中營，在那裏八萬俘虜一個月就死掉六萬人。當斑疹傷寒達到最高峯的時候——三四十萬病人——德國人替他們的軍隊害怕起來了，所以他們讓我們甚至在波蘭人民中間去撲滅它，但是他們不給我們任何疫苗為我們醫療人員用，這是他們毀掉波蘭醫生的方法之一，戰前我們有一萬二千醫生，但是現在只有四五千了。」

莫爾奇斯基博士找到一個方法來欺騙德國人。他曾經工作了十年的華沙衛生所的一些實驗室被德國人接收了，但是却繼續雇用波蘭人員。波蘭人們就組織了一個地下的大學和若干實驗室，莫爾奇斯基博士是細菌學的教授。「我們秘密地在地下室裏製造疫苗，給所有我們撲滅斑疹傷寒的衛生人員都注射了，德國人假如知道了這件事情會把我們殺掉的。後來我做了人民軍游擊隊中

的醫生。我們醫生有近代知識，但是我們今天的環境却是中古時代的，嬰兒正因為白喉而死，但全波蘭却只有一百五十瓶抗毒素。

「學校裏」的處長——一個隨便而不修邊幅的美國西部型的人——是一個教育熱心家。「假如我再活一輩子，我還會做教員的。」他告訴我，當他知道我要聽點關於學校的事情的時候，他邀我晚飯後到他的辦公室裏去；那時他可以有時間做一次不慌不忙的會談，因為戒嚴使得那些偶然的來訪者來不了。他蹲下身小聲的告訴了我口令——「彭巴」（俄文意為炸彈——譯者）。戒嚴口令經常是很容易記的，因為，一定要使蘇聯人和波蘭人都明白。

斯克捷奇夫斯基博士發現很喜歡我讀他的名字，那天晚上在他的辦公室中我們相當愉快地談着念他的名字。儘管他得了克拉考夫大學和巴黎索彭大學的兩個學位，他的進步遲鈍和他在教師聯合會的活動，使他在職前的波蘭不能有一個固定的地位。他在一個師資訓練學校教了幾年，但是他的名字從來沒有經常地列入教員冊上。「我只有過一個快樂的暑假。因為我事先知道了秋季我還可以教下去。」當一九三九年德國人進攻的時候，他從克拉考夫向東逃跑，這位博士為勒佛夫的小學預備教本。以後，在波蘭愛國者同盟的下面，他在蘇聯到處為波蘭的孩子們組織學校。現在他正在解放了的波蘭開辦學校。

「在敵人佔領下的學校數量很少，而且質量很壞，」他說：「小學只有六級，平均一個先生要教八十個孩子，沒有普通的中學和大學。非法的教育進行得很廣泛，甚至成年的男孩子們也變成非法學校的熱心學習者。」他在說「男孩子們」的時候笑了一笑又加上道：「這些學校由於蓋斯塔波的襲擊而被解散了。孩子們學會了規避蓋斯塔波，要是帶着學校課本而被捕的時候。他們就說他們正要拿它賣了去換食物的。這些軍使得我們的孩子們比他們的年齡更成熟，但却缺乏正式的教育。」

「一個地區剛被解放，我們就馬上辦學校。我們的教員們完成了一件英勇的工作，他們組織了父母和孩子們來修理房子，製造傢具，和搜集書籍。功課時常得在教員自己的屋子裏來上；到處都缺乏桌子，課本，紙和筆，而比一切都嚴重的是缺乏鞋子和溫暖的衣服。天氣不好的時候，許多孩子必須得呆在家裏，並且在靠近前線的地方，我甚至會看見教員們光着腳來教書。學校也被戰線所影響。九月間在普刺格，當若干主要街道尚在敵人的直接砲火之下的時候，許多學校關了好幾個星期的門。我們的教員們表現出相當的聰明，甚至當普刺格還在前線上的時候，他們居然能開好幾個學校，辦法是在他們自己的房間裏開小規模的班，以便使孩子們不必穿過危險的街道。」

「不管這些困難，這個秋季，在差不多總數七百萬人民的人口中間，我們將近有一百萬的孩子在學校裏。」你可以看出他的信心來。

辦公室的門忽然被一個頭髮零亂，領帶歪斜的瘦長男人推了開來。那是加努斯，事實上是波蘭的副總經理，他帶着一個困惑的學生的樣子走近斯克捷奇夫斯基博士。跟着爆發出一陣言語的急流，隨後兩個人都笑了，並且熱烈的握手，加努斯帶着勝利的神氣走了。「怎麼回事？」我問道。

「我正在組織一個到莫斯科的參觀團以便使我們的五十個領導人物藉以熟習一下蘇聯的文化。加努斯也去，他要把他的兒子帶去。我已經同意了，因為我們還有幾個空額。有些被邀請的人蔑視了我們，理由是蘇聯根本沒有什麼文化可看。」他做了一個鬼臉。

關於那些新大學的事情，還要等我的朋友拉比博士來告訴我，他以前是勒佛夫的一個動物學教授，現在正在盧布林組織新居里大學，他在飯後來到我的房間。他帶來了格茲哥捷夫斯基博士，他是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畢業生，現在正在組織醫學院。新大學的其他教授們則是從維爾維，勒佛夫或是穿過德國人的防線從華沙或波茲南來的。

盧布林從來沒有過一個大學。在這個城市裏曾有過一個小的天主教學院，它和波蘭所有的高級教育機構一樣，也被德國人給封閉了。在紅軍剛剛解放了這個城市之後不久，這個學院就經過

委員會的協助而重開了。但它的學系只限於神學，法律和古典文學。所以委員會決定一個國立大學，包括各種科學系如農業，醫藥，製藥和獸醫。他們把一座以前是一個高級學校——有六十間房子——的建築交給拉比博士處置，並且在一個醫院裏劃給他幾間房子做實習用；除了祝禱與許多學生而外，這就是委員會所能給予的一切了，六百個學生馬上來學習。

「他們全是戰前中學或戰爭中所辦的地下班的畢業生。沒有更多的設備，我們不可能把他們全收進來。我們也正在爲着一百多個從波蘭軍隊裏送來的學生組織高級班——這些青年人具有兩年或三年醫科訓練的基礎，曾經不斷地動緊急手術。我們一定得幫助他們充分合格。」

「但是沒有書籍，沒有顯微鏡，沒有圖表和實驗室設備，我們怎麼能夠辦一個大學呢？美國人奇怪爲什麼波蘭向美國紅十字會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先用飛機把大學設備運進來。我們沒有得到設備，他們說我們第一需要食物和衣服而不是那些擺飾。他們是否了解——」

——拉比博士帶了感情而說話這是唯一的一次——「這關係着波蘭的心理的和精神的生活哩？納粹們曾經殺害了我們許多的醫生和科學家，除非我們馬上可以利用那些剩下來了的醫生和科學家們，並且把他們的技能在下一代中加倍繁殖起來，那麼納粹毀滅波蘭文化的目的就會成功。」

「你們所得到的那所房子除了空牆而外，還有些什麼？」我問道。

「大量的新鮮空氣，」格茲哥捷夫斯基博士苦笑着回答，「以及許多的被窗戶，而且波蘭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製造玻璃的工廠。我們會把窗戶加以修理或釘上木板，我們會做了大小桌子和板凳。本地的醫生曾捐助了若干顯微鏡和溫度表，但是我們需要兩百架顯微鏡，而在整個盧布林我們只找到半打，納粹們把其餘的全都拿走了。」

「比一切都嚴重的是書籍和近代科學雜誌的缺乏，」拉比博士補充說。「我們的教授們要靠記憶來教許多東西，這對於文學和人文學還不太嚴重，但試想一下，要記住許多科學公式和醫藥技術上的細節該有多麼困難。特別是你的記憶力被糟蹋了五年，在這五年中波蘭知識份子過的是——一種遭受搜捕的野獸的生活。」

比較年青的格茲哥捷夫斯基博士給我看了一封信，是一九四一年他自羅氏基金委員會收到的。在那通常的公文語句中信上說一九三九年給與格茲哥捷夫斯基博士做爲在歐洲做科學旅行的款子已經取消，理由是「由於不幸的情況」，他已不能做該項旅行了。這是一個輕描淡寫的典型傑作，所謂「情況」就是歷史上最可怕的戰爭。

「現在假如我們能有一點點那項款子該多好呀！」當他們站起來要走的時候，拉比博士這樣說。

我最友善的食伴之一是金·開羅·文地，一個年青的波蘭作家，「文化處」的助理處長。他和我住在一所房子裏，就在我的下面；當我要打電話的時候，我就到他的屋子裏去打。他帶著狂想告訴我他正在設法發展讀者羣衆，「假如只有這樣我們作家才能生活的話。」他比較更嚴肅地補充說，在戰前，甚至波蘭最好的作家們也不能靠寫作來生活，他們做別的事情，而在空餘的時間寫作。

「以前我們的知識份子階級收口很小。波蘭的人民是不買書的。上層階級買書，但只作為牆壁的裝飾品。恰好現在許多地主的別墅在土版改革中落到我們手裏來了。別墅的主人們被允許可以拿走裏面的東西。他們拿走大量的傢具，但常常把書籍留下來。我就把這些書蒐集了起來，並且利用它成立了一些公共圖書館，對於我們，這些圖書館被德國人毀壞了的人——單單華沙公共圖書館就失掉二百萬冊書——這些書簡直就是生命！」

他開始用報紙捲一支香煙。舉起煙來，他解釋道：「我的做爲副委員的薪金是每月一千五百茲羅梯（紙幣）——在市場上合五塊美金，差不多剛够我抽香煙！一個月快完了的時候，我就自己捲煙抽，你能設想倫敦的那些傢伙（指倫敦波蘭流亡政府——譯者）也用報紙捲他們自己的

香煙嗎？」我們兩個都笑了起來。

當我們十分熟了以後，有一天金從他的口袋裏拿出一張剪報來，這張東西一直摺起來帶在他的身上，摺的地方差不多都磨破了。那是一首帶着他的簽名的詩，「我在一九三八年寫了這首詩，五年以後，一個在中央亞細亞的波蘭籍的猶太律師將它給了我。這是我所有的最寶貴的東西之一。」

我等著聽這個故事。他看我就要聽它，所以他繼續道：「我曾經在安得斯的軍隊裏，但當他去伊朗的時候，我不願意離開蘇聯了。」

「你可以自由地留下嗎？」

「哼，你猜怎樣？他們可以把我這個空額賣給許多沒有軍隊關係，因此也不要待遇的波蘭人。未走官兵的空額的交易可多得很哩。於是在安得斯走了以後，我在中央亞細亞跑了一些時候，並且給那裏的波蘭人組織了一個中學校。這一下別人知道我了。這個猶太律師找到我並且給我看這張剪報，問我是否記得是在什麼時候寫的。」

「當然我記得。那一年在華沙有一個關於兒童福利的會議。波蘭的法西斯集團選擇了那個時候來毆打猶太兒童；他們把嬰兒從嬰兒車裏扔出來，並且把學校裏的孩子們打得失去知覺。所以

在一個小的民主週刊上我寫了這首詩，詩中說，兒童福利一定要不分種族從照顧一切兒童做起。

「那個猶太律師說：『我剪下了你的詩。並且當我的小女兒問我——那時七歲——爸爸，爲什麼他們打猶太小孩？我就告訴她，只有壞波蘭人才這樣做，並且還有好波蘭人反對這件事。我給她念你的詩，因爲我不願意讓她長大起來仇恨波蘭人……但終於她永遠也沒有長大起來。一九三九年當他們命令男人離開華沙的時候，我把她和她的母親留在那裏了。我從來沒有回去過。很久以前她們就都被殺了。這張剪報是我那小女兒所剩下的唯一的東西了。這如同有她的像片一樣。」

在隨後而來的常久靜默中，我看看文地又看看那張剪報。「你把它從他那裏拿走了，」我帶着責備的口氣說。

「我們兩個全想要它。但是那父親說，假如我願意親筆寫出全詩，並且簽上名，他願意和我換，並且認爲這在兩個都反對種族仇恨的波蘭人——一個猶太人，一個斯拉夫人——之間，是一樁公平的交易。我想這件事是我來『文化處』工作的真正原因，我要影響下一代的思想。」

在盧布林的那些星期中，我所聽到的最浪漫的故事就是列茲上尉的故事。戰前他是一個知名

的諷刺詩作家，他在戰爭期間的冒險可以寫一部驚險的偵探小說。蓋斯塔波和NSZ（波蘭反動恐怖者集團）都判了他的死刑，由於「一個大奇蹟」他從塔諾夫的集中營裏逃了出來，後來做爲一個游擊戰士，他靠一天一天的奇蹟而活下來。一九四四年的春天，做爲藍布林區人民軍的參謀，他接收波蘭傘兵和紅軍在森林裏的空隙中所丟下來的武器。他現在是波蘭正規軍的上尉，但是他的無線電員却落在西邊波蘭敵佔區一支游擊隊裏去了。

列茲給我看了一張整潔的小卡片，上面有他的照片和官方的證明，證明他曾是一個華沙的電廠裏工作過三年，每一年都有一個不同的官方簽字，並且蓋有德國中央政府所稱市政官的印以及德國的壓徽。他笑了。

「所有這一切都是假的。我們人民軍有一個部門專門製造它。爲了空白證件和印鑑我們襲擊行政官員。有時候行政官員的辦公室裏甚至就有我們的人，直接供給我們這一切。這個證照僅僅對於那在街上攔住你的普通軍警督察是可以通過的。假如他們到蓋斯塔波的辦公室裏去查一下，我就完了，花一個大價錢，你可以得到一個甚至與蓋斯塔波的記錄都符合的護照。」

一九四三年的秋天，當列茲正在主編一個名叫「戰爭中的士兵」的地下報紙的時候，他被人告密了，自然他是用一個假名字住在那裏的，「我從我們的情報機關知道NSZ已經把我的真名

字列入他們的死名單上了，我們馬上離開我們獲報的房子。第二天蓋斯塔波包圍了那所房子，但是誰也沒有提到。這類事情說明波爾法西斯份子與蓋斯塔波之間的連繫。我馬上被送到維斯杜拉河的那一邊，以便用另外一個名字再出一種報。它就叫作「自由人」，我們在倉庫裏印刷它，經常自一個村莊搬到另外一個村莊。

列茲最危險的事業是他在塔諾波的逃跑，他被關在那裏的一個集中營裏差不多有兩年之久，「一個饑餓而污穢的地方，和極其渾克的死營差不多，只不過沒有那集體殺人的高壓技術設備而已，我對於德文的熟練——我生在那時還屬於奧國的勒佛夫——使我得到一個醫院裏的傳令兵的位置，當醫院因為斑疹傷寒而變得擁擠的時候，病人們就被槍斃以便騰出房子容納更多的病人，沒有打防疫針而在那裏工作，我知道我將會得斑疹病的，所以我和另外一個傳令兵商量好了讓他藏起我來；我們有一個生病的時候，另外一個就把他藏了起來。這樣當斑疹傷寒的患者被槍斃的時候，我逃過了一次這種掃蕩。

「一九四三年夏天，從一個德國醫生辦公室裏的一張報上，我知道紅軍近了。我們有一個六個人的小小的地下組織——都是彼此可以信賴的老同學。我們知道德國人在撤退以前會把犯人都殺死的，當他們喝醉了的時候，他們公開的誇口說，我們將永遠不會活着看見紅軍的到來。我們

這一羣做過幾次逃跑的打算，但是都沒有成功。我們之中有一個用賄賂的方法得到一套SS（德國黑衫黨——譯者）的制服，我們有個模糊的概念，認為也許會有用處。

「他們選了七月二十二這天晚上來結束集中營，他們把我們所有的人都帶到一個大空場子上，並且讓我們翻一個一面深的溝，爲一個墳墓。我們必須跪在溝邊上，而SS（黑衫）黨徒們急急地一路走過來，一面從犯人的腳後開槍並且把他們踢下溝去。殺一個人只要一個動作，迅速而有效。忽然間我們中間一大羣人跑開了，於是德國人就向我們開擊。我不知道是誰開始的，也許我第一個先喊的，也許是別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跑掉了。我的人之中有五個跑到集中營裏去；可能德國人認爲他們稍遲會捉住我們，所以朝這個方向射擊得少一點。我們在集中營裏一個小草房子裏藏了一整天。」

「第二天晚上，我穿上那身SS制服——我穿上它原因是於由我的準確的德文——並且把我的同伴們當做我的犯人趕出去。德國人已然軍心渙散，我們經過一個哨兵又一個哨兵。那身制服缺乏帶子和帽子，假如他們看見我那犯人用的帶子和普通的帽子，我們就全是死人了，一直沒有發生什麼事故我們來到塔諾波利路的那座橋——這是我們唯一出去的路，由精選的SS軍守衛着。」

「我們帶着相當的信心向前走，因為我們以為我們是有武器的。我們會從集中營裏偷到兩隻生了錯的左輪和幾個手榴彈。那時我們想頂壞也不過和衛兵們同歸於盡而已，現在當我知道了真正的武器是什麼的時候，我才覺得不安而慄，我們那時根本沒有那種機會！」

「於是奇蹟來了！衛兵喊道：『Halt! (停下)，我們不管，仍然往前走，他又喊『Halt!』，並且向我們走來。於是我走向前去——我最初在後邊——並且他用手電來照我，手電照在我的胸上和臉上。高一吋或低一吋就會照出那帽子或帶子來。」

「Achi! Das sind Sie! Verzeihung!」(呀！原來是您！請原諒！)手電就熄了。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聲調，他一定把我當成一個非常重要而不能隨便攔阻的人了，我甚至不能回答他。我命令我的犯人：『Halt! Das ist der Weg!』(年青人，前進)，我們向前走了兩哩才想起呼吸。

「這比我寫的任何東西都更來得諷刺，這是一個奇蹟。並且因為這個奇蹟我才活了下來。後來，由於對於死亡甚種日益不在乎的態度，我逃過許多危急關頭。有一次在華沙戒嚴以後，我照直走過德國警察，只是上氣不接下氣的說因為太晚了所以不能停下來，死已經辦得沒有意義了，我曾經看過太多的死人，死是一件單調的事，活着才有恐怖與變化。」

雖然列茲並沒有放棄做一個詩人。『在塔路波的最壞的日子裏，我還寫諷刺詩。這些詩現在都丟掉了，因為我已給忘了它們而原稿也埋到土裏去了。當我最好的朋友被槍斃並且被關在溝裏去的時候，這些詩藏在他貼胸的口袋裏。他老希望可以逃出命來，他在保存着我的作品以便傳諸後世，我自己却從來沒有想到可以活著出來。』

由於機會，由於勇氣，並且由於奇蹟，唐布林的領袖們才活到今。

第四章 國家的首長

我第一次和莫拉夫斯基——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主席——的私人碰頭是很窘而又帶戲劇性的。我參加一個合作社大會而去晚了，於是從幾千人中擠到前面去，結果只發現記者席中每個位子都有人了，在貝魯特總統的演說中間，我一個人孤另另地站在大廳的正前面。

莫拉夫斯基沒有在台上，台上是給合作社的執行委員會保留着的。不知道從什麼人的會客室裏搬出來的四把華麗而又俗氣的帶扶手的椅子，很顯著地擺在一小塊空地上，剛好在講台的前面，並且正好對着講台，以便政府的重要人物在他們有空的時候，可以不用經過羣衆而出入，三把椅子是空着的，莫拉夫斯基佔着第四把，他看見我正在站着，於是招呼我坐下，我們兩個佔了這個非正式的政府包箱有半小時之久，沒有人關心那草案，除了那些在記者席上的人們，他們在第一次休息的時候替我找了一個位子。

隨後莫拉夫斯基向大會演講。大會包括許多實際的農民，他們到盧布林來組織合作社事業，

並且看看這個新委員會究竟是怎麼回事，在政治上他們還沒有明確地表示自己。做爲台上的裝飾，他們既不用莫斯科的紅色，也不用波蘭國旗的顏色，但却用的國際合作運動的紅旗。在台上的執行委員包括幾個強壯的農民，一個從事社會事業那種類型的灰髮女人，和一個男人，樣子看起來像一個小市鎮裏的銀行家。

起頭莫拉夫斯基沒有得到熱烈的掌聲，他很少用演說家的技巧。他幾乎不利用前線只有六十里遠這個事實，他那在零亂的深棕色頭髮下面的蒼白面孔，看起來有點疲倦，但却和善而誠懇，他請出委員會各種政策的輪廓以及其與倫敦流亡政府不同之點。他的演說很長但是不繞灣子，不是感情的而是解釋的，當他說出他的要點時，大廳裏點頭同意的增加了。

「安得斯將軍把我們波蘭的軍官帶到非洲沙漠裏去了。他帶着他們去爲羅馬作戰，但是在我們的波蘭新軍到來之前，在這裏沒有人給我們打仗。」提到軍隊的時候，掌聲才第一次熱烈了起來，講完了委員會對於米柯拉茲克的邀請，以及米氏堅執問題一定要送到他在倫敦的同僚等等之後，演說者說道：「波蘭的問題一定要在波蘭決定而不是在莫斯科或倫敦決定。」這時掌聲又一次地高漲了起來。聽衆裏面每個人都清楚地接受了這一點。他們是波蘭土地的耕種者，外國資本左右他們的命運使得他們深覺擔心。

莫拉夫斯基崇拜各種大會，後來在他的辦公室中，他對我說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老在盧布林領袖人物中轉來轉去。到農會裏去，到工會裏去。看看並且聽聽波蘭的人民。」假如我在盧布林錯過了一次集會，事後他一定會責備我道：「我沒有在鐵路工人大會上看見你呀，」或者「我沒有在殘廢軍人大會上看見你呀。」這是否是從前他做爲波蘭社會黨的組織者所留下的習慣呢？不管怎樣，他從來不錯過一次集會，他不僅僅去講話，並且還坐在羣衆中間看着和聽着。他正在聽着一種他認爲是「人民的聲音」的東西，對於這個東西他具有一種理想的信任，我懷疑他是否是在研究力量的來源和領導的技術，我斷定他是一個誠實的但也許是一個不善分析的民主份子。

在我們第一次的私人談話中，他是如此的和善而滔滔不絕，我甚至冒昧地問他：「你想爲什麼他們把你挑出來做主席的職務呢？」他有點難爲情似的回答道：「我想他們需要一個人而我在那兒。」

「也許是因爲別人很容易和你相處，並且樂於接近你的緣故吧，」我這樣試探。「經過所有在波蘭的爭吵之後，也許這一點正是目前所需要的。」他似乎對於這個想法發生興趣，而不是對於這個贊許發生興趣，我懷疑他是否對於他去年除夕，他們選他作第一次非法黨連副主席的原

因，加以許多的思考。我想他不過把這個職務當做一件「大多數決定」的東西而接受。

在戰前的時候，歐蘇布卡是一個律師，一個經濟學家和波蘭社會黨一個地區的組織者。一九三九年，爲了支援那有名的英勇自衛戰，他幫忙組織了華沙的工人，那以後他轉入地下，起了莫拉夫斯基這個名字，（今天他同時用兩個名字，中間加一橫，）做爲第一次非法芮達的代表，他被選爲副主席，無疑地一部份原因是由於他代表著 P P S（社會黨）。後來以他爲首的代表團在莫斯科得到顯著的成功，這個事實無疑地促成他被任爲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主席。

有些時候他是非常奇特的，在別的時候，他那如流的對答帶出一種天才的表現。我第一次在他的辦公室裏和他談話的時候，我告訴他，我發現和我在莫斯科的秘書取得連絡真不容易，甚至於要知道我的新聞電是否發出去了都很難，「我可以幫你的忙，」他說道，一面抓起他的電話來。他對電話說道：「給我接莫斯科。」我楞起來了，難道是一有權力的人真就這樣容易嗎？於是整整十分鐘之久，我看見這個政府的首長氣急敗壞的情形，和一個普通人叫不到電話時的情形完全一樣。他喊道：「給我接波蘭大使館，不對，不對，不是參謀總部，莫斯科？什麼？給我接莫斯科。」用普通人類的方法他叫不通莫斯科。很難設想一個國家的首長這樣地在一個外國人面前承認他技術上的困難。

一天下午，當我在政府報紙辦公室裏的時候，主筆波瑞斯查抓起電話向莫拉夫斯基道歉，他由於疏忽沒有把後者在合作社大會上的演講登出來。他希望莫拉夫斯基不致於在意。莫拉夫斯基馬上回答道：「你是一個好主筆，那檔東西不值得登出來。」爲了委員會的和諧工作，這種迅速的反應差不多是一種天才的表現。

我的朋友文地告訴我，莫拉夫斯基怎樣才得到他的新衣服的經過。當他們剛剛到盧布林的時候，文地和莫拉夫斯基及敏斯共住一個房間，「所有的人都睡在士兵式的小床上。」這就是他所以知道那套新衣服的原因。

「當莫拉夫斯基從地下出現的時候，他是相當體面的。簡直可以說和叫化子差不多，他必然就要會見那些戎裝齊整的蘇聯軍官們。所以他的副官——那個叫維可夫斯基的機靈小鬼——不知怎麼弄的從地下挖出一點像樣的料子來，於是就拿給他的首長。但是莫拉夫斯基不好意思穿，「當許多波蘭人還在赤腳走路的時候，爲什麼我得穿新衣服呢？我的舊衣服够我禦寒的了。」

維可夫斯基不高興，他希望有一個穿得像樣一點的首長。他讓我們其餘的人知道他已經找到料子了，最後我們大家決定我們委員會的首長得有點樣子，所以由於我們的贊助，副官找來一個裁縫，並且把他引進房裏來，一面說道：「每個人都認爲你看起來不像一個國家的首長。這

裏就是裁縫，」莫拉夫斯基的好脾氣使他不能再反對。

「我們各「處」首長彼此間的和好多半是由於莫拉夫斯基，」文地加上說。「戰前我跟他不太熟，因為那時我在農民黨而他在社會黨。最近幾個月來，我對他知得更清楚了。他那沒有架子的友善使一切事情進行順利，他那誠實的理想主義和不要私人享受影響了每一個人。過於追求比首領得的還多呢？而莫拉夫斯基簡直什麼也不要，有一半的時間他忘記去支他的薪水。」

幾天以後，金和我正在想如何找交通工具到梅丹涅克去看那些戰犯的處決，這些人會在梅丹涅克協助組織屠殺。我建議我們設法搭莫拉夫斯基的車去，「莫拉夫斯基不會去的，」文地說。『假如他能避免的話，他連一個蒼蠅的傷害都不願意着。』

我很少看見一個政治人物這樣的和平而富於人性，這樣的謙虛，甚至於這樣的自己否定自己。我曾經聽到過若干 P P S (社會黨) 的人們，儘管在公開場合褒揚這個事實，「那就是他們黨裏的一個人做了政府的首長，但私下批評他『太重視了別的黨』。他這種不願意一看見一個蒼蠅的傷害』的敏感，一定使許多政府必要的行動對他是痛苦的。在我看來，有許多時候，他似乎被波蘭所有的苦難和衝突所「啃噬」着，我擔心他究竟能支持多久。

● 幾個月以來，莫拉夫斯基對於他個人的情況以愉快處之，這種情況將會使一個潑量不同，自

私心人一點或個人願做強一點的人不能忍受。他很清楚的知道，在盧布林的頭六個月中所討論的和倫敦波蘭人合作的所有各種可能條件，都以他爲犧牲品。他的職務，一次又一次地被拿出來做爲取得協議的一部份的代價。莫拉夫斯基他自己仍然經常地去莫斯科幫助他們的同僚來邀請米柯拉茨克代替他的地位。只有一個具有偉大政治家風度或極端謙虛的人才能這樣愉快地做這一切。就莫拉夫斯基而論，我想主要的是謙虛，或許兼虛有些時候就是政治家的風度。總之，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像一個政治家而只見他像一個被苦惱者但又非常友善的人，這個人極願爲波蘭人民服務，並且情願爲這件工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在他的領導之下，委員會得到顯著的成功。這一點他充分知道。「我們四個月內所做的，比倫敦那，羣——個被官僚主義和法統所束縛着的——四年內所能做的還要多，」他興奮的說。但這是一個集體的勝利，其中許多人民供獻出自發精神和決定。他也知道是這樣的。對於委員會，對於波蘭，他有一種強烈的尊嚴感，但是，他從來不把這種感覺加諸自己。也許正是因爲他對自己的缺乏肯定，才使莫拉夫斯基在過去若干月中因爲他們所日益贊成。

貝魯特供給委員會以鋼鐵般的意志。他是那種隨時都知道往那兒去，走多遠以及爲什麼去的現實主義者。是他在十二月中旬，當他有一次自莫斯科開會回來後告訴我道：「既然和倫敦的被

商人不能取得協議，我們將要求莫拉夫斯基組織我們的政府。」他帶着權威聲說，我不能斷定他所用的「我們」是集體的呢，或是社論上用的呢，還是高貴的「我們」！

假如莫拉夫斯基幾乎不加以判的接受大多數的意見，那麼貝魯特就知道大多數是怎樣做成的。他把波蘭人民不看做是他所崇拜的上帝，而是具有矛盾的人類，他們的集體意志還有待於組織。我想莫拉夫斯基可能很容易傷心而從幻想中覺醒過來。但一個人會覺得貝魯特是從來不會這樣的，因為他已經預料到並且面對着過最嚴重的災難。人們對於他，比對於任何別人都更感覺出那種忍受過長期磨難的地下工作者的冷靜的理智與警惕的耐心。

我回想起他和我談話時那種深度：「我們最大的需要不是錢，不是食物，不是機器，而是人民。我們最優秀的人都被害了，我的兩個最好的朋友——他們首先建議組織我們的前途——一年以前在十一月間被蓋斯塔波謀害了。」

比起莫拉夫斯基來，他更少出現於公共場合。他常常生病，可能是長期革命工作中那些危險的年月所造成的結果。戰前在波蘭，他被下過兩次獄，最後一次的判決是七年徒刑。他是第一個黃連的發起人和主席。甚至在一九四四年的末尾，他在盧布林的工作一部份還是地下的，因為他要和那些穿過德國防線秘密而來的代表們接頭。是由於他的分析，才在幕後結晶出各種會議與委

員會的最後決定來。

在合作社大會休息中間，當莫拉夫斯基第一次給我們介紹的時候，貝魯特有禮地和我握手，俱却帶着一種冷靜的忤度的凝視，除了他那直接的注視而外，在第一次會商之後，一個人只能記住他那瘦瘦的臉以及在他那方的，堅實的下顎上面經過修飾的唇鬚，除此之外，他並無特點——他是那種在一羣波蘭人中間，一個可以逃避蓋斯塔波的典型波蘭人，他是如此的緘默，以致我不敢馬上要求訪問他；我覺得我必須等我好好準備好了我的問題之後再說。

幾天以後，當我和莫拉夫斯基在辦公室中間談的時候，我提到我願意在什麼時候和貝魯特談一談。莫拉夫斯基馬上拿起電話，並且在一番簡單的詢問之後就告訴我貝魯特願意在五分鐘之內會見我。一會功夫之後，他把他的辦公室裏的一個門拉開，並且把我直接帶進貝魯特的屋子。那以前我一直不知道他們的辦公室原來是連着的，他們在外面的書記的辦公室是隔了好幾個門的。在一間又入又亮，兩邊牆上都釘有窗的靠椅角的房子裏，貝魯特坐在他的桌子那兒，背對着所有的窗，而朝着兩個門，像一個在警戒中的人。沒有突然發出來的歡迎的微笑，這種微笑莫拉夫斯基常是直覺地就表現出來了。貝魯特慢慢地站起來向我問候，然後又繼續地坐在他的椅子上，由桌子在中間隔開我們兩個。他以問我問題來開始，我覺得他在決定和我說什麼以前，正在

採用我的方法。

電話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有人在考慮六個德國人的公開處決的問題，這些人因為他們主持了梅丹涅克的死營剛被判決，並且特別懷疑決定作為公共紀念的梅丹涅克是否是一個合適的地方。我懷疑這是不是莫拉夫斯基在電話裏猶豫不決呢？貝魯特是安靜的，一面確定的說道：「這個地方已經被濫犯過了，這樣一來可以洗清它。」他掛上電話並且徵求我的意見。我又覺出他要我回答這個問題不是來決定他對處決的意見而是來決定他對我的意見。

忽然他比波蘭的任何人都更清楚更坦白地在回答著我的問題。我高興的知道了沒有問題會使他發窘，或得不到回答。他曾經面對過一切的問題，較諸我能用更冷酷的形式來敘述這些問題。他已經找到能使他滿意的答覆了，並且願意說出來。他的答覆是否完全也許要看他對於發問者的估計而定，但即使他的答覆不是完全全面的，也會是清楚而直接的。我發現他是委員會的主要智囊，他是那個知道委員會的一切的人。在這以後，當我要知道委員會的各種目的和方法的準確定義時，貝魯特就是我所要找的人。

有一次在他生病的時候，他在他的家裏接見我。他住在隔有兩條街的一所普通房子裏——他還沒有搬到委員會的房子裏去——但是在他的客廳裏有武器的衛兵。這使我想到人們常常經過

戰時而來到他這裏，並且假如委員會的敵人要選擇一個人來暗殺的話，很自然地他會成爲第一個對象。那一次比以前任何時候，我感覺到我自己對於波蘭人民有了更親切的了解。看起來他們對於他們自己本質上的困難以及過去數百年來的重擔奮鬥得這樣艱苦，我不清楚這種感覺是怎樣產生的，可能是因爲我看見貝魯特倚在一個睡椅上掙扎着用電話來處理重要事務的情形而產生的。

我所感覺到的某些東西一定由我的話或態度中表現出來了，因爲當我告別的時候，貝魯特使我吃了一驚，那就是他抓起我的手吻了一下，不帶外交家的尊嚴——他並沒有保留着波蘭吻子的傳統——而是帶了同志間真正的溫暖。這以後我才知道貝魯特對於他的波蘭人民以及任何願意了解他們的人，具有一種深刻的人類的感情。

關於委員會的各種目的和方法，以及它與倫敦流亡政府之間的差別的最清楚的分析，是由貝魯特給我的。

「流亡政府的政策根據了錯誤的前提。他們首先相信德國人和蘇聯人會兩敗俱傷，於是波蘭——雖然依舊是被動的——就可以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當紅軍開始擊敗德國人的時候，倫敦的波蘭人就指望著蘇聯和安格羅撒克遜強國之間的衝突，在這個「不可避免的」衝突之間，波蘭

自然會有所收穫。政策既然根據在這一點上，於是他們就指示他們在波蘭的代表們和他們在內地軍事的軍官們，不要因為抵抗德國人而「消耗自己」，而要保存力量以便他們將來可以取得大權。他們因為等待和忠於倫敦的波蘭人才得到報酬。

「我們認為這個政策是錯誤的。我們主張每個波蘭人都一定要為他的土地而戰鬥。我們組織了各種的地下活動，從非法的教育學生到森林中的游擊戰。最初我們希望，只要我們來冒險，倫敦的波蘭人將會支持這些事情的。但是，他們的武裝部隊開始殺害我們的人民。」他停了一下，然後肯定地補充道：「他們所殺死的我們的地下戰士比所有德國人殺的還要多。他們是波蘭人，我們不能一見就知道他們是敵人，當我們看出他們不會支持我們對德國人的戰爭時，我們組織了我們地下的內戰。」

「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第二個不同之點，在於我們和蘇聯以及西方民主國家友好的政策。戰前波蘭的外交政策是遠交近攻。它信賴法國，英國和美國，但對於捷克人，立陶宛人，蘇聯人和烏克蘭人是仇視的，並且用武力從所有他們奪取領土。最初，統制集團對德國也是仇視的，但是當希特勒取得大權的時候，他們開始倒在他那邊去，並且羨慕他那獨裁的統制。」

「這一點帶來了我們之間的第三個不同之點。他們相信從上面的統制。相反地我們認為一個

國家之強盛在於它的每個公民都有機會在工作及政治中發揮他的積極性。換句話說，我們贊成一個民主的波蘭。」

我問他是否他看出有任何與倫敦波蘭人「搞在一起」的可能呢？對於這個問題，貝魯特直率地回答道：「他們沒有什麼可以給我們。他們沒有錢給我們，因為他們把波蘭的黃金積蓄帶走了，並且在國外胡花掉。他們沒有經驗給我們，因為在我們忍受五年敵人的佔領中間，他們一直不在。他們只阻撓波蘭和她的同盟國之間現在的接觸。不管這一切，我們仍然和他們談判，並且企圖取得諒解，因為我們的國家被摧殘得太厲害了，它需要所有波蘭人一致團結。不然的話，我們的同盟國將說道：「波蘭人老是吵架，我們幫助誰呢？」別的國家不會相信一個在吵架的民族。」

貝魯特相當詳細地敘述了他在莫斯科和米柯拉茲克討論的細節。整整四個月中間，委員會不做願意接受米柯拉茲克做首相，並且那時貝魯特本人也催他回來——不過在某種條件之下；那就是一九二一年的憲法，土地改革，對蘇友好和停止內戰。據貝魯特說，米柯拉茲克表示個人對於所有這些點都同意，但他一定要「先和他在倫敦的同僚們商量一下。」

「他是一個法統主義者。他覺得他對一九三五年的憲法所負的責任——他承認這個憲法是非

法通過的，但無論如何是被通過了的——使他不得不服從倫敦那一集團的決定。」

大約在這個時節，我覺得我可以向貝魯特提出任何我所願意提出的問題了。所以我直接了當地提出波蘭獨立的問題來。究竟它獨立到什麼程度？「例如，你們從蘇聯得到過什麼經濟上的援助？」

對於這個問題他一點也不覺得奇怪。「最多的，」他答道，「是關於武器和裝備的援助。沒有蘇聯的援助，我們不能有任何像我們今天這樣的軍隊。」

「這種援助是不是一種長期借款？」

「不是。春天的時候我向斯大林元帥提過這個問題。他答道：『我們不把我們同盟者的血來做生意。』」

貝魯特加上說，蘇聯正在給一些「比較少而極重要的援助以便恢復波蘭的工業。」這是一個短期借款，不是錢而是機器和原料，可以用實物償還的。

「但是一個政府難道不需要現款嗎？是否有過一般的借款？」

「我們甚至沒有要求過，」貝魯特笑了。「我們在我们的要求上是很謙虛的。我們預料可以靠稅收和糧食收入來過活。在這兩者開始到來之前，我們確實需要過一定量的鈔票，但是——」

這真他的微笑變成嘲笑了——「我們就印而已。」

是的，貝魯特毫無幻想地知道，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之間，你在波蘭可以不需要些什麼。

當我從貝魯特那裏出來的時候，我在外面的辦公室裏停了一下打一個電話。三個穿著講究的制服，上面掛著輝煌的勳章並且閃爍著金黃色和紅色帶子的蘇聯軍官進來了。那兩個做貝魯特的副官的青年波蘭軍官馬上拍嘍一下子立正，並且以最大的禮節把來訪者引進總統的房間裏去。

差不多在門還沒有關上之前，其中一個小傢伙做了一次狂妄的跳舞，並且伸出他的兩臂，那姿勢好像在對着他的同伴——也對着所有一切，包括我——喊道，正如任何美國孩子所能那麼天真地說出來的一句話：「喂！看我們有多麼神氣的客人呀！」

季米爾斯基將軍是軍隊的總司令。他是一個圓胖而和藹的人，他的軍人的氣度使人看不出他已經五十四歲了。在他他那燈光良好的辦公室中安詳地坐著來接待我第一次的訪問。當我把我的輕便打字機放在他的桌上時——這是我在盧布林隨便的空氣中養成的習慣——他看起來有點覺得

奇怪，但他馬上就接受了我的解釋，那就是這會節省時間並且保證記錄準確。他認為這是美國的方式。整整一個多鐘頭，他用一種很友誼而正經的態度口述他對於我的問題的回答，這些問題問到他的生平，波蘭軍隊，甚至不同將領的個性。他不知道我同時還記下他那口禿灰色的頭髮，帶有五星和斷折綠條的肩章，深藍色天鵝絨作的胸章，上面鑲有波蘭鷹徽，以及當他微笑的時候閃爍着的兩排金牙。

季米爾斯基不是在戰時從士兵中升上來的新將軍。在獨立的波蘭尚不存在的時候，他就是一個波蘭軍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在奧國為波蘭軍隊訓練軍官。他是一九一八年二月「行動」的主要組織者，從那以後，皮爾蘇斯基的波蘭軍團就和中央政權分裂了。當年青的波蘭和法國同盟的時候，他在一個法國軍事學校畢業後就在法國參謀部裏服務。一九二四年在西考爾斯基將軍的下面，他成為波蘭陸軍部的副部長。

一個光輝的事業擺在這個青年軍官的前面。現在他帶了好幾個從他自己政府得到的勳章，還有比利時的十字勳章以及法國的榮譽勳章。但是季米爾斯基有機會變成一個民主主義者。在一九二六年他反對皮爾蘇斯基的普迭打（政變）。新的獨裁政府很快就找到藉口把他從軍隊中驅逐，並且把他關到獄裏去。被釋放出來以後，他住在法國，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在波蘭最需要他的時候

才回來的。在一九三九年中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他熱情地促使軍隊邁進現代化。他的許多建議都被輕蔑地拒絕了。「波蘭的軍隊很不壞了，我們不會讓一羣士兵的制服丟掉一個扣子的。」這就是丟掉整個波蘭的總司令，西茲斯米雷的典型的聲明。

在德國閃擊戰的第四天上，季米爾斯基向參謀部做他最後的呼籲。「我們已然在既無天然防禦又無人工防禦的不利的邊境地區作戰來了。敵人的鉗子正在把我們的軍隊切成許多塊。我建議趕快從德蘭人的階梯中撤退，撤到依據維斯杜拉河的一條堅固防線上，以便爭取時間動員全部後備軍。德國的戰爭機構還沒有拿出全部力量來，我們可以守住維斯杜拉河直到歐洲局勢發生變化，或者直到英國來幫我們的忙。」陸軍部的將軍們命令他停止討論戰爭，軍事法庭加給他一個失敗主義者的罪名，因為他的「維斯杜拉河防線」等於一開始就撤退。兩天以後，就是這個參謀總部在驚惶中逃之夭夭，把波蘭軍隊丟在紊亂中並且無人指揮。

「一九四〇年，西考爾斯基將軍和我企圖把我們波蘭的經驗教訓告訴法國參謀總部，」季米爾斯基和我說。「我們告訴他們：『德國人是這樣作戰的，應該這樣來對付他們，』」法國人們也是騙子。法國也淪陷了。

於是季米爾斯基將軍就失蹤了。在波蘭出現了一個叫做若拉的人——一個游擊隊的組織者，

季米爾斯基用一個新名字轉入地下。「因為恐怕德國人認出我來，我甚至不到我的妻子和孩子們那裏去，」他說道。

我沒法和所有地下政黨及流亡政府的代表們連繫，「我帶信給倫敦，說他們關於內地軍的戰術是錯誤的。他們的觀望等待政策正在瓦解內地軍的士氣，以致使敵人的特務滲入進來。它不但不打德國人，反而打波蘭的游擊隊。我一再地把這些報告給倫敦，但那無效。」

當德國人進攻蘇聯的時候，季米爾斯基將軍和倫敦的分歧就更尖銳了。「內地軍認為布爾塞維克比起德國人來是更厲害的敵人。他們射殺企圖逃跑的蘇聯戰俘。我認為蘇聯人是和我們共同作戰的同盟者。我們協助蘇聯戰俘逃走，甚至把我們自己的武器給了他們。當我最後到達莫斯科的時候，我告訴斯大林：「我們給了你們武器，現在給我們武器。」」

「他給了沒有呢？」我問道。季米爾斯基將軍笑了。

「德國人日益加劇的殘酷性使得內地軍也跟他們發生了衝突。那時他們集中力量來刺殺那些特別可恨的蓋斯塔波頭子們。原則上他們避免對德國到東面去的交通線做任何攻擊，他們的政策是讓德國人和蘇聯人「彼此消耗」，」相反地，季米爾斯基的游擊隊則集中力量來破壞德國的交通線，以這一點做為對於他們的「蘇聯同盟者」的直接軍事供獻。季米爾斯基自己親自到遍佈波蘭

的各游擊隊去訓練並且視察他們。『我是到森林裏去的唯一的一個將軍，』他笑着說。一九四三年年底，當那新組織起來的內達，拿若多瓦決定組織地下人民軍的時候，他們就使季米爾斯基做了他們的總司令。

「一九四四年初，我們把我們的第一個代表團派到莫斯科去。和紅軍的連絡是必要的了，因為紅軍正在一天比一天近，從無線電中我們也知道了貝爾林將軍的波蘭軍隊。我沒有和第一個代表團去，但是當斯大林自莫拉夫斯基聽到了我們的游擊隊的時候，他派了一架飛機來接我。」

季米爾斯基將軍去莫斯科的旅行是非常之驚險的。第一架飛機起飛時就出事了，飛機從六百呎的高度跌下來。季米爾斯基將軍是唯一的一個沒有受傷的人。「飛機碰爛的時候，我緊緊地抓住飛機架子。於是幫忙把受傷的人抬到森林裏而去。我們把飛機燒了，並且馬上藏了起來；四個鐘頭以後，德國人就到了那裏。我們花了五天的時間來躲避他們，並且給第二架飛機做了一個降落的地方。當我們飛過前線的時候，我們降到九十呎的高度來躲避高射砲，但却跑近了地下火線之內，因此兩翼護欄槍子彈打穿了十五個洞。」

在那次莫斯科的訪問以後，季米爾斯基的行動與紅軍取得了配合，並且自紅軍得到武器和連絡官。當紅軍進入波蘭領土的時候，貝爾林將軍的軍隊——在蘇聯所組織的十萬波蘭人——也由

季米爾斯基指揮。貝爾林的軍隊人數多一些，而且裝備也比季米爾斯基的森林游擊隊好得多，但無疑地季米爾斯基是資格比較老的將軍。此外，大家認為在波蘭淪陷區組織起一支武器力量的人應該有資格領導。季米爾斯基把他的游擊隊和貝爾林的軍隊合併了起來，並且命令普遍徵收新兵。這三個部份組成了今天波蘭的新軍。

季米爾斯基將軍親自以他那波蘭式的慄慄態度，一直把我送出來，穿過外面的辦公室直到門口。有半打的副官馬上立正，那拍噠的聲音似乎震動了全室，這個沒有缺點的將軍自從他離開森林的這幾個月以來，已經做到了很好的軍紀訓練。

嚴格的說來，博學的敏斯博士不能列入國家的首長之內。現實主義的貝魯特，理想主義的莫拉夫斯基，軍事首長季米爾斯基形成了三人的組織。但是要把這個三角形做成一個堅固的四方形基礎，以便建設一個國家，就需要敏斯這個經濟學家和波蘭工業的再建者了。他有關於工業，經濟甚至農業和勞工的一切材料，比我所碰見的任何別人的材料都登記得更完全，更準確，更有實用。因為他的經濟頭腦，我個人把他列為一個國家的首長。

「敏斯是我們真正的政治思想家，」一個直率的波社記者告訴我，並且說敏斯博士得過三個

大學學位——一個在波蘭得的，一個在法國得的，一個是在蘇聯流亡時得的。「歷史，法律和經濟是他的專長。」

敏斯博士從來不隨便的舉出事實，而總是按照完整的系列舉出來。好像單舉出一個事實而不講前面和後面對他是件痛苦的事。他很願意並且很詳細地供給我材料，但是從來不在吃飯閑談的時候講；我帶着我的鞭便打字機到他的辦公室裏去，並且記錄下他的話。我驚異於他的知識的條理，但對於他計算講話時間——整整五十分鐘——的那種學究式的準確性，感覺好笑，好像一個大學教授在上課似的。第二次我去晚了十分鐘，他輕輕地責備了我一下。「我們今天恐怕不能充分搞完這個題目哩。」

所以是從敏斯博士我才得到那些爲波蘭而定的計劃，這些計劃是合理地根據了經濟地理與生活需要而定的。

「波蘭是人死得最多，工業，農業和房屋被破壞得最厲害的國家之一。它的情形比捷克斯拉夫嚴重得多，而和南斯拉夫差不多。蘇聯若干部份被破壞得比波蘭還要厲害，但蘇聯的大部份未受到侵略，而波蘭則是整個都受到了。」

「恢復我們的戰時損失有三種可能的來源，內部資源，同盟國的援助和敵人的賠償。」

「無疑地我們將要開發我們內部的資源，但是單靠這一點甚至也要幾十年才能恢復到戰前的生活水平。我們所受的損害和十七世紀時德國及波希米亞在三十年戰爭以後所受的損害相彷彿。甚至一百年以後，這些土地仍會破爛不堪，落在歐洲其他各部之後。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命運。」

「外債的問題尚未到成熟的階段。不管怎樣我們要注意，外國借款的形式和數量是要看波蘭所能拿出來的保證而定的，這種保證自然又要看我們基本的資源而定。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要求增加北面和西面的領土的原因。」

「我們能自德國得到些什麼賠償來修復德國人所破壞的東西呢？德國拿不出足夠的金錢或實物來抵償她所造成的破壞。獲得我們需要的東西——種籽，牲口，鋼鐵，機器，卡車，馬達，水泥，玻璃——的機會就是把波蘭向西擴張，取得那些以前屬於波蘭後來一直被德國化了的工業地區。這些地區有兩類：第一是東普魯士，取得它就會摧毀了德國帝國主義的前鋒，並且給我們一個到波羅的海的出口；第二是西邊直到奧德河和尼也薩河的土地，幾百年來，波蘭人被連續不斷的德國侵略從這些地區中趕了出來。」

「這意味着我們整個國家的向西移動。這意味着把波蘭從一個農業國家變為一個工業，農業

和商業平衡發展的國家，從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變為一個單民族的國家。我們於是有了下面的一幅圖畫：

「第一，戰略上的安全。不管和平條約是怎樣的，二十年或者二十五年以後，總會有一次新的德國侵略的可能，也許比希特勒主義的形式還要厲害。波蘭人民不能白另一次這樣的大災難中逃出命來。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個生與死的問題。合併了東普魯士並且把我們的邊界定在奧德河與尼也薩河沿岸，我們就在可能範圍之內得到一條最短最強的國防前線，並且使敵人不能像這次戰爭這樣從三面來圍攻我們。

「第二，我們的經濟生活會完全改變。東面的耕地——大地主是些波蘭人，雖然土地主要是由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農民耕種的——現在劃歸蘇聯了。我們則換來工業地區，七千萬到八千萬噸的煤，一個發達的鋼鐵生產和機器製造工業，在這些工業中，相當部份的勞動階級一直就是波蘭人。代替一條到海的可笑的走廊，我們得到一個廣大的出口，差不多有兩百哩的海岸，這樣就用商業和漁業使得我們的經濟生活更完整。

「第三，我們消除了許多內部的紛爭，丟掉東邊的若干地區，我們去掉了我們最反動的封建份子，並且消除了我們主要的少數民族問題。我們自西邊獲得那些產業階級，他們將會協助建立

一個進步的民主政治。同時我們摧毀了東普魯士，波莫任尼亞和西利西亞的那些封建份子，也就是那些德國大地主的堡壘。大片的普魯士田莊是建築在斯拉夫人的血肉上面的。假如它們落到波蘭農民的手裏，這正是歷史的正義。

「這樣的一個波蘭，有了安全的國防線，去掉了我們的少數民族的主要問題，工業良好的發展起來，並且有到海的出口，就可以很快地自戰爭中恢復過來。它將不是那古老的，落後的，半封建的，成爲一種不安的泉源和歐洲和平危機的波蘭了，而是一個健全的，進步的國家，它的人在繁榮上不必落在歐洲其他民族的後邊了。」

敏斯博士似乎完全確信這一切的可能性，而不是烏托邦的將來；關於我所聽到的波蘭的種種要求，他的聲明是最實際的。

第五章 波蘭新軍

一支波蘭的新軍正穿過波蘭前進，「把旗幟帶到柏林去」，無論在那裏，一提到這支軍隊就引起最大的歡呼。歡迎紅軍時，一到波蘭軍隊出現，歡呼就顯著地增高起來。慶祝土地改革的農民大會上，人們對於那些穿着制服的青年演說者歡呼更熱烈，這些人告訴他們說：你們的槍契是由我們的刺刀來保證的。」

這支帶着紅白旗幟和波蘭鷹徽的軍隊，對於幾百萬的波蘭人來說，是波蘭將再一度得到自由並且強大起來的希望的最清楚的標幟。戰前波蘭的軍隊都被分散並且被消滅了，它的參謀總部已經逃到羅馬尼亞和英國去了。有些軍官死了，有些仍然在若干德國的俘虜營裏面，另外一些——曾經被拘留在蘇聯一個時期——已然加入了安得斯的軍隊，並且到了意大利前線。有些士兵已經設法回到家裏自己的土地那裏去了，另外一些則在德國做了奴隸，或者分散到世界各處去了。

波蘭的新軍由三種成份組成：貝爾林將軍由十萬在蘇聯的波蘭流亡者所組成的第一軍，淪陷

期間在波蘭本土上活動的波蘭游擊隊，和從解放以來所動員的新兵。

在我第一次訪問波蘭的時候，波蘭的新軍大約有二十多萬人。在對德的聯合作戰中，它在指揮上是在紅軍的下面。但是波蘭軍隊宣誓盡忠於波蘭和那代表着波蘭人民民主組織的黃連·拿若多瓦。它帶着波蘭紅白顏色的標幟，它的士兵在他們的帽子上帶有應徽，而蘇軍的帽子上則是紅星。波蘭士兵參加了那橫貫波蘭的壯烈的進軍，並且常常是做前鋒。所有波蘭政府官方建築物的衛兵和最重要的波蘭城市的警衛部隊，都是波蘭士兵而不是蘇軍。

在盧布林，每天早晨我被正在唱着『若他』——他們的誓辭——的波蘭士兵們喊醒。那聲調是虔誠的，當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我以為那是一首讚美詩。科諾普利查的這首有名的詩：——是在這個世紀之初，當被瓜分了的波蘭反抗德國的壓迫而鬪爭時所寫的——其中宣誓稱絕不讓波蘭的土地被外人佔領。每一節的末尾都是『願上帝協助我們』。這首虔誠的詩，現在成爲每天早晚祈禱以前軍隊儀式的一部份了，波蘭軍中的附屬牧師與每天的宗教儀式是它和紅軍的另外一個不同之點。

在這時候，波蘭第一軍的士兵們已然經過一年多戰爭的鍛鍊了。一九四三年十月，他們第一次在斯莫穆斯克附近的列尼那作戰；在那裏柯蘇斯克師衝破德國的前線，一七四四年七月波蘭

第一軍協助強渡過巴格河，並且穿過波蘭橫橋兩百哩，一路上到處被歡迎，被接吻。因為這個巨大進攻消耗了它自己，它就在華沙南面的普拉威強渡過維斯杜拉河，建立了橋頭陣地，準備下一個進攻。於是在九月，和蘇聯軍隊一起，波蘭另一軍通過德國在波蘭最堅強的堡壘自南面攻入普刺格，而在維斯杜拉河的東岸建立起陣地。

波蘭的游擊隊，特別是在季米爾斯基將軍手下的，當紅軍和波蘭第一軍接近的時候，就配合着行動。他們從後面打擊敵人，擾亂敵人的交通線，並且使敵人的撤退成爲潰敗。他們營救了正被運到德國去做奴隸的農民。他們維持被解放了的城鎮的治安，以待波蘭地方政府的組成，他們儘可能快地被編入波蘭正規軍，所有游擊隊軍官的階級部被保留着。

自十九歲到三十五歲壯了的普通徵集令也同時宣佈了，徵兵區分部也在所有、中心點建立着。只有那些比較年青的人才招來做士兵，比較年老的人中間，只有那些專門人員才給予別的職務。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仍然在訓練中的波蘭第二軍就是由游擊隊和這些新兵所組成的，而用第一軍的士兵做爲骨幹。

在一個美麗的十二月的清晨，我動身到貝莫的訓練營裏去。按照軍隊的時間，已經是九點了，整個東線的時間都是以莫斯科爲準的。按照波蘭當地的時間——與中歐時間一樣——才不過

七點鐘。展開在遠處的地平線上，早晨的白色的天空時常飄出一座教堂或是一堆草房子。一行的剛長出來的冬季裸麥給大地上鋪了一層綠色——從沙皇時代起農人的三種農作物輪種的老辦法，還沒有什麼改變。農民們對於他們冬天的耕種似乎做得很好。

由紅軍向維斯杜拉河急行掃蕩所收復的從薩布林到且莫這一帶地方，比起波蘭解放區別的地方來，更少戰爭損壞的痕跡。每個城鎮的附近都有標記用俄文和波蘭文列下這個地方可供軍用的設備。且莫的標記這樣寫道：「這個城有供休息的房子，汽車修理站，糧食倉庫，飯店，醫院。」這種通告顯然是爲了過路軍隊的方便的。訓練營却沒有列上，在附近的森林中，訓練營的地點是秘密的。

我們在城外一羣別墅中間找到軍隊的總部。坦克部隊的指揮官計劃了我們的行程。他告訴我們一天之內我們不能訪問附近所有的訓練營，因為他們分散得相當的遠，並且在這個泥濘的節季裏不容易去。我們決定去看機械化步兵營，坦克訓練營和砲兵軍官學校。

等我們那頑強的吉普車在泥路上跑了好幾哩路之後而到達位於一座森林邊緣上的機械化步兵營的時候，早晨清朗的天氣變成濃濛雨了。我們發現訓練營完全是用 *Neilyukas*——壕溝——做成的。一條長而直的小路引進森林裏去差不多有一哩路遠。腳底下鋪有沙，兩旁有整齊的鄉下棚

欄，上面松樹的枝子做成了防空網。從這條路往旁邊退大約二十呎或稍多一點，就是一排一排的壕溝，大約兩呎高的邊牆露在蓋有藓苔，松針或沙子的斜屋頂下面。這像一座有許多木頭房子的城鎮，而房子都埋到地下四五呎深。

「我們從蘇聯人學會了這個辦法，」我們的主人斯奇爾文思基上校解釋道。壕溝比帳幕舒服多了，並且在森林裏的任何地方都差不多可以和帳幕一樣快的造起來。德國人把士兵們放到村子裏去食宿的習慣不但對於村民不方便，而且也不適合於一個軍事機構的嚴格的要求。這裏所有我們的營都有一個地方，營的大小和位置都恰合要求；這樣可以有良好的訓練。松木屋也比一個村莊乾淨多了。

「這是我們的參謀辦公室，」上校繼續說着，一面帶着路走下四步台階，進入一個尖屋頂下的小門。他提起一個雕得很巧妙的木門門，於是那掛在近代鐵鉸鏈上的用斧頭做成的門就可開了。我們進入一個溫暖而光線良好的木頭屋子，大約有二十呎長二十呎寬，並且分成兩間。牆和地板都是劈開的圓樹幹，光而朝裏；由於牆壁的保護，加上前面大房間裏一個鐵爐子的火，我們簡直感覺不到外面寒冷的天氣了。

第一間屋子是辦公室，在屋頂和就在屋頂下面的窗戶中射進來的光線之下，幾個軍官正在三

張大桌子上研究地圖。需要電燈的時候，由營裏的一個發電機供給。辦公室的後面一個寬大的拱門引到臥室，裏面有四張小床，床都是用劈開的木頭做的，上面鋪着稻草袋。做爲一個西雅圖露營的老手，我斷定這個地方比我們在芮尼爾山的許多夏天所曾用過的帳篷和床還要舒服一些。

我們把那條主要的路走完，並且一路上進到幾個壕溝裏面去；包括一個郵局，一個俱樂部，還有幾個士兵宿舍。所有的建築都差不多，但爐子却視居住者的技巧而有不同，許多是由大油廠改造的。士兵宿舍可以容納二十人，並且窗子比較少。

「窗戶上的玻璃是一個問題，」上校指出說，「波蘭現在還沒有出產。學生們從毀壞了的房子中找到一些。」

許多屋頂帶着值得驕傲的藝術表現。有些簡直就是完整的藜苔做的甍子，有些點綴着用橡實和樹葉做的花樣，在樹木比較稀一點的地方，有些屋頂上面鋪着黃沙，頂上有時還加上一兩株小松樹。不論在什麼地方，屋頂總是與地上的景色相調合的，使壕溝幾乎在一個短距離內都看不出來。放置武器和設備的庫房造在壕溝之間。步槍，衝鋒槍和鋼盔露天地放在架子上，隨時可以取用，俱用稻草頂斜遮起來。整個訓練營內，特別是壕溝的前面，有許多用藜苔，白色陶器的碎片和紅磚所做成的裝飾花樣。最多的是紅白色的波蘭徽，配着用白色的陶器碎片在綠色的藜

苦上鑿出的那句格言「聯合就是力量」。

「我們在五天之內這好整個的訓練營，」上校誇耀道，「但當然不包括那些裝飾花樣。屋頂所以要用東西蓋上是爲了溫暖，爲了偽裝，同時也爲了好看。」

洗澡房是上校的得意傑作。「像一個城市澡堂！」同時可以洗六十人。「這個一半在地下面的壕溝有一個進口，兩旁有木頭板凳可以放衣服，有一個主要的洗澡間，水從盆和蓮蓬頭中流下來，還有一個流行的蒸汽浴室。洗澡水得提上來，但用過之後水就從木頭地板的縫子中漏下去了，然後排到一個深在沙土下面的排水坑。」

在訓練營最遠的那一端，新兵們要隔離十天。「幫新來的人還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我抓住這個機會和一些波蘭村民們談了談話，他們僅僅是徵來的青年壯丁而不是選來出席某種會議的代表。這些人是從一個村子裏來的。在最初的幾個問題之後，一個有黑鬍子的人似乎成了他們的發言人，而那人只點頭表示大致同意他的話。」

「紅軍經過你們的村莊嗎？」

「當然，先是紅軍，後來是波蘭軍。」

「他們的行爲如何？」

「行爲？他們是些沉默的傢伙，像波蘭人。」

「你們已經實行了土地改革嗎？」

「是的，我們在農民中間分了五千畝地，那是僅僅一個地主的地。」

「那個地主怎麼樣了呢？」

「他和德國人一道走了，他有一個德國靈魂。他不會再得到波蘭的土地了。假如有什麼人願

意要波蘭的土地，那麼讓他和我們一起住在壕溝裏，並且爲土地而戰鬥吧。」

「土地分得公平嗎？」

「那個有黑鬍子的人聳了聳肩。『誰能說什麼是公平的呢？這是法律。』」

「我的意思是在農民中間土地是否分得公平，使得每個人都得到公平的一份？」

「噢，那個呀！當然啦，我們自己的。假如地是好的，或離村子近，那麼就是八畝；假如

遠或者不怎麼好，那麼就是十二畝。我選了離村子近的八畝，因爲有時我也到村子裏去做木匠。

現在我在軍隊裏，我的妻將種那塊地。」

「在你們的村子裏你們有一個什麼樣的政府？」我的意思是指的政治，但他們却把它當做是

指的技术上的問題了。

「政府就是格米納(Gemeindegemeinschaft)——鎮。爲了土地改革，在縣的土地管理人下面有一個由各村代表所組成的特別委員會。」

「誰管理這個格米納？」我堅持問下去。看着他們困惑的面孔，我解釋道：「你們有沒有以前在德國人下面的官吏？」

每個人都笑了。於是有一個說道：「我們把他們趕走了。」另外一個修正道：「是這樣，有些人假如他們沒有問題可以留下，但絕不是那些有德國靈魂的人。」

「你們怎麼得到那些新人的呢？」

「當然我們選的他們。」他們顯然對於這個談話有點膩了，這些對於他們看起來成爲最平常的鄉村事務了。他們更願意談點新鮮的題目，例如美國。開頭他們有點遲疑，終於他們試探着打聽：「我不是美國的代表？美國是不是要派什麼人來波蘭？不是？那麼我怎麼來到這裏的呢？我到過第特律沒有？到過芝加哥沒有？他們之中有一個人有個兄弟，另外一個人有個表兄弟在這兩個城市裏。」

在回到上校的空溝的路上，我們走過一個在樹底下爲早晚祈禱用的神壇，訓練營的牧師告訴我，他也曾在戰前波蘭軍隊裏服務過，但是「在德國佔領期間，他裝做一個牧羊人而藏了起來，

因此逃了出來並且活到今天。」

「德國人殺害牧師嗎？」我問。

「除了少數按照他們納粹觀點而傳道的人，其餘的人難逃死命，除非他們設法藏了起來。」
 陪伴我們的那個負責一般公共福利的「政治教育」告訴我，新兵們不但需要軍事訓練，而且還需要公民教育。

「我們一定要根絕他們在納粹統治下所染的惡劣習慣。」我問他什麼是其中主要的惡習，對於這個問題他回答過：「酗酒。」

「酗酒，欺騙，貪污，偷盜，投機，在淪陷期間流行了起來。被壓迫的人民企圖麻痺自己，或用非法手段做事務，此外，當統治者在整整五年之間堅持認爲你是「劣等的」，這會摧殘正常的自尊心。懶惰和怠工變成了美德——一種和敵人團圓的方法，現在這些都是壞的傳統了。」他加上說：「文盲相當多，因爲在納粹統治下學校很少而且距離很遠。」五年之中年青的人長大了起來但不認識字。甚至就在這個特別技術的訓練營裏，我們在新兵中間還有百分之十的文盲；在普通步兵中間，百分數就更高。我們政治部首先要做的若干事情中之一就是給那些必須學會認字和寫字的人開班。」

「純粹的佔領，」他結束道，「在歐洲留下一個道德低落的可怕傳統，這就是我的職責任務。」

在上校的壕溝裏我碰見他的妻子，並且認出這個矮的女人就是剛才在郵局裏看到的那個分信的人。「她是訓練營的女郵政局長，」上校微笑着說：「我的十七歲的兒子也在這裏做我的司機。假如你必得去打仗，爲什麼不帶着家呢？」

一個優良主婦的痕跡在這個壕溝裏隱隱可見，鐵爐裏邊塗了石灰像一個荷蘭火爐，有一把舒服的帶墊長椅子，桌子上有一塊綠絨桌布，並且牆上還掛着一些畫和一面鏡子。桌上擺着電話，像一個正規城市家庭一樣。

「你能用那電話叫到莫斯科嗎？」我開玩笑地說。

斯奇爾文思燕笑了。「不是用那個而是用這個。」他轉動一下一個輕便無線電，於是音樂的聲音就充滿在屋子裏。

屋子裏沒有任何東西顯出我們有一半在地下。坐在沙發上，我從窗子裏看見高大松樹的樹梢，反映在透明的天空中。我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很舒服的假期遊息所。

斯奇爾文思燕上校夫人撿起綠絨桌布，換上一塊白桌布和一個精巧的桌心裝飾品。她一再地

道歉，因為只能給我們一頓「便飯」。「在我看見你們以後，我就吃過飯了。」她解釋道。但是這一個半鐘頭之內，她已經預備下了一頓數量驚人的午餐。

小吃是在一個瑞典式的大盤子上，足有五十七種不同的冷肉和酸菜，包括一種紅白腌捲心菜，女主人命名為「維他命生菜」；在這次戰爭中，軍隊已經知道了維他命的重要。適口的面包做成大方塊。飲料包括裝瓶的啤酒，一種紅的酸酒，和一種強烈的老式家造蜂蜜酒，在這個滿意的開端之後，第二道菜是影嫩而又香的肝，在洋葱肉汁中燉的，加上煮得快碎了的馬鈴薯。我的女主人很抱歉，因為她沒有時間按照法國式的煎法來做，對於這一點我感到很感激她，第三道是波蘭家鄉菜，叫做 *grosz*——用捲心菜，洋葱和香腸一起蒸出來的——比盧布林做出來的有味得多了。之後來了牛舌——四條大的整舌頭——我們一塊一塊而不是一片一片地切着吃。和飯後茶一起來的是蜜糕和叫做 *kuchnia*——波蘭話蘇——的糖麵麻花。

我們的談話轉到婦女在軍隊中的地位上來了。斯奇爾文思太太談到一件自西烏克蘭動員波蘭女孩的故事，她們當軍隊路過的時候加入了軍隊，因為她們要到波蘭去。有兩個女孩子到她那裏去徵求她的意見，她們對於參軍感覺猶豫不決，因為她們聽說這會使她們失去合體婚姻的機會。上校大笑起來。

「找一個男人並且確知他可靠不可靠，最好的地方就是軍隊。假如一個軍隊裏的女孩子是一個好女孩子，她會找到她的伴侶的。而且這是一個好地方來考驗你的男人。一個軍隊裏的同志是一個經過考驗的忠實同志。只有當我們去攻擊的時候」——他看了他的妻子一眼——「我才能儘可能的留在後邊。」

上校的夫人抗議道：「我們已經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年了。假如他必須去死，爲什麼不一塊呢？」很明顯上校並不同意。

斯奇爾文思基在俄國革命的時候加入了紅軍，那時波蘭還仍然是俄國的一部份；他在軍隊裏已經幹了二十四年。在那二十四年當中，他從來沒有給那在波蘭鄉下的老母親寫過一封信，因爲恐怕他們假如知道她有一個兒子在紅軍裏面，會把她殺死。」最後由於戰爭的運氣，當他得以回到老家的時候，他自己的母親一下子都沒有認出他來。當他講出他自己的時候，她暈倒了；等她蘇醒過來之後，上校馬上獻出他的妻子和兒子。這一來使老太太相信了，因爲那男孩子正是他父親離家時的模樣。

「但是他們在蘇聯是沒有家庭的呀，」這個困惑的鄉下老太太仍然抗議。「孩子們全讓國家拿去了。」

「完全沒有那回事！他就是我的孩子，並且現在他已經回到波蘭來了。摸摸他，媽媽，他像不像一個小伙子？」

一直到下午很晚，我們才辭別了斯奇爾文思家裏的人。我們在一陣旋風中急忙去訪問坦克特。

我們的吉普在深泥中滑上滑下，有幾次幾乎翻了車，一個鐘頭這樣的路把我們帶到另外一個訓練營，也同樣座落在一座森林中，在森林邊上的一塊空地上站着一長列蘇聯造的堅固的中型綠色坦克。它們擺在一碼深的坑裏，下面更深的坑裏有燃木頭的火爐子保持馬達的溫度；綠色的防水布遮蓋着它的，一個坦克手爬進一輛坦克給我們做一次表演。那綠色的野獸大聲轟叫着擺了幾下，集中起力量，然後發出一聲大吼就爬出坑來，並且隆隆地穿過空場。

「這些孩子們已經在這裏受訓了三個月了」當那個坦克慢慢地回到它的巢裏去的時候，營指揮官這樣說。

我們在薄暮中來到貝莫的砲兵軍官學校，那座華麗的有四百多間房子的五層樓建築在戰前的波蘭曾做過鐵路管理局，在納粹統治下則是蓋斯塔波的區總部。當紅軍攻克貝莫的時候，他們發現地下室裏充滿了血污和屍體，在那裏犯人們曾被拷打並且處死。現在就是這個同一的地下室變

成一個有秩序的軍官餐廳，在那裏我們的「茶」端出來的時候，還帶有各種冷肉，帶花樣的大塊黃油，各種麪的面食和酒。

一千六百個學員正在這裏受訓，預備將來做砲兵軍官。學校經常地和戰時的貧乏作鬭爭。當我們進去的時候，電燈閃了幾下，跟着就熄了。這種事情一個禮拜發生兩三次，因為德國人已經把當地的電燈破壞了，因此他們暫時接到那載荷已經太大的盧布林的線路上。年青的學員們堅持用洋蠟帶我們參觀整個五層樓，他們帶了洋蠟做了一次繼續不斷的巡視，有時高舉起蠟燭照出那不同團體用以裝飾他們的牆壁的各種旗幟、標語和口號。

學校在設備上是原始的，但在方法上却是近代的，課室裏的許多桌子和椅子都是用手工白木頭做成的，或是用小學校的凳子架高起來，在這些粗糙的東西上有學員們做的精細模型以及表示砲兵各種射程的地形，教室裏硬木的地板上則是一行一行的草墊子，擺得非常美觀整齊，床和彈簧墊子是沒有的，但地板却是非常的光滑，簡直可以在上面吃飯。當我稱贊他們那整潔的秩序時，他們回答道：「當然，這是軍隊呀！」

吃茶的時候，學校裏的教師——另外一個在德國佔領期間藏起來的教師——告訴我們說，學校的指揮官在素教工作方面給了他各種的方便，並且士兵們的反應也很好，在我右邊的教官是一

個蘇聯人，帶有六個獎牌和勳章；兩個保衛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獎章，渡過頓河的紅旗勳章，和三個在芬蘭戰爭中所得的勳章，那是由於用砲兵協助擊潰曼諾海母防線而獲得的。

「倫敦的波蘭人會把你之在場加以曲解哩，」我微笑着說，他聳了聳肩，好像這沒有多大關係。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波蘭有法國的教官在她的軍隊裏，今天你能找出幾個波蘭人可以用近代砲兵實際作戰的經驗來講授的呢？」

我們在燭光下面吃完了我們的茶。正當我們說再見的時候，突然來的電燈一下子照亮了整個房子。

波蘭新軍經常強調它和過去的不同之點，這些不同之點是些什麼呢？爲了獲得一個權威的答案，我去找查瓦斯基將軍——負責軍事政策的副總司令。

「我們把我們的軍隊叫做一支『民主的軍隊』，」他告訴我，「我們這樣叫的意思是說我們的士兵同時也要成爲公民，並且要來保衛一個民主的政體，我們告訴他們：『你們不是站在人民頭上的，你們是人民的武裝了的兒子。你們的問題就是波蘭農民，波蘭工人，波蘭知識份子的那

些問題，你們必須明瞭他們的問題，並且保衛他們的公民權利。」

「在每個國家裏面，你都可以找到那種要軍隊「和政治分家」的人。這些人通常是些反動份子，他們不願意讓士兵討論關於民主的各種問題，世界上每一支軍隊都是某種政策的工具，也就是政治的工具。戰前波蘭的軍隊是那惡跡昭彰的「上校政體」的工具，這個政體在一九三九年崩潰了，那時士兵們必須「服從而且不許背後講閑話」。戰前的軍隊不但服從他們屠殺東波蘭的烏克蘭農民的命令，而且甚至還服從讓他們向正在克拉考夫附近遊行的饑餓的波蘭農民開槍的命令。」

「我們在軍隊中不需要機器人！讓當兵的知道他為什麼來作戰吧！讓他知道波蘭軍隊是波蘭人民的一部份，並且只有這樣的一支軍隊才是守衛堅強的。」

「你在軍隊裏提倡政治到什麼程度呢？你讓不讓不同的政黨提出他們不同之點嗎？」

「不允許任何人在軍隊中提倡法西斯觀點。我們的士兵宣誓擁護一個民主的波蘭和萬達，拿若多瓦的權力，在我們的政治教育中可以找到四個民主黨的代表，我們對於這些政黨一視同仁，他們全站在民族解放委員會的立場上，在我們的政治教育中也常發生不同的見解，但是對於另外一個民主黨派的攻擊，在軍隊裏是不允許的。」

一種新的軍隊自然就需要一種新的軍官，查瓦斯基將軍說，在挑選這些軍官的時候，「我們

自士兵中挑選那些表現出指揮能力的人，我們打倒那種認為軍官是另外一個階級的觀念，他們不過是有特殊軍事才幹的公民而已，以前家庭出身和金錢是進入軍官學校的決定條件，在戰前的波蘭，「一個軍官的光榮」這個概念是十分封建的。

「在我們戰前的軍官中間，對於民主國家的輕視是很普遍的，軍事學校裏的教官們公開的說：『帶有那種爭吵的國會的英國，法國和捷克是多麼的軟弱呀！德國和意大利才是強壯的！』我們教育我們的軍官時所講的正和這相反，我們說看看那些國家得到最後勝利！是那些民主的強國，在這些國家裏面，普通的老百姓也有某種要保衛的東西！」

查瓦斯基加上說，在現在的軍隊裏邊有「成百的舊軍官」。『他們之中有些人升得很快，我們承認自任何波蘭軍隊所得到的階級，不管它是戰前的軍隊，各種地下軍，或是在國外作戰的軍隊，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內地軍的軍官，假如他們公開參加我們的隊伍，但是關於內地軍的軍官，我們會有過相當的麻煩，這些人隱密起他們過去的地位，並且參加近來分裂我們。』

由於查瓦斯基將軍的要求，維克多格羅茲上校，政治部主任，告訴我關於政治訓練以及內地軍軍官所造成的各種困難的詳情——政治部就是在行政上管理這些事情的。他指給我看一束來自各部隊單位中「政治教官」的典型日報，工程師是到關於第五縱隊的講授，給防空部隊講的是「

軍事秘密！「什麼事情可以寫信告訴家裏」。一個單位曾討論了土地改革，另外一個單位則討論了爲什麼波蘭在一九二九年失敗了以及波蘭如何再興起」。幾個接近前線的單位曾討論了德國人所扔下的傳單。

「我們並不把德國人扔下的宣傳品藏起來，」上校說。「我們指明它的來源。看見德國人寫道：『你們不是在波蘭的軍隊裏面而是在布爾塞維克的軍隊裏面！槍斃你們的軍官，到我們這邊來，我們保證給你們一個自由的波蘭。』連最簡單的波蘭兵也笑了起來。最近德國人比較聰明一點了。他們說：『你們真正的波蘭政府是在倫敦』，或者『英國人和美國人把你們出賣給斯大林了。』要分別德國人的傳單和倫敦波蘭人的傳單是漸漸不容易了。這一點我們也給士兵們指出來，說明德國人和內地軍時常用同樣的口號。」

和內地軍的磨擦究竟有多麼嚴重呢？我問上校的意見，邱吉爾首相一直在國會裏暗示說，除非「波蘭的問題」得到解決，也於不同事情的不同波蘭武裝力量可能爆發成爲內戰。格羅茲駁斥了這個意見。

「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內地軍。要在許多地下的單位中保持廣泛而有組織的統一也是很難的。在波蘭淪陷區有各種各樣的地下組織。有的只是一些爲了安全而跑到森林去的人，並且靠搶劫維

持生活，另外一些單位是有政治信仰的。後者中間有我們季米爾斯基將軍底下的人民軍，和農民黨的武裝部隊——各種「農民營」——他們多少是和我們合作的。有些內地軍的單位在某些特殊的抗德行動中和我們合作，另外一些則不然，最反動的團體是那些叫做 NSZ (Narodowe Siły Zbrojne——國民軍) 的人。這些都是恐怖主義者，他們暗殺猶太人及左傾份子，或者把他們出賣給蓋斯塔波。倫敦的波蘭人接受他們的同盟並且把他們算做內地軍的一部份，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內地軍都是這一類的。

「當紅軍和波蘭第一軍越過邊界的時候，民族解放委員會命令所有地下軍隊，不論其政治面目如何，一旦他們的土地被解放了的時候就馬上解散他們的組織，並且交出他們的武器。然後他們就被接受，並且重新編入我們波蘭新軍做爲正規軍，還承認其所有過去的階級。人民軍，大部份的農民營，和一些內地軍支隊忠誠地執行了這些調令，但有些內地軍，特別是有相當數量的軍官，逃避動員令，或者就用一個假名加入波蘭軍，以便進行分裂甚至謀殺。」

格羅茲上校拿出一份來自一個訓練營的報告。一個內地軍以前的軍官，隱瞞了他的姓名和過去去歷史來加入軍隊當一名小兵，並且很快就升爲士。「一天晚上，營裏面他那一部份發生了騷動。新兵們在叫喊：『我們不讓他們把我們帶到西伯利亞去！』有人造出這個奇怪的消息，說他

們會被送到西伯利亞去。許多人跑到森林裏去了，在那裏有一支地下的內地軍正在等着他們。兩三天之內大多數我們的人回來了，樣子非常羞愧，於是我們才發現那個假冒士兵的人以前是一個地位相當高的軍官，是他造成這次的騷動，這些陰謀是很可惡的，但並不危險，比較嚴重的是有人在普刺格給兵們有毒的酒喝。我們正在進行調查，看看這究竟是德國特務幹的還是倫敦波蘭人的特務幹的。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們的實際辦法愈來愈一樣。」

照格羅茲的講法，內地軍主要的威脅不是加諸波蘭新軍而是加諸非武器平民的，特別是民族解放委員會負責執行土地改革的人，有幾十這樣的平民被暗殺了。和波蘭新軍忠誠合作的內地軍軍官也特別容易遭到以前同事的危害。克魯皮夫尼斯基少校——以前是一個內地軍軍官，現在在波蘭新軍裏是查莫斯區的新兵負責人——正當他在一個公共場上和農民演講的時候，被人從後面暗殺了。NSZ（國民軍）的匪徒也有時襲擊小城鎮，殺死猶太人。

「這不是內戰，這是不折不扣的土匪和暗殺。」格羅茲結束說，「它威脅社會的安全和秩序，但不論對於我們波蘭新軍的力量或是對於波蘭的穩定都不是嚴重的危險。」

第六章 華沙前線

在東線，我是爬進地道並且蹲在壕溝裏直接面對着德國火力的第一個美國人。三年以來，莫斯科的外國記者們，包括許多年青的男性戰地記者，都沒有能到達東線的前線陣地，最後却是我，一個女性，由於波蘭人的招待反而到了這裏。

當我告訴我的盧布林的朋友們說，我要到華沙！更具體地說是普刺格，那已經在波蘭手下的首都的東部——去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向我澆涼水。雖然華沙只不過一百哩遠，但交通是很可憐的，而且甚至在政府的食堂裏，謠言也很多。德國人正在放可怕的V-2式火箭！人民在混亂中正在逃難！在斯比卡爾斯基上校底下的市政府已經撤至奧瓦斯克城南十二哩遠的地方去了！從普刺格出來的最後一部卡車只能從東面迂迴地逃出來！

當我最後到達這個城市的時候——坐吉普，由一個年青的波蘭尉官陪着——我才發現這些謠言背後的事實。我們繞道進了城，因為主要的公路在大砲的火線下面，市政府一直是在普刺格中

心的奧瓦斯克街上，那裏曾經落下了兩個飛彈，其中一個毀壞了一所房子，但是甚至那消息最不靈通的平民也不認為這些飛彈就是那可怕的V-2式武器，同時人民正在回到普刺格，人口已經到達十二萬。

戰爭前線穿過華沙城。紅軍以及和它在一起的波蘭第一軍，在一九四四年的九月攻入城的東部，在這裏，維斯杜拉河阻止了大軍的前進。在撤退中的德國人把那連接波蘭首都東西兩部的四座漂亮橋樑給炸毀了。河的西岸——華沙的五分之四——仍然在他們的手裏。普刺格——在東岸的工業區——則為紅軍所佔領，其河邊陣地是交給波蘭人防守的。

在這個受過砲火洗禮的城裏，比較在盧布林更容易覺出一個全國首都的驕傲來，盧布林究竟不過是一個墮下城鎮而已。人們感覺出波蘭不死的精神，這個國家曾經歷過若干世紀的戰爭！並且生存到如今。在這次戰爭中間，華沙已經打過三次殘酷的仗，並且正在等待着第四次的到來。一九三九年波蘭政府已經逃走之後，由斯塔金斯基市長所領導的英勇保衛戰贏得全世界的贊揚，一九四三年華沙猶太人街那些註定死亡的猶太人的戰鬥，在國際猶太人歷史上展開了新的一頁，刺激了許多城市的反抗。關於波蘭將軍在一九四四年八月的悲慘的起義，我將在下一章來講。與這同時，紅軍和波蘭第一軍正在奪取普刺格，一路衝入德國在波蘭最堅強的堡壘，他們現

在正在壕溝裏，等待那決定的一戰，這一戰將使華沙和全波蘭轉入他們手中。

在沿河的第一線陣地後邊，非武裝的普利格也是前線的一部份。這裏的人民生活在敵人每日不斷的砲火下面，在市場上買寶麵包，在那些地方他們可以目睹德國的大砲。幾乎每天都有房子，學校或公共建築被毀壞，時常還有人的傷亡。人們似乎對於這種間歇的砲擊還不如對於水電的缺乏來得更擔心。

普利格市民生活的困難，在我剛剛到達的那一小時就覺出來了。在市府大廳照呼來訪客人那身穿軍裝辦事迅速的女人——她的名字叫絲蒂芬尼，她的姓我甚至連想發那個音的企圖都沒有——馬上把我送到文德爾糖菓廠。

「你剛好還來得及，我們的工廠都在三點鐘關門，以便工人在天黑以前可以到家。他們之中有些人要走很遠的路，並且現在還沒有電車，德國人過去把電車都集中在車庫裏，並且一下子就全把它炸光了。我們的電車工人正在挖掘那些碎片，並且重新裝置起來。」

我們開車穿過那以前的大工業區域，一大堆一大堆彎曲得奇形怪狀的鋼鐵和破碎的磚瓦，說明那些地方以前曾豎立着工廠。德國人也把文德爾廠的大部份給炸掉了，這個聞名世界的糖菓廠以前曾在巴黎有分店，並且在紐約的博覽會上也展覽過出品。他們忽略了兩個小廠沒有炸，大約

有兩百個女工——戰前僱用一萬人——已經重新開始製造餅乾和餅乾，到現在她們做的還很少，而且她們的餅乾也不公開出售，餅乾全由政府及社會機關買了做慶祝過節之用，例如我在盧布林所參加的PPS（社會黨）的兒童聖誕節。

出人意料之外，工廠在兩點半就關了，以便工人們可以在回家之前組織她們的工會。在這簡短的大會上，演說者時常把他們的聲音提得比砲彈爆炸的聲音還要高，女工們很少注意這種顯然是經常的相互砲擊，對於演說者關於工會的平常解釋——什麼會員是自願的啦，什麼工會「不像納粹的勞工陣線」而是保護她們的利益的啦！假如她們的注意力有時也分散一下的話，那就是對於坐在一隻破椅子上我這個美國客人的注意了。她們顯然對於我的在場而感覺奇怪。

當她們要我向她們說話的時候，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在美國我們認為戰爭中最嚴重的事情就是砲火，但看起來砲擊在這裏全沒有關係。在萊沙，戰爭所意味着的最嚴重的事情究竟是什麼呢？」我想他們會說那是饑餓，或者也許是寒冷。

於是一個微瘦而面無消瘦的女人站起來說：「最嚴重的事情是德國人把我們的男子漢都帶走了，並且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死了，還是在德國做奴隸，同時也沒有人來幫助我們和孩子們。」別的人都點頭同意。

我問他們有多少人失掉了他們的男人。十分之九全舉起手來。我恐怕會場裏會爆發出一陣哭泣，所以我馬上就把題目換了，於是每個人才透過氣來，以後在旁的地方，我又重復了這個問題，並且發現普刺格百分之九上的男人確實都被強迫帶走了。

這就是普刺格所背負的重擔，在這付重擔下普刺格揮汗著。波爾將軍的起義對於整個華沙都是突然的，起義在下午發動，那時大部份的男人都在外面工作著。那些住在普刺格的人都正在河那邊工作著，於是就永遠沒有回來。有些住在河那邊的人都正在普刺格，於是也就永遠沒有回到他們的家裏去。用起義作爲一個藉口，德國人就有系統地一條街一條街地進行包圍，搜索了所有的房子並且把壯丁抓出來。他們隨便亂槍斃了一些人，用以恐嚇其他的人。他們把其餘的人帶到一個在普魯茲柯夫的集中營，從那裏再把那些能從機械和傳染病中逃出來的人轉送到德國去。關於他們的命運沒有消息傳回來，普刺格的人民可以隔着河從那爆炸和煙火中看出來，德國人正在炸毀並焚燒那裏的房屋。他們知道那裏的人民也已被驅入死營，或者正被趕到德國去做奴隸。

在那臨時的市府大樓——以前的高級學校——裏，絲帶方尼解釋着在這種似乎無用的殘忍後面的納粹策略。——他們打算毀壞波蘭的將來。他們炸掉我們的工廠，他們拿走我們的機器和設備。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可以再建起來。要再產生一個熟練的工人階級需要更長的時間了。所以

這就是德國人所要毀壞的對象。」

這時候許多在盧布林的波蘭人恐怕華沙至少在十年之內不能做爲首都了。但是這個破碎的普柯格——華沙的五分之一——覺得，並且行動上就是一個全國的首都。當我給那些糖業工人一個機會來詢問關於美國問題的時候，他們不像盧布林大多數的人那樣地問到什麼時候聯合國救濟總署或美國紅十字會將送來援助；他們問道：「什麼時候美國將承認我們？美國的波蘭人對於那些倫敦的波蘭人想法如何？」

其次一個節目是一種值得驕傲的事情。由那些因爲戰爭而流亡了五年的音樂家們所集合成的一「新華沙交響樂隊」，四點鐘在市府大廳舉行它第一次的演奏會，歡迎「文化處」處長日茲莫夫斯基。

四十位音樂家坐在會議廳的台上，有中年的男人和年青一些的女人，都穿着大衣或是羊皮襖，以便抵抗那激骨的寒冷。四根粗糙的灰色電線桿子在他們的頭頂上交叉橫架着，防止那經炸彈震過的四壁倒塌下來。日光正在暗下去，並且那天晚上也沒有電燈。聽衆很少，主要是市政府的僱員和少數特殊來賓，因爲這時候大多數的市民正在急忙地趕回家裏去，或者正在半黑暗中預備着一天最後的一頓飯。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弄的「Polonaise」(慢舞曲)演奏得像那次一樣。以前我從來沒有真正了解「Polonaise」這個字的意義。於是當黑暗降臨，直到我們不能看清人們的面孔而只見朦朧的形體映在蒼白的窗子上的時候，就聽見那波蘭古舊的歡呼「So lat, So lat!」——願你長命百歲，願你長命百歲——朝着那兩柄微曲，手執指揮棒的白髮男人高喊起來，他在那時就象微著波蘭的民族文化。事後我才知道那二十幾段「Polonaise」和那自波蘭歌劇哈爾卡選出來的若干段都是指揮者由他的記憶中寫出來的。在波蘭已經找不到任何樂譜了。

「我盡了我最大的努力，」那個狂熱地賦身於音樂的人告訴我，「但是我不能記住每一個音符。有些伴奏可能是我自己的寫作。」他偶然地補充道，他在開始演奏的五分鐘之前不得不更動節目，因為一件重要的樂器那天下午放在一所房子裏被炸掉了。

更在那以後，而且更偶然地我知道了斯比卡爾斯基上校，華沙普利格的市長——他曾答應我在音樂會以後給我一次接見——曾在演奏中間離開大廳去組織援救那些埋在房子底下的人們去了。他親自拾起木樑，並且幫忙拉出一個男人的屍首，四個受了驚而未受傷的女人，和一個絲毫沒有受傷的嬰兒。兩個鐘頭以後，當我在民主黨華沙支部的宴會上遇見他的時候，他那副得很好，的制服以及他那生氣勃勃的儀表，都顯示不出他剛才的活動來。

我們坐在一間裝飾高雅，點綴着一些美麗圖畫的屋子裏，這是民主黨一個黨員的家，交給組織用來歡迎日茲莫夫斯基的，後者也是民主黨的一個黨員。我們享受了、頓精美的茶，每一道菜都是加意選製的。我們爲每一個在波蘭和在聯合國的人乾杯，並且祝所有的人 *God Bless Us*。——長命百歲。帶着特別的熱情，客人們爲美國有三種不同形式的乾杯：爲羅斯福總統乾杯，爲「世界上最老的民主國之一」乾杯，並且爲我個人——第一個到來的美國人——而乾杯。

一個年青的女人，傾身向我挑戰似地說：「你將永遠不能講出我們在波蘭的生活！當你寫它的時候，它已經不是那樣了。我念過一篇關於我們地下工作的文章，並且想：「似乎不完全像所寫的那樣。」那篇東西所講的種種冒險和悲劇是够真實的。但是它未能講出來我們在反抗中多麼快樂，以及在開智勝過納粹野獸的時候，我們是多麼興奮。」

已經是十一點了，最後，斯比卡爾斯基把我和絲蒂方尼帶到市府大廳底下那間地下室裏去，在那裏他和他的副官一起住着，於是鬆了一口氣說道：「現在開始訪問吧。」我記下一鱗半爪，關於當紅軍進來的時候人民如何從地下室中跑出來，並且開始尋找食物，以及他們如何清理老的深鑽井和架設臨時電力線，因爲這些公共設備平時都是從河那邊運來的。訪問剛好在這個地方打住了，因爲市長大人正在他的椅子上打起鼾聲來，同時還有四位可尊敬的市民正在一個角落裏等着

給他更多的工作哩。

於是我問絲蒂方尼——這是在這一整天內頭一次得到時間來問這個問題——「今天晚上我睡在那裏。她帶我去的那間屋子是在同一個地下室內，但是不如斯卡爾斯基的屋子那麼舒服。他的房子多少由一個爐子和不斷的來客帶來點暖氣，但是我的屋子却只有一面剛洗過的水泥地，仍然是潮濕而寒冷的，和一架小鐵床，上面鋪著硬被單。在這間地下室中我冷得發抖。絲蒂方尼請我到她的二層樓的房間裏去，以便在臨睡之前暖和一下；當我看見她那擺有小床，桌子和兩把椅子的小房間時，我就毫不客氣地在爐瓦已逐漸冷下去的但仍有些溫的荷蘭爐子上烤起火來。

「我們不能把我的床搬到這兒來？」我試探着問。絲蒂方尼似乎對於我的選擇很高興，但覺得她有向我解釋的責任，那就是有鑑於幾乎每夜都有的砲擊，地下室房間對於尊貴的客人是比較安全一些。

「在那間地下室裏面，感濕病却是必然的，」我辯道，「而德國的砲彈只不過是一種偶然的機會而已。」我斷定這個機會很微小，因為絲蒂方尼已經在二樓上住了三個月却没有死，只不過損失了一塊窗玻璃而已。我們把床抬上來，剛好擺在剩下的空地上。絲蒂方尼聲明——我記下來作為根據——「你什麼時候來到華沙，這個床就是你的。」

所以，是絲蒂方尼，她告訴了我波蘭第一軍如何攻入普刺格，以及這個被毀壞了的都市如何恢復了生命。借著我們兩個中間的桌子上的燭光，我們談了一個通夜，等待著德國砲彈的降臨。絲蒂方尼是一路隨著軍隊來的。她會參加過兩次渡河，一次是強渡巴格河進入波蘭，另一次更戲劇性的渡河是在普拉威強渡維斯杜拉河。

「強渡一條河有各種不同的方法——用砲火或是用奇襲。我們用砲火強渡過巴格河；我的那個支隊隨後來的，沒有打多少仗。在普拉威我們在晚上秘密地把部隊送過去。敵人在早晨看見我們，於是維斯杜拉河之戰就開始了。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原始的木筏——蓋在桶上面的倉庫的門。當我們在水面上的時候，敵人的機關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只能站在一塊板上而無處可躲。

「我是在東岸，正在接運船隻。所有的砲火正射在我們那塊地方。在大約離岸六碼的地方，我們挖了工事，有一段時間我們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人們在我的四周到處倒下來，並且也不可能把受傷的人送走。於是我就捲起我的制服袖子，並且開始招呼他們。我們守住並且攔住了那灘頭陣地。但是在那五天當中，我們損失了許多的人。」

絲蒂方尼所參加在裏面戰鬥的多姆勃勞夫斯基師以後從普拉威被撤回來，並且被送到普刺格，「我們沒有參加佔領普刺格的戰爭，我們是在第四天作為第二線進來的。一路上我們都可以

看得見激烈戰爭的痕跡。我看見僅僅一個敵人的堡壘的四周就堆了十輛紅軍的坦克。你知道那些堡壘是怎樣的——實際上全在地下面。對於一個坦克駕駛手來說，似乎只有一個兵在抵抗他。但是在地底下却是一座整個的堡壘，有食糧，深鑽的水井和大量的軍火，以及裝在轉盤上的反坦克砲。華沙的附近全是這種東西。它們的殺傷力是很大的。

「河那邊起義還正在進行着，我們把人送過去援助他們。但是波爾的內地軍甚至於連他們在那裏都不告訴我們。他們撤走以避免接觸。在許多徒勞的戰鬥中我們損失了很多的人。」當我追問詳情時，她告訴我去找科爾茲克將軍。「他知道的，他那時正送人過去，那時我被調到斯比卡爾斯基底下去做市民工作去了。」

我知道茲蒂方尼是一個華沙愛國者，當她來到普刺格的時候，她馬上投身於各種羣衆大會裏去，這些會是軍隊的政治人員爲市民們召開的。「我們在全城到處開會。在頭十天之內我參加過四十五個大會，人民成千成萬的來開會，甚至在砲火下開起來。」

「敵人在北面還很近，而且射擊要比現在厲害得多，甚至要穿過一條主要的街道，你也得等待砲火暫停的時候過去。但是假如你派出兩個士兵到城裏任何一處地方去宣佈召開一個大會，人們甚至會帶着小孩子來聽。五年以來關於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他們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只聽到

混亂的地下宣傳，關於紅軍和我們的波蘭新軍，他們聽到彼此矛盾的事情，他們來聽我們波蘭軍隊究竟爲了什麼而戰爭。於是全城是一片哭泣和唱國歌的聲音。

「我在這些大會中的任務是建立各種市民委員會。」

「怎樣建立？用選舉？」我問道。

絲蒂方尼笑了。「當射擊還在進行着，房子在倒塌着，而人民正從一條街逃向另一條街的時候，你怎麼能選舉呢？你得穿街過巷躲來躲去，你得尋找積極份子和那些願意工作的人。你找到他們去清理街道，並且從倒塌的房子下面把人拖出來，以及清理水井。開始時你只有六個人，以後你找出一個主席和一個副主席，於是更多的人加入進來，並且你開始來分組：例如衛生組，食糧組，飲水組，學校組，救濟組。於是從盧布林來了食物給你分配，這樣你的市民委員會就有了權力！以後，市政府指定了食物分發人員，於是你的市民委員會就有了一項新任務：他們批評並作報告。

「舉例來說，某一市區的麵包味道不好，委員會就去調查究竟爲什麼。他們發現麵包師在轉麵粉，並且把最細的那一部份在黑市上賣了，把粗的做了配給市民的麵包，他們加以檢舉，於是城市的食糧管理處就換了另外一個麵包師。」

她正在講社會生活如何在紛亂中生長，所以我要求她講下去。「好，區委員會發現他們不能

什麼事情都管，要管倒塌的房子，要管到來的人民，還要管需要食物的難民。所以他們開始組織住宅委員會和街委員會，現在我們終於有時間來選舉了，住宅委員會和街委員會都是由住戶選出來的，生活正在近人軌道。

「我們住宅委員會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運進冬季的馬鈴薯供應。我們在盧布林的中央負責人投標給普刺格來蒐集一定量的馬鈴薯，做為一般食物實質的一部份，農民們願意拿出來。但是不願意運輸；他們說他們沒有馬匹，我們召集了我們的住宅委員會來尋找城裏最好的運輸車。我們派出去五十輛車——那種假如能找到馬每小時能走十五哩的車。當他們把馬鈴薯運到倉庫以後，斯比卡爾斯基再用軍用卡車運進來。」

這樣絲蒂方尼成為華沙市長的左右手，她對斯比卡爾斯基的景仰可以追溯到戰爭時代，那時他是城市設計處的建築工程師，而她是個工廠裏的工人，對於公共事務很積極。「斯比卡爾斯基也協助設計過波茲南，」她告訴我，「但是華沙是他的家鄉。他知道而且熱愛每一塊石頭和每一個角落，看着隔河德國人在破壞那些良好的建築物，簡直使他覺得肉痛。」

很明顯她要打瞌睡了。在我的追問之下，她談到一些最近的事情。住宅委員會為了軍事動員已經操出徵兵名單，他們為學校找了一些房子。目前他們已經發動了一個「為士兵送聖誕節禮

物」的運動，正在拜訪每一家住戶。「假如他們不能拿出像圍巾啦，手套啦這種大東西，也許他們可以拿出紙來給士兵們寫家信用。」……是的，這真是一個在混亂中生長出來的社會。

絲蒂方尼嘆出一點我所感覺的東西來，因為當蠟燭快熄的時候，她在半睡中被倦地說道：「所有這些組和委員會都是在一個月中開生反出來的。現在我們普刺格有兩千個住宅委員會。當你鬧爭說服他們的時候，你不相信你能成就些什麼，但是當你像這樣——總結的時候，你才看出收穫有多大。也許由於你之來到普刺格而使我列舉出我們所曾做過的一切，是一件好事情。」

當我們去睡覺的時候已經過了兩點了，但絲蒂方尼在天亮以前就叫醒了我。普刺格的生活是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三點。夜間下了霜，院子裏有很厚的冰。我們吃完麵包和咖啡——我的華盛頓咖啡增加了女主人代用品的香味——的時候，市政府裏已擠滿了襁褓，冷得發抖，但却很堅定的市民。市政府的職員們正在簡單的事务桌上接見他們，在每一間大屋子裏都有一打這樣的「局」。

正當我們走進一間屋子的時候，一塊因為昨天的砲擊震鬆了的窗玻璃落了下來。市會計員把他的椅子從風口中移開，凍得發抖但仍然繼續工作。負責幼稚園的女人看看有沒有辦法把窗糊起來。兩個在口邊證桌前正在清理著四種顏色的食物券的女人，看看破窗戶，並且得意地說道：

「我們把所有配給學校和教員的馬鈴薯在昨天下午以前分發完了。」

穿過院子我訪問了一個五年制學校的一班，這一班正在教員自己的屋子裏上課。她的床被推到一個犄角裏去，以便容納兩排桌子和十六個孩子。教員後邊是黑板，波蘭國徽，兩面交叉的國旗和一張「耶穌聖像」。一大半的孩子曾親見他們的父親被德國人帶走，有一個孩子的母親也被帶走了。聽說我是從美國來的，他們都非常驚喜，但是因為在德國人統制下面是不教地理的，所以他們對於美國究竟在那裏很少概念，雖然有一個男孩子知道那是「在海那邊的一塊很大的地方」。他們知道美國是一個「同盟國」，一個女孩子猜想「邱吉爾」是它的大總統，但是一個男孩子肯定地說是「羅斯福」，因此得到全班的支持。他們知道蘇聯位置在東方，因為紅軍是從那邊來的。

經過幾條街，我訪問了一個市民委員會的區總部，並且認出那位主席就是頭天晚上我在慶祝晚宴上碰到的那個人。柯得尼不是在戰後一下子升起來的。他是一個堅定的市民，在普判格的同一條街上住了四十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帝俄統制下面，他領導過「第十四區市民自衛隊」。他是自然會被鄰居們選為委員會的主席的，這個委員會有十個委員，其中包括一個工程師，一個醫生，一個教授，四個產業工人，和幾個婦女。

柯得尼的委員會管理一個大廚房，每天供應三千份飯食，並且曾經分發過幾萬磅的乾糧。「我們最困難的任務是給那些遭到轟炸的家庭找房子，」柯得尼嘆了一口氣。「我們已經做得不壞了。兩個月之內我們在這一區裏安置了一千三百個家庭。」他爬上一輛沒有蓬的吉普車，爲了普刺格的糧食供應問題，在零度的天氣中到盧布林去了。

我自己坐的吉普車曲折地經過華盛頓街，開向波尼亞多夫斯基橋去，先轉入一條小街，又轉入另外一條，我的目的地是那位於河邊在破爛房子中間的波軍前線地。「我們盡可能地避免在主要的大街上停留，」帶我出來的那個年青的上尉解釋道。「大街直對着敵人的陣地。」

轉向左邊我們把車停在離河不遠的一堆破爛房子中間，有錢的和有知識的人們曾經住在這裏，以便觀臨河景；這一點，從那散佈在邊道上和那爲寒霜所蓋的花園中的美麗黃瓦上——我們穿過花園小心地走向岸邊去——以及從那由二樓倒到街上來的大鋼琴上，都可以顯然地看出來。在破牆和碎窗的後面仍然有一些可住的房子，等待砲火決定它的命運。

從一所房子中出來了兩位老太太。上尉漠然地向他們看了一眼。「九月間市民們就被命令離開河邊，但是他們要留下你又怎麼辦？我們不是德國人。我們把年青人和家屬都趕走，但是這些

老年人既不能工作又無處可去。他們寧願死在家裏也不願移動，當砲擊很厲害的時候，他們藏到地下室裏去。」

在一處地方我們必須在露天中走過一條街，只有一層薄薄的沒有藥子的灌木可以隱蔽一下。上尉把他的黃雨衣扔在我的深藍色的外套上，一面解釋道：「這裏我們在敵人的觀測下面，最近他們很沉靜，並且對於偶然經過的士兵似乎不問浪費子彈，但是你的外衣可能使一個狙擊手把你當成一個高級軍官。」在我們剛剛離開大行的時候，幾顆步槍子彈不規則地飛過行來。

砲兵觀測所是在一個四層樓別墅的屋頂上。我們彎下腰來，以免敵人越過和肩膀同高的胸牆而看見我們。從牆上的一個洞裏我用望遠鏡望河那邊看。除了那說明破壞的煙屑，簡直很難看出任何活動來。砲兵觀測手指出對岸頭兩個橋柱子中間的一些磚石——橋是炸掉了，但是支柱還在。

「那是一個發機關槍。我們要不要送他們一砲？」

「當然，」我說道，「而把望遠鏡還給他。」

我們送過去的不是一發而是四發，並且每一發砲彈都可以很清楚的用肉眼看見。我正自轉牆的一條裂縫中往外看，觀測手則正在用測有黑線標尺的望遠鏡觀看。他對着一架電話作校正，一面說着：「右，零，零，二」這樣的字。他說完之後我們就聽見一陣隆隆的白砲聲，遠在我們的

後面——他們說有兩三哩遠——跟着就是我們頭上空氣裏嘶嘶的聲音，然後就是砲彈在對河落地時的爆炸聲。第四發剛好擊中目標。在橋中間揚起一陣碎片。

「現在下來吧，」上尉說，「因為敵人要回敬了。」他帶我走下樓來，但是觀測手却仍然留在他那四層樓上的房間裏，因為他對地下室空氣。他一直是很幸福的，雖然我看見他的門和窗子上點綴着二十多子彈洞。

當敵人沿河用一陣白砲和步槍「回敬」的時候，我訪問了壕溝和地道，那在平時防止維斯杜拉河泛濫的大土堤成爲戰時機關槍陣地和槍手們的地下宿舍了。彎着身體我爬過一個地道，穿過堤面來到對着河的那一面，那裏有一架機關槍對着一個小圓洞瞄準着敵人。現在我和德國人之間，除了維斯杜拉河和空氣之外沒有別的東西了。

「白天我們不放下架槍，因為恐怕敵人發現了它。」

當敵人的砲火沉寂下來的時候，我們又躲閃着走了出來，現在更加小心了，因為德國人警覺了，並且多少朝着我們這個方向送過來一些砲彈。在一所房子裏，上尉把我帶到樓上去，像牌山似地爬過若干大廳中的磚石堆和一度曾經是一間漂亮的洗澡間的破爛堆，以便可以看見那有名的波尼亞多夫斯基橋最好的全景。橋的整個中段——九月間被德國人炸毀的——躺在河床上成爲一

堆爛鐵，大圓架從兩岸伸向河中間，靠我們這邊的最遠最高的鋸齒形架子上飄着兩面向敵人挑戰的紅白色旗幟——看起來在最平靜的情況下而也只有最好的建築工人才能掛上去。

「兩個我們的人在十一月十一日——我們的獨立紀念日——的前一天晚上，帶着旗子出去了。這是一件困難的任務，因為有許多鬆了的鐵件，一碰就嘎嘎亂響。但是早晨就看見旗子飛揚起來了，從那以後德國人就老朝着旗子開槍，但也未能把旗子打下來。」

這個支隊的總部是在離河有幾條街遠的兩間屋子裏，那裏的破窗戶爲了禦寒都是用木板擋起來的。以前屋主的四張巨大的華麗的油畫俯視着零七八碎的戰時用具，我一面喝茶一面和營裏的十幾個青年軍官們開談着。他們都是些快樂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傢伙，喜歡和敵人開玩笑，一面等待着下一次更劇烈的進攻。

「德國人對於即將來臨的進攻很擔心，」有一個說，「他們隨時準備着我們的渡河。有一天晚上我們用草做了許多駁船，並且讓它們漂向華沙去。德國人用猛烈的砲火擊沉了這些船。可能直到清早以前，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彈藥究竟浪費在些什麼東西上面。」

最滑稽的是關於咪啞——〇〇的故事，德國人曾經威嚇地說過——兩邊都有無線電擴音器可以彼此喊話——他們將送過來他們的V式（德國人讀爲Vogel），把普刺格從地圖上炸沒有了。

波蘭人就回答道：「等著瞧我們的吧！」那天晚上他們弄到四隻貓，尾巴上給繫上一袋乾豌豆，然後把它們趕上「波尼亞多夫斯基橋」——就是那在河上的破鐵架子。貓帶著豌豆勇敢地跑上那鬆鐵架子，一路亂響；敵人就瘋狂地開起槍來。兩隻貓打死了，另外兩隻過去了。於是波蘭人就在那擴音器中喊道：「這就是我們的咪嗚——〇——！」

在場最老的軍官——一個上校——曾經在軍隊裏幹了二十五年。「我曾經打過五次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戰爭，西班牙戰爭，芬蘭戰爭，和這一次戰爭。這是我給我自己的國家——波蘭——作戰的第一次的機會。」

在場最年青的兵是柯比，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他的母親炸死了，他的父親一面帶着兒子被殺入伍。

「你在軍隊裏做些什麼？」

「射擊。」他驕傲地說。

「他是一個傳令兵，」上尉解釋道，「而且是一個很勇敢的傳令兵，甚至在火線下也執行了所有的命令。他是一個堅強的小鬼。他一直從巴格河徒步走到維斯杜拉河，從來沒有要求過坐車子。」他還說，許多這樣的小鬼找上軍隊企圖加入，在沒有別的人可以照顧他們的時候，軍隊就

帶上他們並且把他們送進軍事學校。

瞪着乾燥的眼睛，這個小鬼告訴我，他活着的目的就是殺德國人來給他母親報仇。他一點也沒有他是一個被剝奪了童年的悲劇人物的想法。當我問他戰爭完了以後他打算做什麼的時候，他用一種尖銳而發顫的童音只說了兩個字——「軍官！」

我一直認為前線是穩定的，我以為除了互相砲擊以外，寬廣的維斯杜拉河對於其他任何行動都是一種完全的障礙。一個年青的尉官却使我吃了一驚。「真不巧你昨天晚上不在這兒。一羣人過河去俘獲了一個「舌人」——偽獲得情報而捉來的敵人。」

連最輕微的一點聲音都會招來探照燈的時候，人們怎麼能過到那邊去呢？他解釋說，他們的嚮導是一個老漁夫，對於夜間無聲的划船有過一生的經驗。負責的軍官是一個波蘭人，他曾經被迫在德軍中服務過，後來開了小差，帶着他的德國制服，具備着關於德軍規矩的知識。他們沒有發生事故就渡過河去，於是沿着河岸偷偷地走過去，直到他們碰到了一個德國哨兵，不等他開口，波蘭軍官自己就喊道：「站住，往那裏走？」（德語）出其不意地這樣一來，哨兵遲疑了一下子，這就給他們時間捉住他，並且把一個緊急救濟包巧妙地塞到他的嘴裏去。在回到渡船的路上，他們遇見了另外兩個德國人，並且不得不開槍衝出去。這一下引起探照燈的搜索，但是他們

設法迅速跑掉了。

「這樣幹是不是值得？他說出些什麼沒有？」

「當然說了！不但對我們說了而且對整個德國軍隊說了。在我們的擴音器上，他告訴了他的同伴，他們繼續作戰下去實在是些傻子。後來我們把他送到後方去了。」

這些孩子們把話題轉到美國。上尉似乎很願意討論一下近代美國文學。他知道德萊塞，阿普頓·辛克萊以及一些古典作家的作品。他提到我的關於中國的幾本書來讚許我。他是一個博覽羣書的現代化的人，但是那些年青的人向兵追問起美國來。

「在美國你們教地理嗎？美國人知道波蘭在那裏嗎？波蘭不是在倫敦那邊的騷裏！波蘭是在這裏，正在快要凍結的維斯杜拉河上作着戰。」

第七章 波爾的起義

華沙起義是在八月一日，正當紅軍接近華沙城的時候，由內地軍的指揮官波爾將軍發動的。它被德國人用兩個月的血腥屠殺給消滅了。估計有二十五萬人，大多數是未參加起義的平民，被殺死了。在這個期間紅軍攻入普納格——華沙東邊的那一部份，並且在起義之後的第六個星期，沿着維斯杜拉河建下了陣地。在西岸德國人繼續破壞着華沙城的主要部份。

在倫敦的波蘭人和蘇聯人之間的所有那長期積累下來的磨擦，都在這個悲劇上高度地爆發了。莫斯科的報紙指責波爾沒有和紅軍戰略配合，也沒有和任何同盟國商量一下就發動一次起義。季米爾斯基將軍——他的波蘭軍是紅軍的同盟者——直接了當的聲稱，波爾是够交出軍事法庭裁判，因為他為了一次無望的政治上的苦迭打而犧牲了波蘭的首都和它的居民。倫敦的波蘭人反過來指責紅軍不該在華沙的大門前停止了進攻，寧可讓這個城被屠殺而不願意看見流亡政府取得政權。他們提升了波爾將軍，使他成為他們所有波蘭國內外軍隊的總司令。授與他軍事十

字勳章的建議僅僅因為勳章部的負責人盧申奇利哥夫斯基將軍的反對而作罷，他說，在全部歷史，上這個十字勳章從來沒有給過一個發動行動而失敗了的人。同時，波爾已經成爲德國人的階下囚，他寧可投降敵人而不願落入在波蘭人中他的反對者的手中。

這個悲劇甚至在國際範圍內也成爲辛辣評論的中心。在給起義者投擲武器這一點上，英國人和蘇聯人的意見有分歧。蘇聯人認爲這些武器「會落到德國人的手裏」，因爲起義者的位置尚不知道。英國和美國的飛機從遙遠的地方飛來投下少量的武器，並且指責蘇聯「拒絕合作」。當蘇聯人到達了普利格，並且給起義者扔下大量武器的時候，辛辣的指責仍然如故。這樣的問題被提出來：爲什麼他們不早點扔呢？華沙起義，正如同波蘭流亡政府的許多別的行動一樣，正在同盟國之間種下懷疑。

九月末季米爾斯基將軍的記者招待會解釋了一些爭辯。他聲稱波蘭將軍第一次並且是唯一的「次求援要求，在起義的第一個禮拜通過在莫斯科的米柯拉茲克轉給了他，並且提到三處地方——歌劇院，理工學院和老城——是由起義者佔據着的。」我告訴米柯拉茲克，在技術上不可能把武器扔給單獨的建築物。我建議波蘭將軍給我們幾處在華沙西面可以大量投擲武器的森林或空地的經緯度。我從來也沒有自波爾得到任何回信。沒有任何送信的人從起義者那裏找到我們這裏來，直

到九月十二日才有人民軍的兩個女人設法過河到達我們這裏，並且告訴我們起義者確實的位置。我們馬上投送武器，並且繼續投擲直到接獲通知說，那個地方太小了不能接到投送的武器爲止。甚至當我們在波蘭大使館那些巨大的屋子裏開會的時候，起義的最後一幕才發生。我們不知道這件事，但是波爾將軍在我們的記者招待會開始的前一個鐘頭已經投降了。少數的起義者在紅軍砲火的協助下衝出來，渡過河而到達波爾第一軍，八點鐘——我們記者招待會開始的鐘點——就是預定開砲掩護的時間。當我們談話的時候，波蘭人正殺過河來。

當我去波蘭的時候，爭辯仍在沸騰着，在這裏是比較容易發現真象的。

我的朋友絲蒂方尼和金·文地——更不用提在普刺格波爾第一軍的那些士兵們——最先知道在那些爭辯的日子當中，紅軍在什麼地方以及怎樣的戰鬥過。斯比卡爾斯基上校——現在是將軍了——是關於德國在維斯杜拉河防禦戰最好的權威人士。指揮波爾第一軍的科爾茲克將軍清楚的了解什麼援助會透過河去。就東岸的情形來講，援助真不算少了。

關於起義本身的故事，有幾個參加起義的軍官講過，其中包括一個叫奇昂的人，當我在盧布林的一所住房裏碰見他的時候，他正咳得要死。一個女性起義者叫金·弗伯脫，曾在城內三處不同的地方戰鬥過，並且終於跟着最後一批人逃過河來。兩個穿着制服的動人的女孩子，雅瓦

斯卡和巴絲奈克，會摸黑穿過德軍陣地下的陰溝，把第一個信帶給紅軍。一個小販的做了母親的華沙人——由於這突然的起義而和她的孩子分開了——詳細地描述了非戰鬥人員們可怕的命運。

直到我在拉金這個小鎮的土地改革的慶祝會上遇到一位軍官的時候，我一直以為我對於起義的了解是相當全貌的；這位軍官甚至在我尚未知道他的歷史以前，他的性格就給我很深的印象。當我聽說他就是奇尼亞夫斯基上校——以前是少校，曾經領導過那危險的渡河——的時候，我馬上把我在拉金停留兩天的計劃改爲一個長時間的訪問。他的經歷是和起義最有關係的，因為他曾在老城戰鬥了四個星期，並且後來指揮過華沙北部佐利伯茲的人民軍。

當八月一日波蘭將軍發動華沙起義的時候，波蘭的一般軍事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

德國人已經從波蘭東部三分之一的土地撤退了，那些地方沒有自然防線，經過華沙的許多街道，他們正向西流去，因此在德國的平民中造成動蕩，而在波蘭人中間引起希望。「得上充滿了逃跑的德國人，」那個做了母親的華沙女人說。「坦克頂上帶着鵝和鵝，牛被趕着和德國軍隊一起走，很難相信這些可怕的征服者會這樣紊亂。紅軍是這樣迅速地進入那些我們以為是城東郊的

小城鎮。我們準備隨時隨時不經過嚴關就可以自由了。」這就是波爾將軍加以利用的市民的期待心理。

軍人們則知道別的事實。他們知道德國人把他們主要的防線擺在維斯杜拉河線上——這是德尼伯河與柏林之間的最寬的一條河。關於這些德國人的工事，斯比卡爾斯基將軍告訴了我一個工程師的看法。由於他過去做過華沙城市設計者，這些工事在他心中很清楚。

「華沙普刺格被設防成爲德國防線中最堅固的一點。在華沙的南面，工事は沿着維斯杜拉河設的。在北邊，工事轉向東面到東普魯士，穿過那些沿着納山河的難行的沼澤地。『華沙屏障』包括兩層工事地帶，在普刺格的東面作半圓形。外面的一層經過一連串的城鎮延至六十哩之遠。所有這些工事都是強有力的堡壘。裏面的一環則圍繞著普刺格本身。在這兩環中間還有無數的中間防線。整個地區是一片鋼骨水泥的砲壘，廣大的地雷陣地，鐵絲網和反坦克工事。敵人是既不容惜水泥，更不惜鋼鐵。我們的軍隊從蘇聯邊界起一直到維斯杜拉河止所遇見的一切防線，和華沙郊外的工事比較起來，簡直都是些小兒玩意。」

要佔領這樣堅固工事中心，通常的戰術是包抄而不是正面進攻。紅軍計劃從南北兩面用廣大

的兩翼包抄來取得華沙。「紅軍的這個計劃同時也是爲了要想挽救波蘭的首都，以及其建築物和居民們。」季米爾斯基將軍說。「全部力量都集中在華沙正面的波蘭第一軍的統率部也知道這個計劃。」

這樣的一個計劃需要相當的準備工作。紅軍長期不斷的進攻已經在兩面進展了兩百六十哩，在北面進展了三百四十哩。已經是快到最後階段的時候了。被德國人炸毀了的鐵路和橋樑必得修復起來，以便運送物品。卡車正從三百哩外的供應基地把砲彈和汽油運上來，車子消耗的汽油比它本身所能載的還要多。

「我們的進攻力量是拿出來了，」金·文地說道，做爲一個波蘭軍官，他曾聽過在那些星期中的激烈的討論。「歷史上還有那一支和這數量相當的軍隊會做過這樣龐大的進攻？一切有關軍隊、人員以及裝備的事情都必須停下來喘一口氣呢，假如華沙是沒有設防的，我們也許不要喘息就能把它拿下來，但是正當我們攻取那些殺人的堡壘時，德國人把他們的一些新坦克調了上來。這些調給我們的損失可不小！」

「在中央維斯杜拉河上面有八座橋，」斯比卡爾斯基解釋道。「四座在華沙，三座在城的南邊，一座在北面的莫德林。所有從東波蘭撤退的德國人都經過華沙的橋擁向西去。這使得華沙的

人民誇大了德爾的潛敵。他們沒有看見德國在北邊的預備部隊，經過莫德林的橋，帶着四個新坦克師奔向紅軍的側翼。『紅軍，經過了長期的進攻並且由於過長的交通線，是被迫向後撤了。只有經過好幾個禮拜的艱苦和血腥的戰爭，它才攻入普刺格。』假如不是爲了我們要把一切可能的援助送到華沙去的願望，我們這時應該延遲普刺格的佔領，而等待以後，以便更容易地並且以更少的損失來佔領它，』季米爾斯基將軍說。

當紅軍正在華沙附近作戰的時候，華沙裏面事情又究竟是怎樣的呢？在城裏，關於起義究竟應該在何時發動有着不同的意見。

屬於「保安隊」——「一支併入波爾將軍內地軍的武裝力量」——的拉維茲上校，作爲在起義時關上和波爾不同意的「數百波蘭軍官」的代表，曾離開華沙，並且要去告訴當時在莫斯科的首相米柯拉茲克來延期這個起義。他談到在軍官圈子中的討論。有的主張起義應該在紅軍到達三十哩以內的時候發動，有的主張應該在紅軍全線到達維斯杜拉河的時候發動，還有一些主張應該在紅軍已然取得維斯杜拉河西面，華沙北面和南面的橋頭陣地時發動。所有這些軍官都假定起義將會與紅軍的統率部，以及在華沙內都各種不同的波蘭游擊軍隊取得協議。波爾之未能與這些可

能的同盟者任何之一取得涼緒，是使得保安隊跑到季米爾斯基的波蘭新軍裏而來的原因。

波爾將軍，倫敦流亡政府的代表和他們的內地軍的首領，負了決定起義的時間和方式的全責。事前，紅軍和在華沙的其他游擊隊誰也沒有得到通知，德國人顯然在空氣中聞出一點東西來，因為他們加強了他們在維斯杜拉河幾個橋上的守衛，並且在起義的前幾個鐘頭開始在橋下埋炸藥。幾個月以後在盧布林，人們仍然在討論着，爲什麼波爾要在這個「自取滅亡的時節」來號召這次起義，有些人歸之於「自倫敦來的命令」，有些人歸之於「使波蘭在一九三九年失敗了的同樣陳腐的軍事策略」；還有些人懷疑在波爾的參謀中間存在着一些敵人的特務，這些特務可能不直接決定起義的計劃，但能够影響這些計劃。

有些「自倫敦來的命令」這一事實，簡直沒有可以懷疑的餘地，起義和米柯拉茲克第一次的訪問莫斯科相配合，訪問的時間當然是由他自己決定的。從他在那裏的討論中間，就存在着許多證據。甚至對於我們這些新聞記者們，他就表現出對盧布林的缺乏興趣，以及他不久就會到華沙去的希望。斯比卡爾斯基——他參加了那些莫斯科的會談——告訴我，流亡政府的首相——正在規避着盧布林的波蘭人，並且正在要求紅軍直接把他帶到華沙去。當他知道華沙將用包抄來佔領——攻佔到敵人的工事和反攻，包抄將會需要相當的時間——的時候，他的臉色變白了，並且顯

然很激動。那時，我們已經清楚他要求和內地軍一起被送到華沙去，以便他可以完全越過盧布林
的委員會。」

起義在八月一日的下午開始。對於起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消息。

「城市中心發生了一聲巨大的爆炸，在德國指揮部裏的一個炸彈是起義的信號。這是一
工程師給我的描述。對於一個華沙的母親，起義開始是「一聲空襲警報」。弗伯特——高拉區的
一個強壯的女游擊隊員——只知道「街上射擊開始了」。

查尼亞夫斯其少校——正在華沙指揮着人民軍的一個地下支隊——並沒有注意那最初的幾
槍。「槍聲是很平常的，」他告訴我，他在下午四點鐘做完了工，並且回到家裏去吃飯。他和人
民軍的人員們誰也不知道波蘭的計劃。「一個朋友來找我，並且告訴我起義了。我馬上開始進行
我的職務，但是由於猛烈的德國砲火，我甚至連街道都過不去。經過幾度無效的努力，我們進到
地下室裏去，然後打穿牆壁進入隔壁的房子，整整四十八小時之久我們一直在挖着牆，並且從一
所房子衝到另外一所房子，以便到達我們集合的地點。到了那裏什麼人也沒有找到，我們繼續往
老城去——離河不遠叫「斯達麥恩塔的老市場」——一路把人帶上。」

弗伯特也從城的西部設法到老城去。「當射擊開始的時候，我的父親和母親正在窩拉南兩哩遠的歐軍塔。我沒有法子到他們那裏去，於是我設法到我的支隊那裏去，整整三天我在街上鑽來鑽去並且爬近房屋。那時已經有許多屍首了。終於我到了老城，拿到一個紅白顏色的臂章，於是變成一個士兵。最初熱情是很高的，內地軍的一些公報宣佈紅軍正在渡過維斯杜拉河，並且已經在華沙作戰了。但是十天的功夫德國人就將歐軍塔燒了，把窩拉炸得無聲無息，於是從四面八方來到老城。」

一個小康的華沙女人跟濟維的丈夫去和她的父母一起喝茶，她父母住的那所大公寓相距大約有十分鐘的路，她把兩歲的孩子留給家裏的奶媽了。「我們正喝茶的時候一警報一響了，我們從六層樓上跑下來，並且看見大約三十個年青的男子和男孩子，都帶着臂章和手槍，並且還有一隻衝鋒槍。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來的，也許他們正在設法要到橋那裏去，但是德國人已經把房子包圍了起來，並且正從坦克上朝着房子射擊。」

「我們在那所房子裏呆了三天。裏面有五百人，大多數是婦女和小孩子，因為男人們還沒有下工回家，只有那三十戰士，幾乎沒有什麼子彈，最高興能看見有人把德國人擊退，但是事情還是可怕的，因為非常明顯他們不能成功，在第三天上午結尾來了，子彈沒有了，並且德國的飛機正

在屋頂上扔炸彈，德國人在四面牆腳下埋上炸藥，準備把我們全都炸死。有人掛起一面白旗。一個女人跑了出去，並且帶回來投降的條件，男人們必須出來站在一邊，婦女和小孩子站在另一邊。他們說男人將被槍斃。

「我們全在雨中走了出來，忘記了拿大衣和皮包。我們只想着我們最親的人正被搶走。當那些年青的戰士們臉朝下躺在途道上的時候，真令人痛心，有一個不過是一個不到十四歲的男孩子，他滿可以藏起他的臂章和手槍，並且沒有人會拿他當做一個戰士的。他是首先躺下就死的一個，他們全被槍斃了，但是我想是他們對於死亡的英勇的接受挽救了我們其餘的人。德國人得到了他們的獵物，他們沒有殺死我們非戰鬥的男人們，想起這些孩子們的母親將永遠不會知道他們的英勇，令我痛心，所有他們的身份證件都是假的。」

整個華沙有一百萬人以突然而無辜地跌入這個地獄，開頭的幾天內，城內許多地方都有零星戰鬥；商業區，葛拉，歐車塔和莫斯科多夫等西部地區，以及塞河邊的三個地區——北邊的佐利伯茲，位於中心的老城和南邊的捷恩雅可夫。從一開頭德國人就將這些地區彼此孤立了起來，到第三天他們把坦克，飛機，步兵聯合起來，有系統地對華沙加以破壞。他們封鎖了城市，停止了食糧的發放。他們切斷了總水道，並且朝著那在少數井邊等待着的行列開槍，他們把滿天的方場和

通衢擺在多筒白砲和攻城砲的火力下面，轟炸機低空盤旋，一面扔下燒夷彈和破壞彈，把整個首都投入烽火中間，一所一所的房子連同居民一起被炸掉。

我們那個做了母親的華沙人——從她父母住的公寓裏被趕出來的——差不多費了一個月的功夫企圖去找她的孩子，孩子距離她只有十分鐘的路，她從一個地下室逃到另一個地下室，每一個避難的地方都一個跟著一個被砲火所擊中，裏面的人不是被殺死就是被趕走。她老是「在死亡的邊緣上跳舞」，好幾次她看見她住的那個公寓，但是去不了。

他們把我們趕過一道火牆來到國家博物院。華沙最漂亮的房子都在「五三」街上燃燒着！一隊烏克圖的黑衫黨叫我們靠着一面牆站着，一面說現在是槍斃女人的時候了，過了可怕的十五分鐘之後，我們才知道這只不過是他們開的一個小玩笑，我們有四千人在博物院的地下室中被關了四天，沒有食物、飲水或衛生設備——想一想幾個鐘頭以後那水泥地成了什麼樣吧！我們都是「人質」，德國人宣佈除非起義停止我們將全體被殺。當我活着出來的時候，我也相信奇蹟了！

「在一個地下室我呆了三個星期，上面的幾層全都燒掉了。我們全在饑餓中，頭一個星期中，有七個企圖在院子裏找點植物的人都被打死了，有一個六歲的男孩子在那個花園中被打

中，最初他受了傷，於是仰臥在那裏呻吟。每次他移動的時候，德國人就朝他開一槍，我們眼看著他死去而不能到他那裏去。那個地下室中沒有人在作戰，我們只是在尋找食物。當德國人到達它週圍的時候，他們又放火焚燒我們的地下室，並且把人們趕過河送到普魯茲柯夫集中營去做奴隸，我們在夜間穿過者刺格，於是我設法逃了出來。」那以後的四個月，她一直沒有她的孩子的消息。

起初，每個人實際上都認為起義當然是已經和紅軍商量好了的，雖然知道他們自己是不能把德國人趕出去的，但暫時時刻都等待着援助，所以他們以極端的英勇來戰鬥。所有城裏武裝的游擊隊，不問其政治面貌如何，都馬上加入了戰鬥，儘管由於缺乏準備或通知而困難重重。據估計有二萬五千內地軍和七千五百人民軍都參加了，沒有武裝的平民也加入了。人民把電車拉翻，把鐵軌撬起，把傢具從房子裏扔出來，並且把新聞佈告牌敲掉來做障礙物。女孩子們用裝着汽油的瓶子來進攻德國坦克，小孩子們在房子與房子之間傳遞消息。慢慢地並且痛苦地才知道與紅軍並無計劃上的配合，他們和紅軍之間仍然隔有敵人在波蘭最堅固的工事。

缺乏計劃似乎在起義的一開頭就表現出來了，關於起義者是否曾經佔領了任何戰略要點的說

法也不一致。一位工程師告訴我，他們把電話交換台，發電廠，郵局和理工學院佔領了一個時期。高昂——人民軍裏的一個士官——惡恨地指責「波爾寧可佔領有政治價值的地方而不佔領有軍事價值的地方——例如市府大廳，和若干當地警察局——以便等紅軍來到的時候他就是政府。」德國人始終佔有着那些橋和華沙城堡。沒有證據說明內地軍曾企圖切斷華沙後而德國人用以增援的交通線，幾個月以後在羅茲，我聽說當地內地軍的指揮官曾想到去解救華沙——他們任務可能是去切斷交通線——前進了一段距離，於是又回去了。

把若干單獨小股的起義者孤立起來，德國人一股一股地加以消滅，三處地方守得最持久——商業區，包括內地軍的總部；老城，有歷史性的古代市場；和北面的佐利伯茲地區。我沒有來自商業區的報導，當波爾將軍投降的時候，那一區的戰士沒有一個逃到東邊來。幾個參加者給了我關於老城和佐利伯茲戰鬥的詳細描述。

在起義的第一個星期中，當查尼亞夫斯基少校到達老城的時候，他發現大約一共只有一千三百個有武器的人，包括內地軍，人民軍，波蘭社會黨戰鬥營的若干小單位，和青年戰鬥者同盟，他們佔據了一塊地方，大約每邊半哩見方，住着將近十五萬的非武裝人民。每條街都交叉着許多障礙物。房子一所跟着一所變成堡壘，德國人堅決地縮緊他們的包圍圈。把老城一座房子又一座

房子地減少下去，少校估計單在老城一個地方，至少就有五萬人死掉。

「那正是八月明朗的天氣，但是因為煙屑，白天你看不見天；因為火光，黑夜却像白天，德國的飛機就在屋頂上掃射轟炸。一座一座的大房子倒塌到街上和地下室裏去，把慘叫的人們壓在下面。當情況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內地軍裏比較年青一些的軍官開始談到和紅軍通消息的事。我們人民軍的老早就想這樣做了，但是只有內地軍有一架無線電。最後他們的指揮官同意發一份聯合的電報去求援。所有在老城戰鬥的組織都簽了字。我們把它交給內地軍的指揮官去發。第二天我知道電報沒有發給紅軍，却用密碼發給倫敦的波爾政府了。」

「有沒有任何英國的供應物資由飛機送給你們呢？」

「八月中旬，他們企圖來援助我們。五架飛機夜間在老城扔下槍支，手榴彈和反坦克武器，投擲的姿式是很使人興奮的，但數量是太少了。大約過了三天，他們又來了，這一回德國人給他們準備了毒狠的射擊，一架英國飛機在我們地區內的波德瓦拉街給打了下來，一個駕駛員死了，另一個受了傷，死在我們臨時接成的醫院裏。那一次大部份的東西落到德國人的手裏。一個月以後，大約有八十架空中堡壘在下午四點鐘來了，飛得很高，大約有一萬三到一萬四千呎的樣子。天空中佈滿了帶著降落傘的東西，但是太高了，大部份被颶風颳到德國人的手裏或是颶風過河去了。」

我是從佐利伯茲看到的，我們在老城被擊潰了！」

經過四個星期的戰鬥之後，老城在八月二十八路落了。弗伯特講了一些最後一天中的可怕的事情，那天「一座房子倒在車身上」，當四層樓都塌下來的時候，大約有四十個人正躲在地下室中。

「我被擊倒在地，一個少尉倒在我身上，但是木樁把他的頭壓到沙土裏去了，使他不能呼吸，他喊着『媽呀，媽呀』就死了。他躺在我身上好幾個鐘頭，但在他上面的木樁擋住了其餘的東西。我有一隻手還可以動一下來把糞穢沾到我臉上的沙石拂去，附近有一個人瘋了，並且喊道他有武器而且將要把我們兩個都殺死。我企圖告訴他不要這樣，但是那死去了的少尉壓得我不能說話。那個人沒有開槍因為他不能移到他的槍那裏去。十個鐘頭以後，我們的朋友把我們挖了出來，並且說我們馬上就得從下水道裏到佐利伯茲去。」

這時候起義者都已經變成華沙下水道的專家了，下水道是連絡與逃跑的唯一的方法。小的管子直徑不到一碼，在那裏人們必須一個拉着一個地去爬，有些「特號水管」竟有七呎高，一個人可以立着在裏邊走。裏面主要的困難是黑暗，圓而滑的底，以及水流本身，其快慢和深淺是時常變化的。有時水深至膝，有時至胸，有時水的速度足以把一個人在暗中衝倒，也有迷失在那

鑄鐵地下水管裏面的危險。一個從萊沙經過一條主要下水道逃到維斯杜拉河的人告訴我說，正在水管傾斜到河裏去的地方，水管快擦差到頂了。知道出口就在不遠，他鑽入污泥衝下河去。

德國人很快就知道了波蘭人正在利用著那些下水道。他們聽見修理洞口下面有人經過，於是他們就扔下手榴彈或毒氣彈，究竟有多少人死在那些下水道裏面，這件事將永遠也不會知道，幸沙解放以後，下水道中屍體的堆積影響了萊沙的重建工作，城南一個大管子中塞有一千餘死屍，他們都是在企圖逃跑時被德國人所毒死的。

查尼亞夫斯基給了我一次關於白老城到佐利伯茲下水道「較的乾燥的軍事指述。」到我們的目的地大約有兩哩路。第一根管子是中型的，直徑大約有四呎多。我們得彎下腰來走，並且機東西一直對我們的下顎。我們全帶著手槍並且想假如管子裏的情形更壞下去，我們就自殺，我們很快就來到一根大一些的管子，那裏行走比較容易些了，當我們經過但澤鐵路車站德國崗哨底下的時候，我們得特別小心。那裏有一個修理洞，德國人可以聽見水的激濺聲而扔下手榴彈來。我們分成小組來走，以便水濺的聲音可以減小。」

弗伯特不願意進入下水道。「因為在房子下面，我感覺昏迷，此外，我以前也曾試過那條下水道。我們有十二個人已經走進去了，但只有六個過了那修理洞。德國人扔下手榴彈，因此我不

得不在裏邊等了一整夜，水裏的屍首衝擊着我，直到我們能夠通知我們在老城的朋友來把我們拉出來。我不願意再走了，但是我的朋友把我拉了去。

「我們是最後離開老城的一個支隊。我們大約有一百五十人。我排在第五個。最初我們彼此牽着，因為有許多支線，我們可能迷失在這裏面。在修理洞的地方我們分開來走，相距五六呎，儘量走得安靜而快。講話或是擦一根洋火都是禁止的。沒有人能知道別人發生什麼事情了。第一個人過了修理洞一段距離後停下來等着，直到別的人在黑暗中摸到他。在那圓而滑的底上很難行走。要不是有水流白話，你甚至會迷失了你的方向。我無事地過去了，因為那時水裏的聲音還不大。大約在三十幾人過去之後，德國人聽到了，並且扔下手榴彈，這一下子把我們分成兩部，其他的人向後轉到商業區去了。那個方向是很困難的，因為管子還不到三呎高，並且他們還得拉着病人走，因為他們帶着我們的醫院。」

「過了修理洞之後，許多支管注進水來，因此水面很高而且水流很強。水高到我的胸，並且到達一些矮人的頸子，把他們衝倒。這裏我們又拉起手來彼此協助。在佐利伯茲，我們自己的人正站在一個修理洞口放下繩子把我們吊出去。」

按照查尼爾夫斯基的說法，佐利伯茲——在那裏做了最後的堅持——在九月初大約有兩千內

地軍和一小部份人民軍。「當然到處都有成千成萬的非武裝平民，所以我吸收他們進來並且訓練他們。不久我就指揮了五百人民軍的人。我們和內地軍的人並肩作戰。良好的感情在這保衛共同戰線的兩支軍隊的士兵和青年軍官之間生長了起來。不過內地軍的高級軍官則對我們仍然是冷淡的。」

「內地軍每天夜裏都等着英國的援助。根世倫敦波蘭人從無線電中發來的命令，他們在威爾遜方場上擺上信號；一夜又一夜的他們徒勞地點起他們的火光。他們的無線電人常常找我來說：「怎麼回事呢？他們已經說了好幾次他們要來的，但是他們還沒有來。」

「最初，內地軍反對任何與對河紅軍接頭的建議。最後，他們在佐利伯茲的指揮官基維西爾申校，同意我們應該派出兩個送信的人，一方面派一個。內地軍因為人多一些並且離河近一些，所以負責協助渡河的技術問題。他們帶着兩個送信的人各自河跑了一整夜。早晨又把他們帶回來，說是不可能把他們送過德國的防線。我決定單獨行動。我劃出一條穿過下水道的迂迴的路，並且告訴人民軍的兩個女孩子：「假如你們能在四天之內找到紅軍，我們還可以救。」她們九月十日出發了。兩天之內我們就得了紅軍的回信。」

紅軍回信的戲劇性甚至在這個老戰士的心裏也燃燒起熱情來。

「九月十二日剛剛吃過午飯之後不久，一架飛機來了，低飛了兩圈，並且扔下三個降落傘，帶着極喜好了的信：——」

向華沙起義的英雄戰士們致敬！你們送信的人到達了。我們現在知道了你們的位置。今晚在麗利維拉方場上擺上三堆火做成一個三角形。如果你們有電，你們可以用雷燈來代替。假如這一點已經清楚而且同意的話，請在下午六時擺上一個信號，用四個被單縫起來並且擺在一個屋頂上。

「我們在第四區的一間房子上擺上我們的信號。六點鐘，一架紅軍飛機飛來了，在我們的信號上盤旋了幾圈，然後回去了。」

「九點鐘天剛一黑下來的時候，送東西的飛機就開始來了。有兩百多架那種小「鴨子」——速度不快的雙翼U—2式機——掠過屋頂，連降落傘都不用就把東西直接扔到我們的手中，然後回去運更多的東西來。他們一直繼續到天明。有些飛得如此之低，以致飛機師可以向我們呼喊。有一個喊道「好的很，小伙子們。」（俄語）另外一個說「明天再見。」第一夜他們扔的大半是食

物。我們雖然正在饑餓中，但是我們抱怨道：「爲什麼他們不送軍火來呢？」第二夜他們扔下衝鋒槍，反坦克武器，手拉白砲，和大量的物資。德國人繼續不斷地砲擊方場，並且把我們許多正在險東西的人打死，但是紅軍的援助仍然繼續著。十夜之間他們扔下一千多支衝鋒槍，三百門反坦克砲，二百五十門手拉白砲，和必需的彈藥。

「兩個羅柯索夫斯基部的無線電人員也降落下來，以便取得通訊連絡。另外兩個波蘭第一軍的人則設法渡河過來。他們和內地軍的人員住在一起，並且把我們的需要電告紅軍。我們得到了我們所要求的砲火支持。紅軍的飛機也遮清了天上的德國飛機。波蘭第一軍的一個營甚至渡河過來幫助我們。他們在境外邊馬瑞蒙附近佔了一窄條地方。我在第三天才知道這件事，因爲內地軍是在佐利伯拉河的那一邊，並且在他們前面還有一道德國防線。我馬上催促內地軍的指揮官去合波蘭第一軍連絡。他回答說羅柯索夫斯基來電叫不要動。我不相信他，但是我也不能去問一個無線電員，他把無線電員簡直看得和囚犯差不多。兩天之後，從馬瑞蒙的一個高的觀測所上，我看見德國人把砲火轉向波蘭第一軍所佔領的那一窄條地方，並且把他們整個消滅了。」

擊潰了波蘭第一軍的那一營以後，德國人從四面八方朝着佐利伯拉的起義者來了。他們用大砲，坦克和步兵從北面，西面和南面進攻，把抵抗他們的人趕到東面德國人在河前的機關槍陣地

上去。「二十八那天我們打了一整天，並且差不多損失了一半的人。我們在北面和西面堅持着，但德國人却自南而衝進來，衝過米克維茲街把我們切成兩段。我們甚至再沒有地方給紅軍的飛機避信號了。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已經到了盡頭了。」

那天晚上兩個指揮官會面了。內地軍的基維西爾建議「一間房子一間房子地打到最後」。查尼亞夫斯基反對這種無用的自殺，一面說道：「我們不必犧牲到最後一個人。我們可以過河到波蘭第一軍那裏去。」內地軍的年青一些的軍官都支持他。向紅軍要求援助時，紅軍的回覆告訴了用砲火和渡船援助的詳細計劃。

在這輪戰的最後一幕的急速演出中，兩個指揮官的彼此衝突的目的變得尖銳而明顯了。按照查尼亞夫斯基，渡河時間規定在九月三十日的早晨九點二十分。「在十點半的時候我問基維西爾爲什麼還不開始。他回答說強大的風使不能缺少的煙幕放不成了，所以渡河延遲至下午八點。七點鐘，內地軍本部的瓦赤諾夫斯基上校在佐利伯茲出現了，帶來一道投降的命令。人民軍的奇昂上士問他怎麼來的。上校先說他是開車來的，但隨後又止住了，並且說他是從下水道裏來的。但是他看起來完全嶄新。和我們稍談之後他朝着德國陣地的方向走去了，並且很快就回來了。很明顯他已經去和德國人商量過了。」

「基維西爾召集了所有的指揮官，並且宣讀投降的命令。所有年資一些軍官都抗議了。有些甚至哭起來，一面說：『我們已經和波蘭第一軍商量好了，讓我們走吧。』對於這一點，基維西爾回答說德國人已經破獲了我們的密碼，並且已經設下這樣堅強的障礙——坦克、鐵絲網，地雷、機關槍——甚至連一隻老鼠都過不去，不要說人了。」這一下說服了他們。甚至我也相信了他——以為也許沒有一個人能夠過的去。但是不管怎樣，我們人民軍的命運是註定了的，因為內地軍的投降條件只給他們自己的人取得戰俘的地位，剩下我們沒有保障而可以被殺掉。每條路都有死的可能。所以我對於我的人也沒有施以壓力，我只告訴他們我自己要設法向河。四十八個人決定跟我走。

「紅軍的砲擊在八點開始了。基維西爾急快地跑到我這裏來並且說：『假我無線電員以便與普刺格去電停止這砲擊。』於是我高興極了，因為現在我知道了德國人還沒有破獲我們的密碼，否則的話，他們不會需要我們的無線電員。那麼我們還有一個機會。我告訴他：『告訴你們的德國朋友去發這個電報吧！』我們走過地加森斯基街到河邊去。

「紅軍的砲兵砲擊了位於我們與維斯杜拉河之間的德國陣地整整一個鐘頭。然後砲火分開了，造成一條走廊，於是我們就走過去。只有兩挺敵人的機關槍還沒有停下來，他們從一百呎遠的

地方朝着我們開槍；在我們把他們的射擊停止以前，他們射倒了我們二十個人。他們傷了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他一直跟着我們的部隊；他抓住我的手哭道：「爸爸，不要扔下我！」我幫他走到河邊。他現在在我們的波蘭軍隊裏了。

「我們在預定的時間之前到達河邊。船不在那裏。我們找到一個漏的獨木舟，並且把一個女孩子放進去，拿着我們的東西；於是我們有四個人游水推船過去。在那邊我們碰見帶着船的上兵。我告訴他們到那裏去，一個鐘頭之內，他們把每個人都渡過來了。四十八個人跟着我離開佐利伯茲，只有二十八個過來了。但是同樣犧牲那二十個人，我們可以把我們計劃中的整個三千人——一千五百戰士和一千五百平民——都帶過來。」

弗伯特是那四個游過河去的其中的一個。她補充了一些細節，說她到達對岸的時候，一點也不疲倦，只不過襯衫濕了而已。「因為使她沒有睡意，他們一面帶着襯衫從一個參謀部到另外一個參謀部地跑了一整夜——」僅僅裹在一件大的軍衣裏，一面讓襯衣去乾，但是他們到處都給我東西，直到我有了一整套的制服——來講述起義和它的命運。

大約在十個星期以後在普刺格，科爾茲克將軍給我總結了關於那天晚上，波蘭第一軍對於命運的敘述所表現的熱情和深切的興趣。好幾個星期之久，他們企圖協助他的波蘭同胞渡過河來。

他聲稱他們主要是爲波爾將軍的隔離所阻礙。「從起頭到尾，他避免和我們連絡。」

由於絲蒂方尼的建議，我去找科爾茲克將軍，去聽取關於波蘭第一軍幫助對河波蘭人的種種努力的敘述。沒有路標指示他的總部。那地方離前線陣地只有一哩左右的樣子。由於斯比卡爾斯基來的電話，我才找到那個地方，他在電話裏告訴我走那條泥濘的路，有一個波蘭軍官正在等候着，最後就到了一堆荒廢的小茅房子。房子裏面在一間佈置得很整齊並且很舒服的官長辦公室中，坐着一個堅實的人，帶着一條曲折的線和兩顆星，佩着滿胸的勳章。他是一路跟着波蘭第一軍來的，並且正在準備着那最後的進攻，以便解放華沙並且把波爾茲維茲影在柏林。

「當華沙起義爆發的時候，我們正在華沙南四十五哩的地方，並且在對岸，中間隔着德國的工事。波爾將軍前事後都沒有做過任何通知我們的打算。當我們攻入普利格的時候，我們所能自若干觀察所得到的，只是知道對岸少數分散開的小據點中有戰鬥。我們說不上那裏是德國人，那裏是波蘭人。只有當那兩個從查尼寇夫斯基來的女孩子跑到我們這裏來的時候，我們才知道她們的位置。她們不但告訴了我們關於佐利伯茲，並且還告訴了我們關於中心商業區，後者可以通過下水道和佐利伯茲連絡。馬上我們把物資扔到這兩個地方去，並且把通訊人員帶着全套的無

線電設備扔到佐利伯茲去。他們受命去和所有的起義者連絡，不論是內地軍也好，或是人民軍也好，並且把他們的需要拍發出來。

「要求打過來的時候，我們就照着辦。他們說：『送砲過來』，我們就送過去。他們說：『再送，或多送一點到左邊去，』我們就滿足了他們的希望。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們他們的計劃，或甚至是誰在發出這些指示。他們希望把命令給紅軍而不告訴我們是誰發的命令。在德國人宣佈波爾做了他們的俘虜以前，我們甚至不知道波爾他自己是否在華沙。」

「你們怎麼能知道要求是從波蘭人來的，而不是從德國人來的呢？」

「那容易的很。我們的無線電人員和佐利伯茲的波爾的軍官們在一起。他們自城中心發出要求來。他們從來沒有講出他們指揮官的名字或是他們的打算。」

「我們做了許多嘗試，要去過河幫助那些起義者。從一個軍事的觀點來看，這些嘗試都是愚蠢的；情況是壞得令人難以相信。但是我們不能讓波蘭人單獨去和德國人作戰。不管情況之壞，假如我們能取得協同動作，我們也許可能使起義者佔領一些地方。所有這些嘗試都失敗了，因為波爾的人避免連絡。」

我問具體的例子。他舉了一些。「我們在捷恩雅可夫登了一次陸。在那裏我們找到大約一百

五十個內地軍的人，由一個叫拉多斯拉夫的上校領導着。他們在饑餓中，並且沒有彈藥。我們供給了他們所要的東西。兩天以後，沒有告訴我們，上校在夜間從下水道中把他們的人撤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他之撤走其軍事結果並不嚴重，但這表明了他的態度。在中央地區，某些我們的部隊真正突破包圍而攻入商業區。以後我們就再也聽不到他們的消息了。有好幾次我們企圖攻入起義者所佔領的地區去。他們從來也不設法朝着我們打出來。他們好像時常是在撤走，但是最明顯的例子是我剛才舉的那個。

「在華沙，這是多麼大的一種生命的浪費呀！」將軍結束道。「千槍來對抗坦克，本來可以與我們一起來打德國人的年青的男孩子們，英雄地供獻出他們的生命，並且被扔在一邊了。並且一個一百多萬人口的城市支離破碎了。」

「這就是我所謂的高度的賣國，」一個在臨河陣地的年青波蘭軍官這樣斷言道。「那就是發動一次起義而不與其同盟者配合，把一百萬沒有自衛能力的平民投了進去，毀壞了波蘭的首都，把本來可以到達對河波蘭軍隊的人員和物資投降了敵人，並且投降的條件是給人民軍的人——忠實和內地軍並肩作戰的人——註定了死命。」

我們望過維斯杜拉河，那邊濃煙仍然籠罩着全城，這個城，德國人以起義為口實，已經進行

了三個月的有系統的破壞了。他加上道：「並且爲了這一切，倫敦的波蘭人讓波爾做他們的總司令！」我不能希望重現他說這句話時的那種極端的鄙視。

第八章 土地改革

「川萬達·拿若多瓦——波蘭國會——」的名義，並且遵照拉金縣農民委員會的決議，我獻給你這張地契。」

在一間窗戶被炸彈震壞了的大廳裏，分散的掌聲從一千多個隨便地穿着羊皮外套披右厚圍巾的農民男女中響了起來，有些面孔是興奮的，有些是帶着希望的，有些在微笑，但是大多數卻像是在教堂裏那麼嚴肅。他們的眼睛都注視在那個高高的人身上，他穿着冬季棉衣，自台上的一叢波蘭國旗中傾身向前，伸手拿着一張方形的白紙，一個穿着羊皮外套，矮胖的中年農民，從觀眾中擠上前去接受它。

農業部副部長比尼克投與這張地契的樣子，綜合了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的單純，和一個縣法官的沉着。從某種深刻的嚴肅觀點來看，顯然他覺得他自己是一個歷史的推動者。假如他那粗糙的手的姿勢也同時暗示着聖高老人，這也許是因為他背後的佈景的關係，佈景的幕上畫着在黃

昏中一堆冬青樹中間的一間蓋了雪的大茅舍，這是在拉金爲了慶祝聖誕節和土地改革的唯一的舞臺佈置。

這是好幾個月以來集中了波蘭農村注意力的那齣偉大戲劇的最後一幕。民族解放委員會認爲土地改革是它最光輝的成就。它的發言人每一次會裏都一再地申述，說他們終於正在完成那以前的若干政府二十五年來曾經允許而未能實現的土地改革，一九一九年曾經通過了一項性質溫和的土地改革法。它的實施被控制波蘭政府的地主紳士所阻止了，戰爭中間，委員會正在實施一條更激烈的法律。

它被稱爲「土地改革」。它同樣也可以叫作農民革命。但是它沒有像西歐各次農民革命中的私刑拷打地主，焚燒地主團莊等事情。在波蘭，這次改變實際上是不流血的，按照政府法令來實行。雖然如此，它還是革命，它無抵償的充公財產，推翻了自從中世紀以來就統制着波蘭政治的封建階級。

我自己第一次看見東歐封建下面土地的情形是在一九二一年。我代表了美國友人服務社去訪問那時屬於東波蘭的一個村莊。在半饑餓中的癯瘦的農民，住在一些沒有地板的小茅房子裏，位於一塊沿澤地的邊上。實際上每個居民都有着瘧疾。友人社運來大量的奎寧。但很清楚，除非清

除那塊沼澤地或者遷移農民，別的法都是白費事。

在這村莊的後面，有肥沃的長滿樹木的山坡——這就是地主的論千畝的產業。它的主人住在巴黎，冬季和他的朋友們來這裏打幾個禮拜的獵。沒有法子能使農民移到這塊肥沃的土地上去，假使他們僅僅爲了採一點菓子或菌類而走進樹林的話，看森林的人就放狗出來咬他們。

一個頭髮零亂，面孔晒黑了的青年——他到盧布林來參加關於土地改革的短期訓練班——描繪了在他家鄉南開特附近的一個大田莊的情形，在那裏「格拉夫·波多斯基就前曾招待過戈林。」

「在蘭開特本地却只有一些小房子，」這個年青的柯瓦爾茲克說，「但是走出去一點就有一條好的公路，引到波多斯基的宮殿，有三十七間房子在一個大園子裏，並且一切僅僅只爲了一個人。這個波多斯基有七處大田莊，幾乎包括蘭開特周圍所有的土地。當他們知道紅軍快來了的時候，德國人派了八輛卡車來協助波多斯基運走他的精美的地毯，圖書，和古代的傢具。德國兵們從他們的宮殿裏把這些東西搬了兩天，於是來了一輛小汽車把波多斯基自己運走。」

「人民甦了起來，恐怕德國人把他們趕到西邊去。德國人走了以後我們才出來，並且給紅軍做了一個既利的牌坊。我們建立了我們的會議，並且開辦了一所高級學校。一種和平的生活開始

了。起初農民們不敢去佔波多斯基的土地。波多斯基派了一個送信的人，通過德國防線來到他的代理人那裏恐嚇我們；但是工人們從斯台勃瓦窩拉鋼鐵廠來了，並且開了一個大會，於是第二天我們就帶着測量者開始去分地，後來我們在那大宮殿裏開了慶祝會。現在它是波蘭人民的博物館了。

每個人都知道，封建土地關係的改變是必須的。在波蘭，這個改變同時還有一種國際的理由。二十五年以來，波蘭和蘇聯之間的邊界的爭辯，一直由於封建的土地權而複雜化。在凡爾賽條約的討論中，在英國卡遜爵士之下的一個委員會，根據人種學的基礎建議了一個邊界——從那以後就叫做卡遜線。線的東邊，大部份的人口是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但是封建的土地却是波蘭人，一九二〇年，地主們挑撥起對蘇的戰爭，並且用武力取得凡爾賽委員會未劃歸給他們的地區。一九四四年他們仍在煽動着邊界的糾紛。所以要建立一個不但是民主的，而且還是一個可以和蘇聯和平共處的波蘭，第一步就是摧毀他們的封建勢力。

根據土地改革的負責人們說，戰前波蘭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屬於地主的。大家族當然比較少，但他們却是數量更多的地主紳士的政治上的領袖，這些紳士的比較小的土地，也取得類似——也許比較小——的封建地位。按照法律，一百二十五畝以上的土地都被認為是貴族的

莊」，應該被分配的。在波蘭的情形下，一塊那樣大的土地通平是由許多家墾墾相傳的佃農來耕種的。

「土地改革的目的，」有一次當我抓住他說十分鐘的時候，他說道，「是給每個農戶至少十二畝地。這對於你們美國人也許不算多，但是我們只有三分之一的農戶能有這麼多的地。我們要他們有足够的土地來養家，而且是一塊整的，並且經過合作社和政府信用借款可以得到機器與經過選擇的種子。當地的食物製造合作社工廠將在鄉間增加長年的工作。除此之外，任何生活情況的改善都有賴於波蘭工業的發展。」

土地分配是在三重的控制下實施的：政府指派的縣負責人，各村所選的農民委員會，和工人工作隊，他們自願地自城市中來協助加速這項工作。

在一個十二月裏的清新的早晨裏，我坐着卡車到波查母基田莊去，大約離盧布林有三十哩路。

我們由一條橡條的公路到達該鎮中心，在那裏我們帶上鎮長，他帶着我們，走的路泥濘有車軸那麼深，車輪時常打滑得很厲害，引擎在喘氣，水箱也開了，我們才到達一大堆不整齊的房

子。並且停在一所龐大建築物的前面，這所房子會做過管理部人員的辦公室和住宅。從別的房子擁出來的人們說明那些房子是在這箇田莊上勞作的僱農們的住宅。

兩千畝地曾經屬於一個老人，他在戰爭中死去，丟下一個年青的寡婦。她不住在田莊上，而且也很少來。她住在盧布林，在那裏她有兩所公寓。地產的一半是森林，這一部份由政府拿去了。剩下的一千畝地要分給以前耕種它的五十七個僱農和鄰近村莊裏耕種土地的農民。

在樓上一間屋子裏的桌子上，圍着九個人。每個村子選了兩個人，田莊上的僱農選了兩個人。第九個是主席，是縣上土地負責人派來的。這些人組成一個委員會來分地。

我看見他們正在審查一個名冊，大約有兩百個聲請者。每一個聲請者部正在被詳細的討論着。這個委員會已經開了一個禮拜的會，並且看起來還要無定期的繼續下去。土地已經是測量過了，這件技術工作是比較容易的。最困難的工作是決定那些農民應該得到土地。

一個老頭子聲請了。他從前有二十畝地，他把地賣了並且把錢都喝光了，現在一點地也沒有。他是否再得一些地呢？當然不！但是他那無辜渴望土地的家庭怎麼辦呢？或者在波蘭軍隊裏的那個小兒子又怎麼辦呢？

一個有四個成年兒子的父親送來一個聲請。他只有一畝地，但是他一度曾有過二十五畝，不

過分給他的兒子們了。按照習慣，老人當他的兒子們結婚的時候要給他們土地；但是有三個兒子合在一起種著地，並且住在老人的家裏！他是否真的窮困不堪呢？

一個能幹的年青農民聲稱他只有三畝地，他的鄰居說這個年青人的妻帶來了一份嫁妝——在附近一個縣裏的十二畝地。

「你可以從她來的那個鎮裏去調查这件事情，」陪著我的那位鎮長說。

「我的上帝！」主席叫道，「我需幫忙！」

手續看起來複雜得難以置信。不是永遠不變的！十幾年之內這些家庭和土地將因出生，死亡和婚姻而改變。

「我現在將是一個自由人了，」一個中年的僱農帶著發亮的眼睛說。「整個我的一生都是為食物和工資而工作的。現在我將為我自己而工作了。」

儘管這些複雜的個人情況，由於一個星期的辯論，一個具體的名單是編出來了。斯坦尼恩拉夫，一個有五個孩子的僱農，得到八畝地，雅諾夫斯基，只有兩個依靠他的人，也得到八畝，因為他的兒子是軍隊中的一個志願兵。維爾尼斯基得到十二畝，因為他一家有八口，單子很長，但全都是暫時的。他們全被允許給得「更多一點，假如有足夠的土地的話。」

我發現遲遲不決的原因在於村民和佃戶上的僱農之間的矛盾。

「我們的父親和祖父都在這塊地上工作過，」僱農們說——他們顯然是從過去封建時代中活下來的人，而不是按照現代意義的僱農。「在任何土地分到別處去以前，我們先要我們每個人的十足的十二畝地。」村民們反駁道，這樣一來就根本沒有東西剩給同樣需要土地的農民了。

一個黑頭髮的猶太型面孔的人，不斷地屈身到主席那裏去。他穿著城市的服裝。他是盧布林來的一個機工，「工人工作隊」的負責人。他在委員會裏沒有表決權，沒有決定任何事情的法定權力；但是他在工會中的名譽要看他能「幹完」多少口莊而定。他正在那裏催促，爭辯。「照著這個速度，你們將永遠也搞不完。在盧布林省內，你們將是最末一個。」

他不時朝著我這個方向不安地看一眼。我顯然正在打聽著這個土地改革，因為每當我小聲問一個問題的時候，每個人都停下來回答。在這個鎮上第一次出現的美國人，甚至比土地改革還更引人注意。我預備道歉離開。於是那個不安的機工忽然變得友好起來了，思索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有一個新的念頭。

鎮長堅持請我在他鎮上吃飯。在兩支半哈洋蠟的燭光下，我們聚集在一個小咖啡店裏——電廠在德國人撤退時炸毀了。啤酒和別的酒瓶都打開了，女主人找到一些加糖的油煎雞蛋餅來滿足

我喜愛甜食的需要。客人中間有一個俄國人是鎮上的軍事指揮官。他打聽波查母基的土地改革進行得怎樣了，於是我就告訴他那爭論的情形。

「那些僱農抓得太緊了一些，」他闕切地說。「我很願意跟他們談一次——我是西伯利亞的一個農民——但是我並沒有干涉的意思。」

正當我們要回庫布林之前，那黑髮的機工眼裏帶着勝利的光輝進來了。使我大吃一驚的是每個人都開始向我道賀。「你的降臨分成功了。實際上現在已經分完了。僱農和農民達刊了一個妥協，他們說假如客人一踏自美國來看這土地改革，那我們一定要做得公平而友善。」

「你真聰明，」我對機工說，因為我回想起他那帶着思索的目光。

「不是，」他否認道。「是僱農們自己想到的。」我讓他這樣說。讓僱農認為是他們自己想到的比較好些。他甚至是一個比我所設想的還要聰明的政治家。

所有這些在波查母基的複雜工作，只不過是土地改革中的小小的一步。在這以前有一次財產的登記，並且至少還有一次大致的土地測量。這以後就是縣和省的土地部門對名單的審查。在整個過程中間，要開各種的聯合來組織互助社和合作社，以便處理那些不能分的財產，大的倉庫，

麵粉廠，田莊上的拖拉機。

在盧布林一條街上的省土地局裏，我去旁聽對於一長列控訴的審查，那是很不正式的，他們全都搶着說。在一小時之內，那秘書處理的人數頗爲驚人。

一個舉動遲緩，帶着褐色頭巾的女人向辦事的人物苦窮，並且解釋說她未能列入名單，因爲在整明的時候她正在另外一個村莊去拜訪她的妹妹去了。她是一個寡婦，她的兩個兒子都在德國做奴隸，她只有兩畝地。省土地負責人給了她一封信，要求村上再考慮她的情形。

一個樣子堅實的男人要求土地。他被拒絕了，因爲他是城裏的一個汽車司機，只不過想要一點額外的財產而已。現在假如他是村子裏的一個手藝人，他或許可以要請。不能像一個農民似的要求那麼多，但也許可以得到五畝地，在業餘來耕種。

一個縣土地負責人匆忙的跑了進來，要求一紙「有力的文件」來處理一個田莊的看管人。那個人嗜酒，並且正在把牲口賣掉胡花。「我們有一個好而妥當的游擊隊員可以做這個事情。」

「但這是一件縣裏的事情呀。爲什麼把它提到我們這裏來？」

「他們不承認我們的命令。我們需要更高級的命令。」省負責人哼了一下，於是在縣負責人的文件上簽了字。

從塞得利斯來了一個六個人的代表團。他們已經把土地分完了，但是那裏土地太少了。每家還不超過七畝。土質又不好，土地又這樣少！

「那麼我怎麼辦呢？創造更多的土地？……假如我們現在能得到波莫任尼羅……」

有些省份專門爲土地改革發行了特別的報紙。赫斯左夫省的「土地改革公報」特別編得好。技術指導配合着農民的來信和政治的闡明。「怎樣分土地」用簡單的言語解釋出來。農民們一定得先和縣代表接頭。他們應該組織他們的委員會，「包括七個到十一個公民，誠實而且知道土地情況的……用民主方式選出來，並且一面報告村裏。」

「給委員會的指示」也是同樣的簡單而明瞭。他們一定要登記地產並且防止搶劫。丈量應該由一個測量員來做，假如沒有測量員，則由熟悉這件工作的農民或雇農來做。分配不但要公平而準確，並且還要照顧到地的好壞和道路的位置。評議者的兒子如果不在軍隊裏，應該把他們送到最近的徵兵站上去。「誰不願意爲波蘭的土地而作戰，誰就沒有權利。」指示最後說：「當全村認爲劃分是公平的時候，分地應該馬上進行。」

這個小的公報已經給財產提出一種新的意義。昨天土地和牲口還是屬於地主的，今天，即使

他不過偷著把一隻小雞拿給他的朋友，他也可能被公報宣佈成爲一個賊。「地主們正在浪費着農民的財產！警察當然要加以調查！斯勞西尼田莊的女地主把牲口給了她的底下人……地主古敏斯基正在把牲口帶走……查勒蘇的女地主已經送走了十三頭牛……農民們！你們不能找到那些牲口嗎？」

到盧布林的許多農民大會裏去，並且在休息中間和代表們談一談，就不難得到一幅各地區土地改革的圖畫。有些會議是縣的，有些是省的，有些是全國的。有些人來組織合作社，另外一些人來討論大倉庫和麵粉廠的所有權形式。一個從羅薩茲鎮來的有十二畝地的中年農民告訴我，他那個地方沒有土地改革。那裏沒有土地可分。「我來這裏不過爲了報告給我們那裏的農民們關於這些新辦法。我是農民黨的一個十五年的老黨員了。」

不良的管理和全世界的農業危機使得許多封建地主甚至在戰前就失掉了土地。德國人也會佔領了一些。一個從色尼基鎮來的白髮老頭講到他那個鎮裏的三處田莊。一處由佃戶在管理着，另外兩處——十五年前就被破產了——由一個破產管理人在管理着。德國人指派了新的管理人，但是這些人都已經跑了。在這個鎮裏沒有地主來反對土地改革。同樣在奇梯尼克鎮，根據這個鎮的一個年青代表的說法，一處田莊在戰前就破產了，並且在一個破產管理人的管理之下。另外兩處被

德國人強佔了，地主也被送到集中營裏去了，「因為他們不接受德國人的命令。」

「看起來你們許多的田莊都被了產。農民們會不會管理得較好一點？」我問道。

帶着典型的農民的謹慎，這個年青的農民回答道：「一般而論，他們會管理得好一點。但土地的情形是很壞的。它長時間沒有上過糞或任何肥料。」沒有一個農民把土地改革看作無病不治。它只是一個開始的機會。

一個叫做斯特魯基克的聰明的中年人——斯基爾比左夫的領長——告訴了我奎莫斯區裏一個鎮的詳細而艱苦的故事。他所以看中了要和我談，是因為他要向羅斯福總統致敬，並且要告訴我，他喜歡赫爾的無線電講說。他臉上的深深的線條和他態度的誠懇，使他的樣子很動人。但是這個邊陲之地的人怎麼會消息這樣靈通呢？我打聽出來在淪陷期間他曾幹過「聽無線電」這件危險的事情，這是他承繼他兒子的一件工作。

「我的兒子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孩子，他懂得英文廣播，」他帶着淒涼的驕傲說。「德國人捉到他，並且把他弄死。我覺得我必須繼續他的工作。我不能做得像他那樣好，因為除了波蘭話之外，我什麼語言也不懂。我聽倫敦和莫斯科的波蘭語廣播。所有各黨派的地下組織都從我這裏得到他們的消息。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現在一齊選我做領長的原因。」

查莫斯區位於黑土地帶的邊上，所以是特別好的土地。當它還屬於帝俄的時代，有些德國的移民就在那裏住下來了。這給新的德國侵略者一個藉口來宣佈這個地區是「德國歷史上的前哨」，並且宣佈放逐所有的波蘭人。

「一九四〇年，尚在佔領的初期，他們把村民趕到一起放逐出境。最強壯的被帶到德國去做工，其餘的人簡直就送到死營裏去了。德國的移民從羅馬尼亞，菲薩拉比亞，南斯拉夫移進來。假如他們發現村子裏剩下任何波蘭人，他們來到的時候就殺掉他們。只有那些逃到森林去的人們才得到性命。因為當一個村子被驅逐的時候，附近的村子當然就逃到森林裏去藏起來。在我那個鎮的十六個村子當中，四個村子——包括我那個村子——的人都深入森林中去了。由於我們的游擊隊，森林裏德國人不那麼容易走進去。我們在這裏救了一些從別的村子裏來的人民，他們現在正在回家，但他們大部份是老年人和小孩子們。在查莫斯地區的森林中，戰鬥進行了差不多有五年之久。我們最好的青年人已經沒有了。」

那個鎮曾經有過六處田莊。最大的有兩千畝，地主被德國人趕跑了，他的兒子當游擊隊也被殺了，這個家庭裏沒有一個人留在地上。其次大的一處有一千八百畝，包括相當數量的樹木，一個鋸木廠，一個釀造廠，一個磚窯和若干漁場。地主在德國人下面繼續做着管理人。現在他在監

獄裏面，他的家庭已經搬到盧布林去了。關於其餘的地主，有一個被德國人趕走了，有一個曾經跟德國人合作並且跟着他們跑掉了，有一個在土地改革的時候仍然還在。『他沒有造成麻煩，他離開了，並且現在到十五哩外的一個鎮裏做森林管理人去了。』

最小的一田莊，一塊只有一百五十畝的土地，却成爲一個有趣的問題。它的主人——一個波蘭人——曾在美國住過，並且回到波蘭以後就用他在海外所賺的錢買了地。德國人把他趕走，但是他照樣在各村子中。現在他要求保持他的土地，理由是土地改革只適用於封建承襲，而不適用於那些『用自己的積蓄』所買的土地。斯特魯基克鎮長認爲這個說法有些道理。農民委員會決定這個從美國回來的人自己不能種這麼多的地，因爲他已經六十歲了，而且沒有兒子而只有一個女兒。他們給他留下他的房子和十五畝地，比一個農民應得的要稍多一點。

鎮長自己種七畝地。他沒有多麼。『我要地做什麼用？我只有我的妻和一個十八歲的女兒。我正要把她送到學校裏去。所有年青有爲的青年人都應該學習去，因爲德國人消滅了受過教育的人，並且我們需要一些人來管理波蘭。所以任何年青的人要去學習的話，我就用鎮裏的款子來幫助他們。』

『人民對於分地滿意嗎？』

「他們對於分地是滿意的，但是他們不滿意於分得的數量。在查莫斯，新分的地只有七八畝，不啻一家生活的。我們真的必須取得東普魯士以及西邊的土地。」

他按照老式波蘭的辦法懇切地親我的手，並且請我把查莫斯全體人民的問候帶給「所有在美國的以及不管在什麼地方的忠誠的波蘭人。」

爲什麼在戰爭中間來發動這個複雜的土地改革呢？

戰爭最後的這些日子是轉變最容易的時候。許多地上之不在——有些被德國人佔掉了，有些跟德國人一齊跑了——造成一種經濟上的真空，在這中間要很快地找出一些人來耕種土地。幾個星期的延遲就會產生新的申請者，例如以前的地主或他們的承繼人。現在正是調整的最容易和最少痛苦的時候。

此外，土地改革還有軍事上和政治上強有力的理由。地主集團一向是反動政治的中心。在新的制度下面，他們聲言要變爲恐怖集團份子來暗殺地方人員和軍官。相反地，新的土地所有者是新制度的自然支持者和波蘭新軍的自然兵源。

土地改革正在喚醒波蘭農村。它給新政府喚起有力的支持，並且給它的軍隊產生了熱誠的志

願軍人。它使論百萬的人民從數字上認清了所以要東普魯士和波莫尼亞的理由。所以儘管絲綢複雜，土地改革並不削弱戰爭的力量。它正在給柏林的進軍創造新的力量。

一縣又一縣地他們來參加正式的大會，當授與地契的時候，到處是國旗，樂隊，國歌和波蘭士兵的敬禮。於是我跟着比尼克——農業部門的副部長——去參加拉金的慶祝會，這只不過是到處輝煌中都在開始慶祝會中的一個而已。

經過那被壞了的市場，我們走向那鋪滿了繡的公園中的小會堂。一羣人擠進這座簡單的長方形建築，這是很久以前蓋的，沒有什麼建築學的格式，像一座早年謁聖牧師的聚會所。兩個波蘭兵，帶着全付自動武器，站在門的兩旁像兩根柱子似的；當比尼克走近的時候，他們馬上立正。眼着一定有什麼人給了一個信號，因為當我們跨進門檻的時候，裏面什麼地方的一團樂隊奏起國歌來歡迎我們。

於是那看起來似乎通不過的羣衆，好像由一種奇蹟分了開來，讓出一條路一直引到講台——引到那許多紅白顏色的波蘭國旗和深綠色的聖誕樹。聖誕老人——山比尼克代表者——正要獻給這些開會的農民大約三萬敬地。

縣負責人以當地的統計數字開始。在拉金縣差不多有五千戶正在取得土地。二一六二個以前是佃農和無地的農戶，每家平均得到九畝地。二六八五個以前有五畝以下的農戶，每家平均得到四畝。雖然每個人都已經知道他們將要得到的土地，但仍然是一片衷心的掌聲。

隨後他們全都靜下來忍受那漫長的演說，在這種場合裏，這種演說是不可避免的。穿著羊皮外套的男人們和圍了大毛披肩的女人們都冷得發抖，並且動着他們的腳，以便在那凍人的大廳中保持溫暖。一陣風從那炸壞了的窗戶中吹了進來。坐在一排末尾的一個女人轉臉朝着驢，並且打開她的衣服去奶她那哭着的孩子。沒有什麼人注意她。他們全是農民，並且有許多不得不帶着小孩子。

當比尼克講到一千年以來波蘭農民的鬭爭的時候，他們的目光愈來愈注視着他。他們爲了土地的鬭爭也就是爲了一個富強獨立的波蘭的長期鬭爭的一部份。地主們老是爲了他們的封建特權而出賣了他們國家的利益。這是歷史的教訓。

「在皮雅斯朝王的時代，尙沒有奴隸制度。那時候有別種形式的壓迫。」他講到古代的農民起義，那時還是半部落的時代，一個農民的兒子也可能變成王子。甚至在那個時候，爲農民權利的鬭爭也是和爲蘭波獨立的鬭爭聯在一起的。「地主們去找德國的武士來幫忙他們反對農民。」

在波爾斯拉夫會孫的領導下面，條頓族的武士們幫忙壓下農民……因此封建的地主們就變得更強大。

十四世紀的時候，卡西米爾大帝需要封建地主們對於他的若干戰爭的支持。他以維斯利加法典換得了地主們的支持。按照這個法典，農民們不能脫離土地，並且必須每星期無報酬地給他們的主人工作一兩天……這樣一來，合法的奴隸制度開始了……以後的幾個世紀裏通過了一千六百種不同的法律，把一切人權都剝奪了。按照一四六九年的皮奧特可夫法典，只有那些父母都是貴族出身的人才能有土地或做國家的官吏。這就阻止了地主和農民出身的女人結婚，因為這樣生下的孩子就沒有權利了。這樣就使得封建社會中的階級之間的鴻溝變得更寬。

農民們變成奴隸。他們從地主那裏逃走。他們逃到東邊的原野上去，到邊境上去，到烏克蘭。地主們帶着軍隊去追他們，奴役了他們，從而取得更多的土地。農民們起來過許多次。最大的一次起義是在烏克蘭由波格丹克米尼斯基所領導的。他的自由農民和帝俄聯合了起來，打敗了波蘭的地主，於是烏克蘭人來到俄國人的下面，後者比起波蘭的地主們來，尚允許更多的自治。

波蘭的地主們並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愛的不是他們的國家而是他們的封建權利。當瑞典的國王一直佔到波蘭華沙的時候，大多數波蘭的地主歸依了他來挽救他們的特權，直到農民們

帶着矛槍從克爾巴許山下來到才把瑞典人趕出去。卡西米爾王宣誓要減輕農民的負擔，因為他們救了他的王國。由於封建地主的關係，他不能實踐他的誓言，所以他退位了。

「在美國和法國革命的時代，偉大的波蘭愛國者希望波蘭成爲一個近代的國家。我們所慶祝的憲法就是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在柯蘇斯科和普拉夫斯基的影響之下通過的，它把農民從奴隸的壓迫中解放了出來，使他們成爲公民，只對國家盡義務。這個憲法從來沒變成事實。貴族們很生氣，因為他們不能隨便吊死農民了，而只有國家才能這樣做。所以他們之中有些人向俄國的卡瑟琳女皇求助，於是她就派了一支軍隊來協助壓迫這些波蘭的奴隸。」

「爲了波蘭的獨立和農民們的自由，柯蘇斯科將軍拿起了武器。他說只有靠一個自由的農民階級，一個國家才能強盛。農民們集在他的旗幟下面，第一個波蘭農民而變成軍官的就是在柯蘇斯科軍隊中的格羅瓦斯基。但是柯蘇斯科兩次都被波蘭地主們出賣了。」

「所以波蘭被打敗了並且被瓜分了。在帝俄下面波蘭的貴族們保持了他們的特權。波蘭的農民則失掉了他們自由的希望。並且一百多年以來，波蘭失掉了她的獨立。」

轉入近代，比尼克講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如何由於三帝國之崩潰而產生出來那年青的共和國。「一九一八年我們在盧布林成立了一個人民政府，並且宣佈土地是爲了農民的，而教育則

是爲了所有人民的……但是地主們又擔心他們的特權。於是皮爾蘇斯基抓到政權，並且爲了地主們在東邊的財產而向蘇聯宣戰，波蘭人民是反對這個戰爭的，但是地主們以答應他們土地使他們不講話。

「他們又一次地欺騙了農民。他們通過的『土地改革』規定二畝半地要賣兩千茲羅梯（紙幣）。那個農民能買呢？有些人想買並且付了第一次的款子，但是在 一九二六年以後，當皮爾蘇斯基變成了獨裁者的時候，地主們又有了另外一條法律用金子來規定地價。以前尚欠四千茲羅梯的農民現在發現他們欠一萬二千了。他們丟掉了土地以及所有他們所付的款子。」大廳中的點頭說明農民們還記得最近那些痛苦的日子。

演說者說到他的結論：「多少代的農民曾經等待着這一天，這時候你們自己的農民委員會來分波蘭的土地。你們所得到的不光是土地，它是波蘭富強獨立的基礎。柯蘇斯基說過：『只有一個自由的農民階級才能變成一個強壯，自由的國家。』今天我們正爲下我們國家的自由的基石。」

在羊皮帽和毛圍巾下面那些飽經風霜的農民型的面孔是專注的。他們從皮雅斯特王朝一直聽到現在，中間甚至連那零度的寒冷都沒有覺得出來。人們在嚴肅地點頭，肯定了他們的使命，那

就是今天所得到的九鐵地使他們成爲歷史的一部份。

隨後當一個穿着制服，帽子上帶着波蘭鷹徽的青年軍官走上前來的時候，大廳裏響起一片急速的掌聲。

「有些人告訴你們說，拿這塊土地是危險的，」他開門見山地對他們說。「他們說倫敦的波蘭人會回來的，並且會把土地拿去而且處罰你們。但是你們現在有一支軍隊了，並且我告訴你們，這是一支新的軍隊。舊的軍隊是由紳士們的兒子來做軍官的，他們利用它來壓服下農民的起義。我們的新軍則支持農民並保護他們的權利。在這支軍隊裏面，農民的兒子也可以升爲軍官。

「今天你們所得到的地契是由我們民主的波蘭新軍來保證的。」這就是那贏得滿場掌聲的演說。

第九章 拉金

。立在空中的那些光光的屋子都好像是踏着高蹺似的。屋子的上下左右都吹着臘月的刺人的風。

這兩間屋子，一間廚房和一間臥室，是這所房子所剩下的所有一切了。從側面來的大風把在下面的那個小的面包房全吹垮了，只剩下一段一段的牆了。這些牆尚足以支持第二層樓的房間，以及夜間我賴以睡到我的住處的那座又陡又小的樓梯。

已經是在那窗戶破損，光光的大廳開會之後了，在那次會上農民們得到拉金縣分好了的土地的地契。晚上又開了一個慶祝會——拉金的第一次聖誕晚會。那個高級學校又打開了。年青的人來看他們劇團的第一次的表演，把那間小會講堂擠得喘不出氣來了。那活潑的歌唱和跳舞都是十足業餘味道的，但是教員解釋道：「學習正規的歌唱和跳舞需要一些時間。這些全是五年多以來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在那以後的普通跳舞中，我遇見了那個波蘭上校查尼亞夫斯基，當波爾在華沙投降以後，他會領導過逃亡的起義者渡過河來。我不願意打擾那天晚上的跳舞，所以我約定一個日期在盧布林訪問他。他解釋說，他很少到盧布林去，因為忙於在一個離拉金不遠的訓練營裏訓練士兵。他必須在第二天早晨回到營裏去，但這一個晚上剩下的時間他是自由的。

「那麼這裏就是我要記下一些歷史的地方了。在你碰到另外一個記者之前，你也許被殺死了。」

我無情地把他拉到校長辦公室裏去，那裏跳舞的人的衣服堆在幾張桌子和椅子上。我們把衣服堆到地板上，於是坐下來，拿出筆記本和自來水筆，並且對於大廳裏的音樂關起我們的耳朵來。比尼克大約在午夜開車回盧布林去了，但是我仍然在記錄着查尼亞夫斯基的故事。當拉金縣的職員們答應我兩天之內會有另外一部汽車時，我決定留下來。

當他們討論到他們的美國客人的住處的時候，我說得很直率。

「我所在乎的不是食物，不是床，也不是單獨一個人住，而是暖和。」當我回想起那天下午在那凍人的大廳中的會議時，我打起冷戰來了。所以他們把我放到芮瑪的副主席那裏去住，因為他有一個荷蘭爐子。他們爲我發了兩天的額外燃料。

這就是我之所以在大約早晨一點鐘來到拉金縣副縣長波大普茲克的兩間屋子的經過。他和他
的妻，一個成年的兒子和一個男客睡在廚房裏，給我那間臥室並食堂。我想因為缺乏燃料，他們
在冬天不用這間屋子。

屋子裏面看起來頗不壞。以前曾經是樓底下麵包房主人的整潔而質樸的住房。那粉刷成淡藍
色的臥室甚至五年的戰爭都沒有污損它。但是轟炸震掉了牆壁的絕緣體。所以他們給我在那個大
荷蘭爐子裏所生的旺盛的火也很少效用。火使爐瓦熱得不能碰，但還是不能抵抗住那穿過破壁而
鑽進來的寒冷。兩個本來通到隣室的門，現在門外就是零度的天氣。

在這樣的屋子裏蘇芮達的副主席正在咳得要死。隔著那薄薄的間壁，我幾乎可以整夜的聽到
他在咳。他的肺和腎臟在一九四三年曾被打傷到不能醫治的程度，那時他在一個農民家裏正過著
『地下生活』，一天有四十五個人把他拖出來，打了一番，然後扔下他去等死。

在那冰冷的臥室裏而我在那大羽毛被下面睡得很暖和，但只要一起來，我就急忙跑到廚房裏
去取暖。波大普茲克太太給我一些代用品的咖啡，因為加了牛奶而做得相當適口。她似乎有足夠
的糖——波蘭有甜菜和製糖廠——但她只拿來一小塊黃油，神氣如此之隆重，使得我不敢多吃。

於是波大普茲克告訴我他的故事——他如何組織地下政府，以及在紅軍來到的時候他如何取

得政權。披着一條床上的褥子，我在他的廚房裏盡我凍僵了的手指的能力把他的話寫下來。坐在這個被炸城市裏的這兩間縣委員執行職務的屋子裏，我禁不住想到在倫敦的波蘭政府遠比在當地舒服得多了。

當德國人侵入波蘭的時候，波大普茲克正在難技的一個紡織工廠裏做機工。他的同伴德國工人告訴他：「你最好走開，你在工會中的活動使你成了一個顯著的人物。」他接受了這個暗示，並且剛剛在蓋斯塔波製擊工人住宅之前走脫了。

「我來到拉金縣的一個村子裏做修理工作。當德國人開始襲擊村莊的時候，我就移來移去。」

當波大普茲克移來的時候，拉金縣有十一萬人。在他坐在他那炸壞了的屋子裏向我敘述的時候，就只剩下八萬四千人了。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被德國人用各種方法殺掉了——全波蘭的比例數也大致如此。「他們開始先殺猶太人，然後是那些保護猶太人的波蘭人，然後是所有那些尚不完全順眼的波蘭人的領袖——這些人他們統稱之為共產黨。」

波大普茲克——那時是一個強壯而有精力的人——加入了在倫敦流亡政府指揮下面的地下內地軍。「但是我實在看够了他們那種小心等待的政策。有一個時期兩個蓋斯塔波的軍官就可以在

晚上跑進一個村子並且帶走十四五個人。內地軍一點也不想法去阻止。它在「保存實力」，以便在德國人被同盟國打破了而自動從波蘭撤退的時候取得政權，這就是他們的說法。這期間，一些內地軍的縣負責人和德國人混得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我們做士兵的則被驅逐，殺死。

「當內地軍出賣自德國人手中逃跑的蘇聯俘虜時，也使我非常憤怒。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蘇聯俘虜營，他們都挨著餓。有時候少數人逃了出來，並且到路上和森林裏去找援助。我讓我那十五歲的孩子出去找他們。我們把他們藏在村子裏，武裝了他們，並且把他們送到東邊去。這些人是在波蘭的第一支戰鬥的游擊隊。內地軍的領袖們認為他們是敵人，但是我認為他們是同盟者。」

波大普茲克驕傲地拿出一張很長的紙來給我看。上面交雜着藍色和紅色的線，這本來是一個學校筆記本的一頁，上面寫着「草約第三號」，並且一面是波蘭文，另外一面是蘇聯文，裏面記錄下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在色維爾諾夫卡村附近的森林中，若干逃出來的蘇聯俘虜和波蘭人之間的一次秘密會議，在蘇聯人中間有兩個飛機師，一個無線電員，兩個政治工作人員，和幾個軍官。他們組成了一支二十七個人的游擊隊，以那有名的哥薩克游擊隊長夏伯陽做爲名稱。按照這個報告，他們有九支步槍，三支手槍，和十五顆手榴彈。

「我們從那些老波蘭軍埋在地下的東西中蒐集了這些武器。夏伯陽游擊隊向東去了，希望能

突圍跑到紅軍那裏去，他們還沒有跑出去二十里地，內地軍的一個人出賣了他們。」

「你怎麼知道是誰出賣他們的呢？」

「他們有三個逃了出來，並且告訴了我們一切。經過那德國俘虜營的生活之後，這二十七個蘇聯人的健康情形都很壞。他們到了一個十八哩之外的村莊，並且看見一間獨立的小房子，離開森林不遠，似乎很適於休息，房子的主人——一個老農夫——說可以。他有一個妻子，兩個小孩子，和一個成年的兒子。當他們正在休息的時候，大兒子走出去了，很快德國人就來了，並且用武力包圍了那房子。他們把手榴彈扔進屋子來，殺死這些游擊隊，同時也殺死那老頭和他的一家，三個蘇聯人逃脫了，那時他們正在森林裏尋找草莓，他們看見那個兒子和德國人在一起。我們知道他是內地軍的一員。」

波大普茲克說服了內地軍。他開始秘密地組織一支政治派別不同的游擊隊。內地軍的縣負責人懷疑他在朝著另外一個方向活動。他們提議讓他在他們的非法報紙中擔任重要的工作，然後又答應讓他做他們的總指揮官；他們這樣來試探他，這些建議他都拒絕了。

我知道他們將藉此來反對我，所以我搬到另外一個村子裏去住，那裏沒有內地軍的人，我隔壁的隣人出賣了我。四十五個內地軍的人晚上來了。我知道有四十五個，因為當他們把我們拖

到隔壁院子裏去的時候，他們站了隊並且報過數。他們把我說得一絲不掛，然後拷打我。他們打我的兒子和六個我的游擊隊員，但是他們把我打得最兇，因為他們懷疑我是領頭的人。他們丟下我去等死。我在床上躺得很久，並且將再也不會健康起來。」

惡劣的健康並沒有阻礙了他的地下活動。他再也不能輕易地通過森林了，但是他成了游擊隊在村子中接頭的人。他吸收新隊員，他把他的游擊隊和其他主張相同的游擊隊合併了起來，並且把他們交給李米爾斯基新組織起來的人民軍。

我們當地的游擊隊都是小規模的，但數量却很多，我們不能有大隊的人，像白俄羅斯大森林和沼澤地中那樣的游擊隊。我們的森林比較小，並且村與村的距離也近一些，沒有地方來隱藏大部隊。但是甚至在拉金也有些公路，兩邊都有森林，這些地方使得德國人幾個月都不敢通過。這以後當我們一起坐着一輛無恙卡車去盧布林的時候，波人普茲克就囑咐地指出一條這樣的公路給我。

內地軍和這些新游擊隊之間的摩擦增加了起來，當德國人在斯大林格勒被擊敗的時候，內地軍的那種小心等待的態度變為明顯的對蘇仇視了。這一部份反映了在卡頓森林事件上蘇聯和波蘭流亡政府之間的破裂關係。一部份也是由於對新游擊隊的嫉怕心理而來。這些新游擊隊把紅軍當作

同盟者而向它歡呼，整個一九四三年中，內地軍的武裝部隊對於新的游擊隊做了許多次的攻擊。

梅陸齊上尉——他在波大普妓克受傷之後就指揮森林中的行動——參加了我們在廚房裏的會談，並且舉出許多這種攻擊的例子。

「在森林中過了很久之後，我們有九個人，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到一個村裏的一間屋子裏去休息一下，我就是其中之一。第二天大清早，一個內地軍的人出去了，好像是去禮拜堂的夥子。跟着就來了一百人，把我們九個都繳了械，並且把我們帶到森林裏去，在那裏他們問了問我們的政治。於是他們說：『我們不需要你們這樣的人。殺死你們比殺死德國人還要好些。』我們有兩個人逃掉了，其餘的人全被殺了。他們全是很好的人，忠誠的愛國者和良好的朋友。」

梅陸齊所講的另外一次事件發生在一九四三年的初秋，在盧布林之南的波魯夫村。三十個人民軍的游擊戰士，爲了使大家團結一致共同來反抗德國人，和內地軍及NSZ（國民軍）的代表們開了一個會，會中佈置得很謹慎的，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不帶武器，但是六個帶武器的人忽然出現了，叫道『舉起手來！』他們逮捕了人民軍的人，並且把他們殺死在森林中。

「他們不是用槍打死他們的，而是用斧頭砍下他們的腦袋。他們喊道：『現在我們不必去和德國人打了，他們已經被打敗了。現在我們必須和蘇聯人以及你們這些該死的共產黨打了，』後

來內地軍的一個人因為認視這種行動跑到我們這邊來了。他告訴了我們那次屠殺的詳情。」

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四四年一月間，波大普茲克所接到的命令是相當令人吃驚的，那時候他是五十四個武裝人員的領袖，並且和更多的人合併在一起了，在華沙除夕的會議之後——這個會建立了芮達·拿若多瓦和人民軍——波大普茲克的上級叫他到那個地區的參謀部裏去，並且告訴他給拉金組織一個芮達——即這個縣的人民會議。波大普茲克問應該包括些什麼組織，他被命令去邀請內地軍，人民軍，農民營，波蘭社會黨，農民黨，波蘭工人黨，以及靠得住的無黨無派人士。

「我去找過他們所有的人，並且得到他們的代表。」我覺得他在把一件必然是相當危險的工作過於輕描淡寫了。所以我問他究竟是怎樣獲得了內地軍的代表。他到他們的縣負責人那裏去——他們在另外一個村子裏——並且碰到一些曾經打過他的人。

「你還活着呀！也許最好是我們現在把你結果了，」他們笑罵道。

「可以呀！但是之後你們也不會活多久了。因為在森林裏現在有我五十四個武裝的人了。」內地軍的首領們對他比較恭敬一些了，他們甚至決定派一個代表去參加他的芮達。「他不是有一個有用的代表，」波大普茲克批評道，「他只不過是擠進來看看在進行什麼而已。」

在各個村子中的秘密會議選出其他的代表們。一九四四年的二月間，波大普茲克在全縣中主持了村鎮長的秘密選舉，建立了一個九十八人的縣會議。『這些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選舉，』他抱歉地對我說，『因為選舉必須得秘密地舉行，而且我們不能每一個人都相信。秘密齊達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把食糧藏起來，給我們自己和紅軍留者而不讓德國人知道，當德國人離開的時候，我們的鎮長們已經準備好了去接收。』

紅軍在七月二十一日，一個禮拜天裏來了。拉金很快地就被包圍起來了，因此城裏很少戰鬥。當紅軍的坦克隊駛進城外德國飛機場的時候，有三十三架飛機甚至沒有來得及起飛。駕駛員不是舉起手來就是跑到森林裏去了。游擊隊搜尋到他們並且把他們交給紅軍。『後來我們有一次慶祝，並且贈給這些拉金的解放者一面很好的旗幟。他們是白俄羅斯第一線來的哥羅克機械化騎兵。』

『當德國人開始跑的時候，我的上校命令我進入拉金。他讓我做緊急治安人員。我和九個武裝人員甚至在紅軍之前來了。我們的任務是防止火災，掩埋屍體，停止搶劫，搶出蓋斯塔波的文件，和發現間諜。九個人之中有一個是游擊隊的上尉，他做了警察局長。另外一個是受過教育的，他可以寫草約。我們馬上選出一支民兵來幫助我們，發給他們槍支但是不給他們武器。我們還不是一個正規的政府。我們還不能解散我們的齊達。我們還正在前線，德國人正在轟炸那個城，並

且還可能回來。

「所以有一個禮拜之久我管理着全縣。」一絲驕傲的光彩閃過波夫普茲克的面孔。「我親自到蓋斯塔波的地牢裏去，並且檢在文件。我找到證據證明我所失掉的四個人是被內地軍的領袖們所告發的。」

當我追問詳情的時候，他回答得很平靜，但是他却正在壓抑着很深的感情：「牢裏的牆上有許多字跡，例如「耶穌基督救我離開苦刑吧！」有一個地方有兩個犯人的名字用一支鉛筆寫在一起。一個是我很好的朋友，已經死了；另外一個還在一個村子裏活着。我去找他，並且問他那個入怎麼死的。他告訴了我在獄中所知道的一切。德國人殘酷地拷打我的朋友，但是他堅不承認他是一個游擊隊員或是一個共產黨。於是他們帶來一些內地軍，他們對着他的面說：「我看見你在森林裏帶着武器跟着一個蘇聯戰俘。」當然他們殺了他，但是他告訴了他同獄的人這個好細的名字。」

「告發的人現在在那裏？他跟德國人跑了沒有？」

「他仍然在村子裏。他甚至還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事。」對於我吃驚的樣子，波夫普茲克解釋道：「終有一天我們要審判他的。現在還不適於使村子裏有太多的麻煩。」我聽說出賣波夫普

致克的人——因為這個人，四十五個人來打他——也還是道過法外。

經過波夫普赫克個人六天的管理，縣芮達第一次公開的會議在七月二十七日召開了。「德國人仍然在轟炸我們這裏——大多數的破壞都是在那個禮拜中造成的——所以芮達在附近一個村子裏開會。代表從各個Gemeinde（鎮）裏來到，並且有許多普通的市民來旁聽。我們選了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一個執行委員，一個副執行委員，和五個其他的人做爲主席團。這九個人來到拉金並且執行職權。」

六天的縣判裁者成爲新的副主席。當我問到這個降級的原因的時候，他簡單的回答道：「我是從蘇茲來的，而我們需要一個當地的人。」

整個下一個禮拜中，他們在舉行村選舉。「是公開合法的選舉，因爲第一次芮達的選舉是秘密而又是小規模的。現在每一個過了二十一歲的人都可以來開會。他們選出他們的Sohns（村長）。他們也選出到鎮上去的代表，按照村的大小，每村選一個至三個代表。在這以後Beirath（鎮）芮達選出參加Vogel（縣）芮達的代表來。」

「村選舉是用票選還是用舉手選的呢？」

「有些村子大家一致通過的。特別是在德國人趕走的老Sohns（村長）還活着的時候，那麼他

們只不過讓他重新回來而已。假使有任何人要求秘密選舉，而且有另外一個人贊成時，他們就必須得去找紙和選票。這事並不容易，因為紙和鉛筆都很少。在連維打村，有七個的^{of the}（村長）候選人，所以他們自然得用選票。我自己參加了十五個村選舉。其中有十個村是秘密票選的。」

我問到有不同政黨的村子，是否各黨推出對立的候選人來呢，對於這個問題，波大普茲克給了一個否定的回答。「這些第一次的選舉是沒有黨派的，因為那時在我們國內，政黨還沒有組織起來。後來政黨組織起來了，並且有權把他們的代表加到鎮西連和縣西連裏面去。」

在我訪問的時候，充份成長起來的拉金縣西連有五十個人。三十二個是從十六個鎮裏選出來的，每鎮兩個人。十五個是各團體組織的代表：包括政黨，教員聯合會，醫生，商人，小農團體。三個是「專家」，由西連選來做技術工作的。

廚房裏的火已經熄了，所以我們離開波大普茲克的家而到縣辦公室去。在拉金有三條公路會在一點。正在交叉點上，一個紅軍的女兵站在一個小圓台上，熟練的揮動着她的指揮棒在指揮過往的車輛，三條路分別寫着「到華沙」，到「盧布林」，「到布列斯特」。在她後面，以前曾經是一座莊嚴的縣建築物的燒焦了的牆，站在那裏，沒有屋頂，沒有窗戶，反映在冬天的天際中，以前有若干排店舖的市場，只剩下一些東倒西歪的牆與一堆一堆的磚瓦了。

靠着那鋪了霜的公園的邊上，在光禿禿的樹枝下面，有三座標着大十字架的墳墓。六個『拉金的解放者』埋在那裏，每座墓中有兩個人。全是蘇聯人。在解放拉金的時候，波蘭人也曾有被殺死的，但是他們像良好的天主教徒一樣都埋在禮拜堂的院子裏。誰都知道蘇聯人不是天主教徒，所以他們似乎屬於埋在公園裏的人。十字架是怎麼回事呢？但是一座墳墓總得有一個十字架呀。有些農民經過的時候正在墳上放些花圈和冬青樹枝。

我們在一座炸壞了的建築物裏繼續我們的討論，這裏縣和市兩部門從此擁擠在一起，每間屋子有十二個公務人員。我指出從紊亂中創造一個縣政府一定要比他的不着力的敘述困難得多。波大普茲克同意困難這一點，但是他的理由都和我不同。

「是非常之難，因為我們沒有紙和鉛筆，並且城裏的人因為轟炸而往鄉下跑。更困難的是這樣的建築都被破壞了。你看見了我們那大而漂亮的縣政府是被炸被燒到什麼樣子。我們要接收另外一座大建築物，這座建築物以前是共猶人商店，店主都已經死了。紅軍需要它。當他們向西進的時候，我們就會有更多的地方了。盧布林的委員會已經撥款來修我們的縣政府，但還要用好幾年的時間。五個工程師正在計劃中。」

「我們的民主還不十分健全，」他繼續說。「上個星期我們有一件很嚴重的控訴。」

他把這件『控訴』拿給我。那是三份三頁的公事，上面打滿了字。不同的調查者都在底下附上他們的意見，這表明這份和當污損了的公事曾經自一個村子送到盧布林，然後又返回來。波大普茲克解釋說，在十月間的一次鎮會議上，縣西達的主席把七個當選的代表取消了而換上他自己指定的人。村民們送給盧布林一個控訴，在盧布林管理各地政府的那一個部門又把它轉到拉金來調查。拉金縣西達的主席因為他的獨裁行動已經被免了職，並且又選出一個新主席。『一個很好的人，』波大普茲克說。『一個農民。』村民們曾經送來一次感謝的決議，說道：『現在我們看出我們正在波蘭得到民主。』

在縣政府裏面的一間屋子裏有一長列的農民。他們正在領取他們的地契，因為昨天的正式會議上只發放了一小部份。還有一個問題似乎還沒有人提出來。它也許是一個細微的問題，但具答案却為美國所需要。所以我就問了。

『那些以前的地主那裏去了呢？』我並不是認為有什麼人曾經調查過他們，但是我需要一個一般的概念。

我得到的比我希望的還要多。波大普茲克若無其事地回答道：『最好去問查奧爾斯基。他是地主中的一個，並且他會告訴你別人的情形。他在土地局的隔壁。』

嚴格說來，以前有四百畝地的查奧爾斯基居然還留在縣裏是違犯法律的。地主們是被認為應該驅回的，以免他們干涉土地改革。但是一切法律都是有例外的，而且查奧爾斯基是一個誠實的人，他對於拉金縣的土地知道得非常詳細，所以縣裏也不願意讓他走。他很自然地和另外三個縣公務員在一間屋子裏，每個人都正在接見一大串的訪問者。

當我進去的時候，他正在和兩個波蘭軍官熱烈的辯論着。他們互相恐嚇，喊叫，最後彼此拍肩膀並且握手。我猜想他們正在爭論着軍糧的運輸問題。同時也很顯然查奧爾斯基知道他的業務，他不用和任何別人背後商量一下。

「我在這個縣裏徵集糧並發放軍糧，」他解釋道。「農民們並不拒絕出糧，但是運輸很困難。讓一個農民在他到市上來的時候把糧食拉到縣倉庫裏來已經是够困難的了。我剛剛訓練得他們做到這一點。現在軍隊要農民們把糧直接送到他們的營裏去，他們說他們沒有卡車。我正在使他們從倉庫裏拿。假如他們到處拿，我就不能控制糧食的發放了。但是我也對軍隊做了一個讓步，他們可以什麼時候方便就什麼時候來領取他們每月的糧食，而不必按星期來領。我是不願意這樣做的，因為我敢打賭，不出一個月他們就會往西去吃另外一縣去了。但無論如何總算是從一個地方來領了。」

一個以前的地主怎麼會被允許留在他自己本縣裏做公務員呢？他是否是某個游擊隊的隊員，或是某個有影響的政黨的黨員呢？查奧爾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是百分之百的無黨無派的，但是當然人家知道我是一個進步的民主人士，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會把我請進來。我以食物和住的地方來幫助游擊隊，那不過只是做一個愛國的波蘭人而已。在這裏，人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工程師，一個農業家；也許是一個對於行政問題比自己的財產更有興趣的人。除了我自己以前的田莊外，我曾經做過這裏幾個別的田莊的管理人，這些田莊都破了產而且必須恢復起來。人家認為我知道如何經營土地。最初他們使我做縣土地負責人。我拒絕了這個職務，因為它包括處理土地改革的事情。我告訴他們，做為一個以前的地主，讓一個人自己來吊死他自己是不合適的。他們讓一個別人來充公我的土地，而我則處理生產和供應的若干問題。」

查奧爾斯基剛剛和紅軍算完了他的賬，「他們在賬目上很友好而且通達。做為一個商人我所從來不能接受的收據，他們就接受。」他解釋說，當前進部隊的單位從農民那裏拿去了糧食，他們就留下收據，這些收據以後盧布林當局遂予以承認而做為已繳納的糧食。

「這種收據有些是非常之不正式的。一個農民會送進來一張紙，上面寫道：『我，伊萬少

尉，自某某人取得一半。」沒有圖章，沒有住址，甚至沒有師的番號。紅軍認爲這些收據都是有
效的，因爲他們知道在那個地區裏他們有單位，並且前進的尖兵很匆忙，而且絕不會留下番
號。

在奧爾斯基知道拉金縣的每一塊土地和以前的每一個地主。他給了我一個全面的敘述。充公
的土地一共有四萬畝，其中有一萬畝是森林，森林保管處接收了，剩下三萬畝分給農民。土地計
有五十八處田莊，但只屬於二十八個地主。其中有八個——包括十四處最大最好的田莊——在淪
陷期間由德國人佔據了，這裏的充公是很簡單的，因爲當紅軍進來的時候，德國人就走了。

「這樣大約可以說還有二十個波蘭地主，但是當土地改革見諸實行的時候，只有六個真正還
保持着土地，」在奧爾斯基總結說，隨後又加上道：「其中包括我自己。」

三處波蘭最大的田莊的命運，說明了在淪陷期間地主的遭遇，縣裏最大的田莊——四千三百
畝——屬於米拉諾夫。德國人把他扔進一個集中營，他就死在那裏面。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到維斯
杜拉河那邊和一個結了婚的女兒住在一起，當新法律到來的時候，田莊是由一個監督人在管理
着。

魯得尼茲田莊——四千一百畝——的主人住在華沙。「起義以後誰也不知道他在那裏了。」

第三個最大的田莊包括二千畝。地主是一個剛結了婚的年青人，並且全心全意在他的新娘子身上。當他聽到前線的砲聲接近了的時候，他就離開了。他爲他的妻子擔心。」

綜合那剩下的十七個波蘭地主，查奧爾斯基說有六個被德國人扔進監獄裏去了，有五個在「我們的命運被決定的最後廿四小時之內」走掉了，六個仍然留在他們的土地上，直到命令讓他們離開。後六者之中有兩個因爲阻止土地改革曾被下獄。

「那些被德國人下獄的人——你儘告訴我爲什麼嗎？」

「因爲他們是波蘭人，」查奧爾斯基聳了聳肩。

「還有那些跟德國人逃跑了的人呢？是否如同盧布林所宣佈的那樣，你也認爲他們是親德的嗎？」

「我不願意把任何波蘭人認爲他是真正親德的，」想了一下之後查奧爾斯基說。「那是把一套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太簡單了。五年德國的佔領區分出所有顯著的波蘭人。那些公開反對納粹的人進入了集中營。那些稍爲與納粹妥協了一點的人，在波蘭愛國者的眼中變爲可疑。在戰爭接近的那最後的一刻，隨之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死傷和紊亂——好了，在那時候很難決定究竟做什麼。許多人也許是在一陣驚慌中跑掉了的。」

他這樣爲他的同伴地主們解釋。事實依舊是，在那一陣驚慌的時候，有些人留在他們的土地上，而另外一些人則跑掉了。這種選擇也許不是在那一瞬間決定的，而是由於五年來的行動決定的。不管怎樣，拉金的土地改革，和波蘭其他地方一樣，由於大多數地主的不在而大大地簡單化了。

當我和查奧爾斯基談完話之後，寒冷和疲倦正襲入進來。我在冷屋子裏的時間太久了。早晨代用品的咖啡使我失掉了我通常的食慾。在一間沒有火的飯店裏吃完一頓少量的飯以後，我回到波大普慈克住的地方去；我已經冷入骨髓。穿着大衣，戴着毛線帽子，我爬到墊着羽毛的床上去。

過了一些時候之後，在半醒的狀態中，我覺得屋子裏有個什麼人。疲倦的轉過頭來——我沒有力氣把頭從枕頭上抬起來——在睡眼矇矓中我看見一個人，穿着羊皮外套，戴着農民的帽子，兩腳牢牢地站在屋子中間，一動也不動地看着我。他身材中等，體格堅實，頭髮剛開始變灰，F型生着鬍子。他的臉是農民型的，同時也是那種知道並且忍受過一切困難的頑強。

我要和他說話，但不能完全成功。我仍然昏昏欲睡。他說了一些什麼，那時聽起來像是說：我

就是芮達·拿若多瓦。」這一點也沒有使我吃驚，因為我在迷惑中已經不記得拿若多瓦是一個五個人的會議了，也許他說的是他是芮達的主席。那時我以為他真的就是在那間屋子裏芮達·拿若多瓦的化身。

他說了一些關於人們對於生命和世界的各種不同的看法。說到美國人有許多幻想。在波蘭這裏，經過五年的戰爭，我們看見事情的本來面目。」也許我應該這樣說：「這裏我們看見真實。」我所得到的與其說是確實的字句，毋寧說是他的思想所留下的印象，隨後他就走了。我仍然疲憊得不能起來。半個鐘頭以後，我真的醒了，並且要找他，或者要知道剛才是不是在做夢。在縣政府那裏，我才知道芮達的新主席——波大普茲克說他是「一個好人，一個農民」的人——因為某種公事曾經來到城裏，而且到波大普茲克的家裏，想會一會那美國的客人，但是看見我睡着了，就又回到他那人約有十四哩遠的鄉下去了。他們認為幾天之內他是不會回來的。

我在波蘭逗留的整個期間，從來沒有這樣渴望地想和一個人繼續談一下話。但是我並沒有決定再多住一些時候，或是到他的家裏再看他一次。為人和查尼亞夫斯基談話，我會經留了下來，因為我要自他得到一番充滿了事實的故事，這時訪問的時間和長短就有關係了。但是對於這個人，訪問時間的長短或事實的多寡却無關緊要，他是不真的談過一些話，或者是我夢見的也都沒有關

候。那就好像在那半醒半睡的狀態中，我已經遇到並且知道一個人和一個縣的本質了。

現在我明白了爲什麼波大普茲克只能做富達的副主席了。波大普茲克是從羅茲來的。他曾爲拉金很好地戰鬥過，他也許會爲拉金而犧牲。但是這個人却就是拉金本身。他就是農民的波蘭，不是那過去的，黑暗而孤獨的農民，而是那今天和明天的，正在行動和認識過程中的農民。

波大普茲克過了一會就回來了，於是他的妻在廚房裏擺出晚飯來。我努力來吃那一大盆青菜馬鈴薯湯和一些煮熟的馬鈴薯——沒有黃油，因爲早餐那塊寶貴的黃油已經沒有了。我吃不消那大塊的生豬油，她却認爲那是好東西而慫慫地讓我多吃。她看出我假裝在吃，並且堅持說我沒有吃够。

看着我們友善的衝突，波大普茲克的目光和愛地落在她的妻身上，「請要讓美國人都認爲波蘭人是好人，」他帶着怪笑說。

「他們不好嗎？我微笑着反問。

使我一驚，他的臉陰沉起來了。當他說話的時候，他說得很慢而且帶着深深的歎息。「我也希望你這樣想。」「這是一個好的城市嗎？」當他問這句話的時候，他的眼睛注視着窗外的巖壁。

吃驚之餘我找一些話說。我說了一些關於「英勇」的話。他搖了搖頭。

「這是一個破爛的城市，」他沉重地說。「重建它需要很常的時間，但是比起他們對於人民的破壞來，建築物的破壞簡直算不了什麼。」

在那隨後的沉默中，我回想起下午的那個來客，他曾說道：「我們看見悲情的本來面目。——我僅僅在寫那在土地改革和全民建設中的人民，我可以沈迷於好聽的詞句中。波大普鼓克却必須在那建設中去戰鬥。」

「我們是那些藏在地下室的人，我們是那些做了五年奴隸的人。奴隸是怎樣生活來的？有些靠賄賂或欺騙他們的主人而生活，有些靠出賣從被殺害的猶太人所搶來的東西而生活，靠出賣他們的隣人而生活。有些逃到森林裏去作戰。許多——並且是最好的——人死掉了。」

「那些剝奪了我的健康的人，他們是些什麼人？是家裏人口衆多的農民，也許靠出賣我而挽救他們的孩子們，或是無知地上了人家的當。終有一天我們將會有時間來調查和審判他們。不是現在。他們不是我們主要的危機。他們是那些我們要用來建設的人民。」

「什麼是你們主要的危機呢？」我擔心地問道。我想到敵人的間諜，高級人員的貪污，嚴重的饑餓和寒冷。

波大普茲克帝有沉思慢慢地說：「我想是那些相信我們已然贏得了和平，因此認為我們應該停止的人。」

第十章 一個政府誕生了

在盧布林的一個除夕，在一個有黃色大理石柱的圓形大廳裏，我看見波蘭的新政府誕生了。

從那次在華沙組織了地下芮達·拿若多瓦的會議算起，整整一年過去了。從它一開頭在那秘密的房子裏的時候起，甚至在德國的恐怖下面，芮達就散佈到全國。它會組織了許多縣政府——例如在拉金——並且準備了一支人民軍，包含許多小而散佈在各處的游擊隊。它的代表會穿過德國防線來到紅軍司令部，準備着那即將到來的解放國土的諸戰役。當紅軍——還有貝爾林將軍的波蘭第一軍——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強渡過巴格河的時候，芮達——在波蘭的大部份尚在地下狀態——就建立了民族解放委員會，公開地在那被解放了的波蘭東部三分之一的國土上，執行一切政府的緊急任務。

一個月又一個月地，這個新的制度受到行動的考驗。村、市、縣和省的芮達早就組織起來了。全國芮達不斷地由新組織的代表，或日益增加着的下面芮達所選出的代表而擴大起來。它在

解放區已經有了一百五十個代表，在納粹佔領區的人數則尚未公佈，已經到達了一種認為應該正式組織一個臨時政府的地步了，因為委員會正在做着真正的政府工作。

我碰到一些簡單的青年士兵，他們不明白何以還需要再重新正式一下。「我們以為委員會已經就是政府了。以前我們到底宣誓效忠於什麼人呢？」在一般市民的心裏，對於這些形式的考驗就在於它們能否工作。它們是否從納粹所留下的紛擾中產生秩序呢？它們是否獲得了市民的支
持，並且使人們能够生活和工作呢？它們是否穩定了情況？

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不能在盧布林的那些討論中找到的，這裏，像在羅斯福新政的時候一樣，什麼議論你都可以聽到：從最光明的希望到最激烈的攻擊。連全國的選舉也不能決定這些答案。三分之二的波蘭尚未解放，並且使那些散佈在外國的數百萬波蘭人回到家裏來，也需要一個時間。但是很實際的答案是已經有了的。

第一個答案在初秋的時候來到，那時農民們服從了徵收糧食的規定，並且不用軍事強制就按照當地西達的命令繳出所需要的數量。當公務人員和產業工人願意按照新的食物供給制度做工，因而穩定了生活的常軌時，就來了第二個答案。當人民接受那只靠將來的允諾和信用來支持的新制度的錢幣做為法幣時，人們就給了第三個答案。第四個答案就是青年們動員到軍隊裏去，這支

軍隊在幾個月中間就增加了一倍。第五個答案就是各「處」所發的護照被不健全的運輸機關所承認。最後，在某些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農民們的答案，那就是經過當地選舉的委員會分了將近一百萬畝土地，並且根據新制度的地契在耕種着。

正式政府的成立曾經延遲了六個月，不僅等待着這個國內的組織，並且也等待着與倫敦波蘭流亡政府的一些人的協議。那許多會議並沒有得出什麼結果來，事實是倫敦的波蘭人，經過幾次內閣危機後，甚至有了更反動的領袖們。現在看起來似乎可以不要他們而進行了，因為內部的力量已經受過考驗。

擺在前面的巨大進攻也需要一個正式的政府。每個人都知道，紅軍和隨同的波蘭軍很快就會突破德國人沿着維斯杜拉河的防線，並且向西掃蕩，去解放波蘭其餘的土地。各種的領導人物馬上會從直布林分散到別的城市和省份裏去，在那些地方，他們必須在一切混亂中，以及正在一個巨大前線後面的那些交通和運輸的癱瘓中，來建立地方政權。爲了這件更廣大的工作，他們需要一個正式政府的權力和聯繫。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早晨十點鐘，在委員會總部的一個大廳裏，齊達·拿若多瓦開會

了。到會的有九十八位代表。他們坐在從主席團的桌子輻射出來的三排長桌子邊。德國佔領區的代表們在大會之前會秘密地通過前線帶來報告和建議，但是他們不參加公開的會議以免暴露。

大理石柱子和綠色的盆景把大會和外圍的來賓和記者分開了。當芮達開會的時候，在場的外賓有蘇聯和法國的外交代表——那是法國代表第一次的公開露面，因此引起巨大的掌聲——以及蘇聯的記者。在前半小時中，我是在場的唯一的美國記者。隨後另外五個英美記者們趕來了，他們從莫斯科來的火車誤點太久了，甚至沒有時間容許他們到旅館裏去一下。

儀式很嚴肅，伴著國歌全體代表正式宣誓就職。做爲芮達主席的貝魯特，做爲委員會主席的莫拉夫斯基，和做爲總司令的季米爾斯基將軍都做了報告。四個政黨，各省以及各公共團體的代表，在簡短的演說中提出他們所以認爲現在應該成立一個臨時政府的理由來。一般都認爲芮達現在包括了波蘭人民各個階層的領袖，獲得了大眾的支持，並且表現出組織國家的能力。

我在解放區波蘭各地所過的八個星期使我知道芮達組織的內幕，並且使我能夠斷不同代表的各種要求。在我面前，我看見許多熟人，我知道他們的各種各樣的工作。

主要的人物彼此頗爲相得益彰。貝魯特，那安靜而敏銳的理論家，顯然是主要的政治頭腦。莫拉夫斯基則友善，可親，熱情，特別在工農羣衆大會上更是滔滔不絕，並且顯然很容易和人接

近，季米爾斯基將軍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軍人，敏斯博士則是一個經濟分析家，熟知波蘭的資源。那邊還坐著那漂亮，藍眼睛，生力勃勃的斯比卡爾斯基，華沙城市計劃部的建築工程師，游擊戰士，軍人，現在華沙普刺格的精力充沛的市長。旁邊做爲鮮明對比的是波若維斯神父，他是熱斯左夫省西達的主席，一個中等省份的省長。還有斯特拉却爾斯基，比亞利斯克省的省長，他在爲一個完全破壞了的城市工業的復興而奮鬥，並且是在所有各省中第一個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人。

在教育家中有斯克捷奇夫斯基博士，克拉考夫和索明大學的畢業生，他曾經把將近一百萬的小孩子送進學校，交給那些赤誠的教員們，這些教員，有些是赤着腳經過戰線而來的。還有拉比博士，前任勒佛夫大學的動物學教授，現在是盧布林新國立居里大學的校長，在這個大學裏，有從四個大城市裏來的教授們，設法靠記憶來教授科學和醫學，因爲德國人把大部份的書籍都毀壞了。還有金·開羅·文地，小說家和詩人，現在正自廢墟中爲新的公共圖書館蒐集書籍。

此外則是維他奇夫斯基，以前是羅茲最大的工會的書記和市議會的勞工代表，是一個已經有十二萬會員的工會的總書記。還有查瓦斯基將軍，目前正在按照着民主公民的理想負責來訓練波蘭軍隊。還有伯說，他對於組織農民委員會的能力使他一步一步地升到農業部最高的位置。還有莫

爾奇斯基，他在羅氏基金所建立的華沙衛生所工作了十年之後，又在全波蘭做抗傷寒的鬥爭，並且那之後變成森林中游擊隊的外科醫生。

波年青的代表，雅瓦斯卡，是一個二十二歲的漂亮女孩子——她看起來像是十七歲——帶着一個初入社交場所的女孩子的那種迷人而又甜蜜的微笑。看見她就令人想擁抱她，保護她。但是穿着她的上尉制服，她曾經坐在我的屋子裏，告訴我她如何同另外三個年青人，假裝在黃昏中踰牆和測情而把炸藥扔進德國的倉庫裏去。一年以前，她曾經做過非法芮達的青年代表。她也曾在機水深至胸部的下水道中奮鬥了一天多，以便把第一個關於華沙起義和起義者的佈置的正確消息帶給紅軍，目前她是各黨青年委員會的主席，和新政府的代表。

這只不過是我碰巧所認識的一些顯著人物而已。別的代表們在波蘭公民的其他部門中也有同樣的領導資格。經過一天的演說，他們一致通過組織一個臨時政府，這個政府將執行權力，直到波蘭被全部解放了而且新的普選舉行了的時候為止。

新政府的形式包括芮達·拿若多瓦，一個立法機構，其委員最後到達四百四十四個人，和一個執行內閣——即歐洲人所謂的「政府」和美國人所謂的「行政院」。行政院由立法院選出來的，並且對立法院負責，如同在法國和英國一樣。做爲芮達的主席，貝魯特的職務沒有行政的實

任，不像美國大總統代表一黨，他在官方責任上不代表任何黨派而作所有各黨的主席，如同法國的大總統或英國下院的發言人。

選擇除夕來宣佈臨時政府的成立，證明了政治上選訂時間的聰明。這不僅僅是第一次非法西連的週年紀念日，這也是六年來，波蘭人頭一次被允許可以舉行他們所珍重的集會的一個除夕。一百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慶祝的歡樂，來年波蘭全部被解放的希望，全都和對於新臨時政府的慶祝聯合在一起了。整個盧布林是在歡樂的心情中。

我們英美的記者們離開那嚴肅的萬徒會議而到一家戲院裏去，那裏一個有一千二百個農民的合作社大會在慶祝新政府。他們也爲羅斯福總統，邱吉爾，英美的記者們以及波蘭自由即將來到的前途而歡呼。那天晚上我們接連參加了三處宴會：一個政府的宴會，在那有大理石柱子的大廳中；一個農民的野餐式的宴會，那裏人們全站着吃三明治，因爲太擠了，不能坐也不能跳舞；還有一個軍隊的通宵的舞會。他們到處在吃、喝、跳舞、歌唱、高呼即將到來的解放。熱情是非常之高的。

在政府宴會中，那不能抑制的斯比卡爾斯基是最熱鬧的一個角落的中心。好像有幾個從別的城市裏來的人，曾經說華沙是那樣徹底地被毀壞了，以致十年之內不能用來做首都。但是從華沙

普利格來的代表團打算讓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們的城市可能被轟炸得很嚴重，但却仍然是波蘭的首都，並且在地圖上尤其如此。所以他們大聲地爲華沙以及一切與華沙有關的東西而乾杯。

第二天，斯比卡爾斯基很安靜地來到我的房間，並且講到我所久已期待著的關於那第一次非法尚達的事情，關於這次尚達，他負責了技術上的組織工作。「在華沙我常是太忙了，不能和你談，」他抱歉地說。「但是在這裏，並沒有那麼多的事情可做！」爲波蘭組織一個政府對於華沙市長的精力而言，簡直算不了一回事！

他談的如同他昨天晚上所說的一樣。「波蘭的人民覺得華沙是他們的首都。這就是爲什麼在德國統治期間，我們還有許多人留在華沙地下的原因。我們在那裏組織了第一支游擊隊，以它爲中心，新的軍隊聯合在一起。農民們到處組織隊伍和德國人作戰，但是只有當華沙發出指示以後，這個運動才成爲全國性的。這也就是我們爲什麼要在華沙組織尚達。拿若多瓦的原因，雖然在蓋斯塔波的鼻子下面，那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以爲選擇除夕是爲了使非法的會議可以在新年聚會的偽裝下來舉行，對於我這種猜想，斯比卡爾斯基笑了起來，「波蘭人甚至不能舉行新年聚會。我們所以選擇那個時間，是因爲蓋斯塔波將會舉行他們自己的聚會。」

「代表們從波蘭的各地到來了。他們路上不帶武器，以免檢查出來被槍斃。他們甚至不知道會議的地點。這一點只有我和另外一個人知道——這個人仍然在維斯杜拉河那邊「隱藏著」。」(後來這「另外一個人」就是雅爾，他在解放以後，成爲羅茲區的第一個省長。)」我們兩個把代表們一個一個地找來，並且把他們在下午五點至七點之間帶到會議地點，因爲八點鐘就戒嚴了，在那以後，只有帶着蓋斯塔波的特別通行證的人才可以在街上走。

「我們在房子裏有武器——由當地人民帶來的，他們比代表們較少危險。假如被發現，我們準備把我們的生命賣得貴些。那裏有農民黨，波蘭社會黨，波蘭工人黨，地下工會，無黨無派的民主團體，青年戰鬥同盟，作家團體，合作社團體的代表，還有人民自衛軍游擊支隊，民兵，農民黨，和內地軍的一些地方部隊的代表。我們開了一整夜的會。第二天早晨過了戒嚴時間以後，在五點半到七點之間，我們一個一個地走了出去，但是冬天的早晨仍然是黑漆漆的。」

那天夜裏，決議把分散各處的游擊隊組成一支人民軍，以便在紅軍到來的時候與它合作，並且組織地下的各地政府，準備在解放的時候取得政權。他們如何把他們自己組織到波蘭的生活中去，已經在本書的前幾章中講過了。

「在短短的一年中，這個非法的芮達·拿希多瓦竟發展成爲臨時政府，你不覺得奇怪嗎？」

這是我第二個問題。

「不，」他回答道。「我們計劃過，我們組織過，我們喚醒了波蘭的人民，這只是自然的結果。」

第十一章 華沙——首都

偉大的進攻像一隻只有一個樂章的交響樂似的開始了。一月十二日星期五，當沿着維斯杜拉河的巨大沼澤地凍結了起來的時候，考尼夫元帥的烏克蘭第一軍就從兩波蘭的三多米爾出動，突破敵人的陣地，並且在兩天之內前進了五哩。那以後他更以加速度向西掃蕩過去。

在星期天，兩個新的樂章被插入這個戰爭的交響樂裏去。另外兩支大軍攻向西去。朱可夫元帥的白俄羅斯第一軍——包括波蘭第一軍的幾個師——從中部波蘭維斯杜拉河西邊的橋頭陣地出動，並且在兩天之內佔領了拉多姆城和一千三百個有相當人口的地方。同時，羅柯索夫斯基元帥的白俄羅斯第二軍在北邊加入行動，通過那凍結了的沼澤地，在那裏，納由河流入維斯杜拉河。

一位波蘭軍官告訴我那連續突破九道防線的猛烈而集中的砲火。在他所在的那二公里內就有五百門大砲——每七呎一門。突破以後，裝甲的前鋒就急速地開上前去，在一處地方，朱可夫的

隊伍在僅僅壯烈的一天之內就前進了七十哩。步兵則利用各種工具日夜地跟上前去。工程師們迅速地修理了德國人所破壞的任何鐵路和橋樑。那朝著前線去的砲彈和汽油的不斷的宏流，使得全世界的軍事專家爲之震驚。

甚至像我這樣的一個平常人，在地圖上畫一畫，也不會看不出這些偉大的軍隊在他們那樣複雜的合奏樂中所做的驚人而膽大的行動。每一支軍隊發展成爲十幾個主題，忽然之間，又和其他軍隊的主題交纏起來了，一支軍隊也許會深入敵人的領土，使兩翼顯然暴露給敵人的要塞城鎮。正當德國人想切斷那顧前不顧後的前鋒時，一支援軍會從遙遠的地方開上來，包圍了德國的襲擊部隊，而最後把它擊潰。

佔領一個城市的典型戰略就是以極大的速度來迂迴它，好像朝著另外一個目的地，然後以一個大的弧形折回來，切斷那個城市後面的德國交通線，並且從那最想不到的一邊佔領了它。從西邊進入拉多母的紅軍部隊，發現德軍的參謀部正坐在他們的辦公室中寫命令。朱可夫的軍隊以暴風雨的姿式同時從北面，西面和南面佔領了萊沙——一個三面的進攻，只剩下敵人預料的東面。同一天，考尼夫的軍隊經過南波蘭到來了，繞過森斯多撒瓦——那個德國邊境上的要塞「聖」城，而從柏林的方向進了城。甚至在猶太人橋上的許多工廠中還有八千猶太人正在工作，這是在

波蘭所救出來的最大的一羣猶太人。隨後考尼夫的一支前鋒來了一個向後轉而進入歷史上有名的克拉考夫，佔領得如此的神速，如此的未遭到損壞，以致於它今天看起來還像一個完全沒有經過戰爭的城市。

同樣，朱可夫從那「錯誤」的方向上來進攻羅茲，一下子就拿下來了，絲毫沒有損壞。於是大部份他的軍隊向西北去了，顯然目的在土倫。剛剛到達個城市的外邊，它向左朝着拜哥斯基去了，其速度快得使德國人沒有時間來做有效的抵抗。幾天以後，羅柯索夫斯基自東普魯士以一個團對掃蕩來到土倫，取得另外一個進攻但澤的跳板。那以後，在波莫任尼亞的行動變得如此的驚人，如此的迅速，以致有個笑話說朱可夫和羅柯索夫斯基是「彼此互相包圍的專家」。

二月一日，紅軍正在攻打著奧德河中部的德國要塞城市，那時已經渡過南邊的河，並且正在威魯着在北邊斯德丁的河口，朱可夫的軍隊在不到三個星期的時間內前進了三百四十二哩。除了維斯杜拉河口的一小塊海岸——那裏但澤受到三面的攻擊——而外，全波蘭都已經被解放了。大多數西部的城市都由於迅速的進攻，未遭到損壞就被拿下來了。將近兩百萬德國人來不及拿走的煤，擺在西利亞的地面上。

在這個進攻中指定給波蘭軍的任務，也使波蘭的愛國者特別興奮。他們才是真正進入華沙的

軍隊。蘇聯軍隊在二十五哩的外面把首都包圍了起來，一面切斷德國的交通線，這時，在普利格四十哩長的前線上的波蘭第一軍渡過了維斯杜拉河，並且急風暴雨一般地從北面而南而進入華沙城。波蘭軍也做爲前鋒突破那著名的波莫爾茲克屏障而進入波莫任尼亞，到達斯德丁與柯爾柏格之間的波羅的海，並且沿着海岸掃蕩過去，佔領了柯爾柏格這個海軍根據地，那裏曾造過好幾個德國的袖珍戰艦，這些勝利對於波蘭人有着特別的意義，波蘭人和德國人曾經爲了那個海岸戰爭了一千年。

波蘭的裝甲部隊和紅軍步兵一起佔領了蓋尼亞和但澤。「我們的軍隊佔領了在但澤的市中心，」季米爾斯基將軍後來告訴我，「並且在市府大廳上掛起波蘭國旗。」

當飽經風霜的波蘭第一軍在戰爭中謀了頭角的時候，波蘭第二軍遂從它的訓練營裏調出來，並且擔任了波蘭大城市的警衛責任。羅茲，庫特諾，波茲南，克拉考夫和卡多維斯等處的警衛工作很適當地交給了波蘭人。兩個月以後，波蘭第二軍進入它第一次的戰鬥，渡過尼也薩河，在考尼夫元帥指揮下面，準備着向柏林的最後進攻。勳員並且訓練了九個月的期間，他們以一種波蘭人特殊的銳氣和冷靜的英勇來戰鬥。

「在猛烈的砲火下面，我們第一軍的士兵們渡過奧德河，而我們第二軍的士兵們則渡過尼也

薩河，「季米爾斯基將軍說，但是他們好像在做勝利的檢閱似的，以河水當做香檳而爲勝利乾杯。他們在河邊插上小旗子，上面寫道「這裏就是波蘭的邊界！」後來在米可夫的部隊中，波蘭軍是第一個進入柏林的。

華沙剛剛一解放，人們就開始自各個方向徒步或坐車回來。他們來尋找他們的家，但是發現家已沒有了，只有破爛的牆壁和一堆堆的磚瓦。他們挖掘地下室以便拖出他們可憐的財產——破桌子，搗爛了枕頭，血污的墊子。他們站在街上，充滿了悲哀。他們走來走去，尋找舊時熟習的地方。什麼也沒有剩下。華沙做爲一個城市來講已經不復存在了。德國人曾花了四個月的時間很有效地來破壞它。

以前曾經一度是歐洲最有生氣的一個首都，幾乎是一片荒涼了，比失去了的邦貝伊或、次亞叙安的挖掘物還要壞一些，因爲剩下的人類就活在其中。一個人不能在任何一條街道上走得很遠，所有的路都被障礙物和倒塌了的建築物堵住了。中央車站已經陷入破壞了的地道中，有些地方比街道面還要低。城市大廳和歌劇院只剩下破碎的牆壁立在空中，精緻的教堂，宮殿和歷史紀念物——老波蘭王的城堡，奇格蒙國王，哥白尼和薩邦的紀念像——只是一些碎片和記憶了。那

些巨大的工廠——一度會和全波蘭四分之一的工業共同轉動着——只是一堆沒有用的鋼鐵與破磚了，沒有水，沒有電，沒有瓦斯。甚至連下水道都堵住了。在雪底下深藏在在充滿了破爛東西的地下室裏，還有上萬的死屍，許多屍首在被挖出來以前會爛到只剩骨頭架子。

一月十九日，解放之後的兩天，在廢墟當中舉行了一次波蘭軍的檢閱。步兵，砲兵和坦克經過那匆忙中搭起來的檢閱台，檢閱者有大總統貝魯特，首相莫拉夫斯基，和總司令季米爾斯基，好幾千人民已經回到了華沙。他們擠在檢閱台的四週歡呼。甚至在冬天裏還找到鮮花來裝飾這個場面。在歡呼中，一個女孩子給季米爾斯基將軍獻上一束花。

政府隨後視察破壞了的地方。莫拉夫斯基以前會居住過的那個公寓的院子裏，有許多帶十字架的墳墓，包括一座小孩的墳。貝魯特以前的房子仍然站在那裏，裏邊的東西被搶光了，這所房子位於德國最後佔領的那一部份市區。藏在房子裏的一堆地下印刷品尚未被蓋斯塔波所發現。在宣佈了儘快把政府移到華沙的打算以後，貝魯特和莫拉夫斯基動身做一次新解放地區的兩個星期的視察旅行，別的領袖們則被送到不同的城市中去組織市政府。在大多數的情形下，他們回到他們自己的家鄉城市裏去，或是回到那些地方，他們曾經長期住過的，但是在德國佔領期間被趕了出來。

二月初我和一羣英美記者到華沙去。這是我在波蘭所做的最困難也是最不舒服的一次旅行。前線的需要佔去了全國的運輸能力，總統貝魯特告訴我，他們在全波蘭只有五百輛自動車和卡車供平民之用。幾十萬的人民正在用雙足，自行車，馬匹或任何可能的車輛回到他們的田地和城市中去，從這些地方他們會被趕了出來。這種人口的移動把所有住人的地方都擠得透不過氣來。

坐在一輛無蓬的卡車上，在一個冬天的夜裏走了一整夜之後，我們在早上五點鐘到了華沙，又冷又疲倦，我們發現沒有一個人來接我們，並且也沒有可用的床舖。前一天晚上本來定了幾個房間的，但是每一個人都以爲我們留在盧布林了，由於缺乏供一般用的電話，使我們不能事先通知。所以我們的房間已經給了貝魯特總統和莫拉夫斯基首相了，他們已經從新解放了的西部地區旅行回來，並且大約比我們還更精疲力竭。我發現他們兩個帶着他們的兩位秘書，共同住在這個臨時政府旅館裏的一間狹小而沒有火的屋子裏。

貝魯特警告我說：「我們既不能保證你的便利，也不能保證你的交通工具。假如你到達任何一個波蘭城市，你也許得停留幾天甚至幾個星期。我們自己正在設法取得去盧布林的交通工具，但也不敢說什麼時候能够安排好。」

我到斯蒂方尼的屋子裏去看「我的床」，但是有一位面生的軍官暫時住在她那裏。她把自己的床讓給我四個鐘頭，在那以後移到政府飯店，和五個記者佔了一個房間，男女住在一起。天氣是這樣的冷，我設法穿着我的毛衣和棉大衣再加上旅館裏的厚棉被來睡覺，但是兩個鐘頭以後，我就醒了，凍得直發抖，因為那被褥所漏了的棉被的冷氣甚至穿透了大衣。房子裏沒有一處有自來水，並且實際上沒有任何衛生設備是可以用的。一個軍隊發電機供給每個房間一盞電燈——對於那些時間不夠而工作到深夜的軍官們的一種特許。

以這個累人的地方為基地，在被壞了的華沙做了兩天的巡視以後，我覺得我的健康快消磨完了。上百萬的波蘭人甚至正在忍受比這更壞的情況，但是在一個沒有設備，並且每一個人都被前線的需要所佔去的地方，讓我得了肺炎是不會對任何人有好處的。正在那最緊急的時候，我們動身到羅茲去，還是那些實際上沒有被損壞就被紅軍所拿下的城市中的一個。發現那大旅館有暖氣，有冷熱自來水，還有全班的僕役，正如同二十四年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我代表美國友人服務社住在那裏的時候一樣，真令人為之一驚。打開我那更衣室，我發現了某一個叫阿非爾保慕博士的衣箱和寄籍。一個德國的經濟統制者離去的時候太匆忙了，以致來不及收拾他的東西！羅茲的許多旅館在我們到來的不久之前，還在奉迎德國人。

在大旅館的三個星期之中，我每天都看見內閣裏的部長們自華沙到來，顯然是在給他們的職員找辦公室和住的地方。他們也是到了華沙而發現它超過了他們所能忍受的限度。他們口頭上把華沙做爲總部，但並沒有自信。我覺得那時候它只能象徵着首都而已。華沙就是一堆破磚亂瓦，沒有人能在那裏生活和工作。羅茲則是方便而舒服的。

雖然，過了最初的幾天之後，羅茲就日漸陷於饑餓，德國的高級統率部，預料快要撤退，實際上沒有給這個城市留下任何食糧。市民們正在依靠着他們馬鈴薯的冬季儲藏而生活，沒有肉，黃油，牛奶，甚至沒有麵包。按照維他奇夫斯基——他已經回到他的家鄉城市做了臨時市長——的指示，他們正自鄉間蒐集食物。但是農村地區也同樣在混亂中。波蘭的這一部份曾經併給德國，並且波蘭的土地也給了德國移民，他們趕走波蘭居民，並且把幾塊波蘭土地合併起來做成一塊「適當的德國田莊」。現在這些德國人正在逃走，而且波蘭人正在徒步回到他們的土地上來，這裏他們的牲口也走散了，甚至他們的房子也常常不見了。同時，羅茲的最後的三輛牛奶卡車也到前線去了。

我的朋友佛蘭克在土倫尋找汽車的故事，把在一個巨大前線後方的地方政府產生時的痛苦給戲劇化了。這個年青的工程師——在我第一次來奧布林的外交車上的奧肯斯基的助手——現在是

市政汽車運輸的負責人，正在拚命地尋找卡車。冒着生命的危險，他和九個武裝的人和一個蘇聯連絡官，緊跟着紅軍的後面在尋找德國人扔下的汽車，整整三天他發現他自己在一個無人地帶裏，那是土倫的郊外，朱可夫迂迴過去了，但尚未被羅柯索夫斯基拿下來。德國的部隊很近，但他們的位置却不知道。佛蘭克，帶着九個武裝的人，佔領了那郊外地區，從居民中間組織了一支波蘭民兵，找出重要的倉庫，並且派上了衛兵。他找到並且徵用了三十輛卡車，但必須回到羅茲去拿汽油來把它們開走。

佛蘭克剛剛說完了他勝利的經過，他的蘇聯連絡官闖進屋子裏來。在第一句問候的話之後，他說出土倫的新軍事指揮官最後到達了他那個郊外地區，把那些看守軍用物資的良好民軍誇獎了一番，然後解散了他們，拿去了二十八輛卡車！

佛蘭克的肩膀垂下了一會，但他很堅強地恢復了過來。拍着上尉的背，他說道：「那好極啦！從紅軍得到的正式稱贊！這比他們在羅茲或許多別的大城市裏所得到的批評可好多了！毫無秘密可言，羅茲的第一支民兵包括了許多流氓，並且必須加以清洗。」

「那麼你的三十輛卡車呢？」我很惋惜地問道。

他蔑視同情。「我的二十八輛卡車已經去佔領柏林去了！佔了柏林之後，我們將有論千的卡

車。」

當佛蘭克因爲前線更大的需要而接受了這次卡車的損失，一面馬上開始工作，把他那麼被燬的交通工具加以最大利用的時候，他的一個助手却正在利用這個情況謀他私人的利益。在解放後的第一個星期，佛蘭克派他到羅茲去組織運輸。坐著政府的卡車來了之後，他利用逗留的時間，以兩個技羅梯（紙幣）一雙的價格收買被丟棄下來的德國長襪。在盧布林賣出，這裏公開市場上的價格是一千茲羅梯一雙，一個星期的工夫他毫不費力地發了大財。

「我到盧布林一定把他關到獄裏去，」被激怒了的佛蘭克說。

「用什麼罪名？」我問道。「謀利在波蘭並不禁止。也許你可以告他把你的卡車做了不正當的用途。」

戰爭給營利者以最好的機會。在極小的一個地區內就有兩種貨幣，其中一種——德國馬克——正在迅速地快貶到一文不值了。有兩種價格的標準，變化都很大，更不用說一種標準之內的混亂了。小的投機商人發現自盧布林設法到羅茲，甚至花上兩天的時間都是有利的，只要把東波蘭的幾磅黃油到西邊去換幾雙長襪子就夠了。他們正在往那少數的貨車上擠這些車輛開始在修理好了的鐵路上行駛了。他們正在把那些設法回返家園的農民流亡者擠了下來。這些個人正在墮落

那別人正在辛苦地織着的社會生活的纖維組織。同時他們也是對政府的一切舉動第一個發出怨言的人。

戰爭也表現出愛國主義來。羅茲的電廠在德國人離開的那個早晨就停頓了。德國的高級統率部曾經使它沒有一點煤。羅茲工人們親自從他們自己的家裏背出煤來使城市重見光明。鐵路工人們則急忙修好到西利西亞的路線來保證不斷的供應。在西利西亞，礦工和鐵路工人已經餓了好些日子了，但是他們繼續挖着煤並且運着煤。在解放區波蘭，到處有教員，圖書館員，公務人員和市民志願者，全憑熱情而不靠食物幾小時地工作着，或徒步經過鄉村走了很遠的路程來做一些公共工作。

當這些日常的愛國者，和這些辛勤工作而無所要求的市民們用勞動來重建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破碎了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每個人都日益清楚了那羣首長——由於在盧布林六個月的共同工作而團結在一起，並且現在正在組織臨時政府——正在掌握着這論千的人，而這些人則正在掌握着土地。

我很快就看出，日子一長，那些像我一樣的跑到羅茲或其他舒服的城市的公務人員們，正在

沒有例外而不感覺後悔地拖回華沙去。他們有些人把他們的家庭和一個辦公職員安置在其他有房屋設備的城市裏，在那裏，他們有時可以回來洗一個澡並且好好休息一晚上。但華沙才是他們的中心。華沙才是首都，不是在象徵的意義上而是在實際的意義上。所以我回到華沙去，以便找出其原因。

我坐了維他奇夫斯基的汽車回去的——臨時在別人的汽車上找到一個位子，是人們在那些日子中能够走路的唯一方法。他也放棄了做羅茲市長的舒適而到華沙去建立波蘭工會的總部。我們沿着一條曲折的路穿過這破亂的首都，這裏街道已經清理過了，並且標着箭頭。我們剛好在薄暮中，在那進入普刺格第一座固定的新橋上過了維斯杜拉河。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數量那樣驚人的車羣，不斷走過那剛剛完工的橋，帶着嬰兒，背包，門框，窗戶，廚房用具，椅子——從上幾萬被蹂躪過的家中所拯救出來的東西。那是一個可怕的多麗，但見在一個永恒的擁擠的人類行列中，人們永無休止地在進行。

這一大羣悲慘的人類，疲倦地但又固執地移動着，流向東去，進入那已經擁擠不堪的普刺格。他們都是從家裏被驅逐出來的華沙市民，那時德國人正把這個城市有系統地破壞了四個月，轟炸它，並且一間一間房子地燒它。現在回到家裏來了，他們發現在西岸的主要城市是被毀掉

了，所以他們過河到普刺格的郊外去，以便扶棺在地下室裏，或者睡在朋友們的地板上。每天早上，他們去到那可親的廢墟上去挖掘和搶救。每天晚上，他們回到普刺格以便維持能夠活着。

爲什麼政府不放在羅茲，克拉考夫，或卡多維斯去呢？這些地方全是良好的大城市，有辦公室建築，公寓和旅館。現在我知道這個答案了。此時此地，在華沙正進行爲了團結全波蘭生命的最後戰爭。希特勒會決心要永遠毀壞這個波蘭歷史和文化的中心堡壘。希特勒會毀壞了物質的華沙。但華沙並沒有死。這些廢墟的難民就是華沙。華沙是受傷了，但是只要他們回來挖掘，它就依然活着，但是假使他們分散了，並且在比較舒服的城市中生下根，那麼華沙就真的死了。從來不會再有像此時地這樣的重新建設的意志，但是除非波蘭政府支持他們，使他們成爲全民生活的中心。沒有東西能使這幾十萬的人民堅強生活在這艱苦難中。

政府來到華沙，因爲全民族生命的持續要比舒服，效率或健康更加重要。它來了，爲的要向納粹破爛的企圖挑戰，並且要戰勝這個企圖。它來了，因爲華沙是一個中心，圍繞着它全波蘭會恢復起來。羅茲和克拉考夫的市民們，不顧他們自己的饑餓和需要，已經正在給華沙送來禮物。

華沙是一個政府，立足在一個開始建設的地基上，這個地基處在所有那些無家的難民中間。公務員睡在沒有彈簧的小床，桌子和地板上，一天只從某一個公共食堂裏吃一頓飯，此外帶着一

塊麵包作爲另外的一頓飯。他們把每天必要的工作裝在小箱子裏，從一個空空的辦公室帶到另外一個辦公室。他們經常在修理，並且經常在移動。

那時候政府總部是在斯尼奇亞——雪街——在一座憔悴的四層樓的建築裏，四週全是正在融化的雪和泥的海。在門口的一對波蘭兵，一路澆着雪泥把我送到一間木頭小屋裏去，在那裏，我得到一個進入大樓的許可證。若干粗糙的木製樓梯引到許多擁擠的屋子，那裏面內閣部長們和數量比較少的公務員們都坐在木凳子上，俯在未會油漆過的破桌子上辦公，在二層樓上的一間小廚房裏，那個在盧布林食堂會不斷供給我牛奶的母親似的人，現在和另外三個助手，準備着一天的一飯，包括湯，肉，馬鈴薯和裸麥麵包。在大樓裏面的政府僱員們，設法在十二點到三點之間到廚房裏去，並且把他們自己的飯盛在一個盤子裏帶到他們工做的桌子上來。

我去找代理外交部長伯爾曼。他曾寄信到羅茲告訴我說這是「來華沙的時候了」，信裏說負責給我找一張床。帶著惘亂的臉色他說道，波蘭社會黨正在開一個週末大會，並且佔了政府旅館裏所有的床舖，和辦公室裏大部份的桌子。我很神氣地告訴他說，絲蒂方尼有那個特別給我預備的床，並且住在她的那個軍官大概早就走了。

「我恐怕你不能靠絲蒂方尼了，」伯爾曼帶着苦笑說。「我和我的妻正佔着你那張床，並且

絲蒂方尼已經找到她那十歲的女兒，她正和她的母親共同睡一張床。」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到絲蒂方尼遺失了的女兒，她把她的煩惱一點也不告訴別人。最後，我在民主黨的總部裏找到一張舒服的床——那就是我們曾經有過一次宴會的那座房子。只有八九個人住在兩間相當大的屋子裏。

兩天之間我拜訪了伯爾曼三次。每次我發現他在一間不同的辦公室中。第三次我很高興地看見他有一間單獨的屋子，裏面有一張真正的桌子，兩張爲客人用的有靠背的椅子，和一張小桌子，不知什麼人剛剛喝過茶。

「我看出你們爲外交使節們預備了一間屋子，」我開玩笑地說。

「這是貝魯特總統的辦公室，」伯爾曼微笑着說。「他生病了，所以我今天在用它。」

許多我的老朋友在斯尼奇亞這座樓裏，其他的一些則遙遠地散佈在波蘭各地。金·文地和斯克捷奇夫斯基博士在克拉考夫，查瓦斯將軍正在西利西亞組織軍隊，那可親的奧普斯基則在但澤和查尼亞，正在建築一個巨大的聯合海港。帶着痛苦的心情，我知道我將再也不會在一個地方一起遇見我在盧布林所認識的那些朋友了。在那個小食堂裏，生活是如此的接近，但是那些委員會大樓裏面的人物已經跑到全國各地去了。他們再也不會完全重新聚在在一起了。

同時，我也知道我自己也沒有在那華沙擁擠的住處多住一些時候的權利，除了簡單地了解下將來華沙的計劃。所以我訪問了城市設計處的四個建築師和工程師，並且他們告訴了我重建該城所必經的幾個步驟。

第一個需要是若干大路，以便運進糧食來。紅軍，加上志願的「華沙重建者」縱隊的協助，造成了維斯杜拉河上的最初的幾座橋。一月二十七日，解放後的第十天，一座五分之三哩長的鐵路橋樑已經把物資運到前線去了。四天之後當我們記者團第一次到達華沙的時候，我們看見三座爲了行人和汽車的臨時的橋，搭在浮船和冰上。當二月中化冰的時候，第一座固定的深水橋已經爲一般的交通準備好了。那就是我和卡西米爾經過的橋。同時「華沙重建者」縱隊——現在由市政府發給經常的薪水了——在華沙的街道中間清出一條路來，這些街道好幾個月以來都爲障礙物和倒塌了的房屋所封鎖著。我們所走的那條曲折的路每天都在改變，因爲更多的街道被清理了出來。

「這使得那些在廢墟中住着的人民能够去取水 and 食物。除了那每天渡河到普刺格的人們之外，住在西岸的人已經登記了五萬人了。」

我訪問了一個十三個人的典型家庭，住在一間破碎的地下室裏。他們用大小不同的烟突管子

按裝了一個鐵爐子。爲了光亮，他們在破牆上面鑲了一塊玻璃。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他們沒有電的希望。

「我們不能把這些分散的廢墟中按上公共設備，」建築師們解釋說。「我們將把水用管子送到若干中心地點，從這些地點，他們可以取水回家。我們必須把我們最初的精力集中在那適於居住的地方可以很快恢復的地區。」這樣的一個地區在耶路撒冷大街的南邊，大約離河有一哩遠。這裏有幾條舊的房子尚比較完好，德國人會一直住到他們撤退之前。計劃着要把這塊地方很快地翻爲「政府城」，以便四萬人民——公務員，他們的家庭，和供應他們需要的商人們——可以舒服地生活並且有效地工作。在一個可怕的細節上包括清理一個仍然察有一千死屍的下水道。起義者和市民當他們企圖從莫科多夫逃到河邊去的時候，被德國人用毒氣毒死在裏面了。

「光是清除破爛東西以便準備建設新的「大華沙」就需要十萬人工作兩年之久。我們希望德國賠償勞工來做這件工作。我們正在準備着一千個可移動的營房，每個可以容納一百個勞工。」

驚異於這件清理工作的龐大，我問道：「另造一座全新的城市會不會還要容易一些呢？」他們給了一個否定的回答。華沙的位置是非常合適的。由於這合適的位置，人類自從新石器時代就住在這裏——這是維斯杜拉流域最好的地方，兩邊都是乾地，沒有沼澤或其他自然的障

礙。今天鐵路和公路網全集中在這裏，這個網是已經造好了的。這不是一個可以放棄的城市位置。

「還有，一個城市最大的花銷在地下的下水道，水管和瓦斯管，以及建築物的地基。這些損壞得比較少，並且它們的價值十足可以抵償清除地面的花費而有餘。廢墟本身就包含有許多建築材料，就在現地而不要運輸，運輸今天也是我們的一個受限制的因素。此外，我們蘇聯的朋友們——他們答應負責一半的技術工作和材料消耗——已經在斯大林格勒和其他破壞了的城市中，發展了許多新的技術來利用那些半破的牆壁，這些牆是以前的工程師們必定要拆掉的。他們在許多地區的估計數字已經把能夠再加以利用的牆壁增加了一倍的數量。」

於是他們用了實用的工程上的術語談到開闢這一大通荒涼的問題——也許是我們這個地球上最大的一堆廢墟——在它下面仍然埋着十幾萬屍首。藉着軍隊所供給的電燈光，在那擁擠的地下辦公室中，他們平靜而仔細地在過去的死亡上面計劃了他們將來的首都。

「它將比以前要好得多了，」他們預言道。「當波蘭還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時候，戰前華沙在十九世紀自工業方面發展了起來。工廠，住宅，和公共建築全混在一起了；那時沒有做爲一個真正良好政府中心的準備。我們將在華沙同時有一個政府和一個巨大的工業，但是在不同的區

城：一個巨大的政府中心在河邊，工業區域在西邊沿着鐵路，住宅區在北邊和南邊，隔着綠色的公園地帶和政府區及工業區連了起來。破壞的徹底性反使我們的計劃更容易些。

「兩年以後，華沙將來的輪廓就該可以從飛機上看出來了，那時被燬清除了，並且有綠色的小樹標出林蔭路和公園來。那以後我們不敢說還需要多長的時間來建築它。這要靠許多事情，不僅靠波蘭，而且靠我們戰後的整個世界。」

「在華沙的西岸我們有四十八盞街燈了，」五月間在莫斯科的波蘭大使館裏，莫德奇列夫斯基大使同我誇口說。「現在人們可以在夜間經過廢墟找到他們的路了。」

適當地評論了四十八盞街燈之後，我們的談話轉到國際局勢上去。柏林已經陷落了。波蘭的軍隊和紅軍已經在敵人的首都豎起了他們的旗幟。聯合國正在舊金山開會，那裏因為波蘭的未能參加，使得她被辛辣地討論着。在倫敦，波蘭流亡者的各種團體正在經歷着連續的政府危機和黨派分裂。

「在波蘭，我們的問題頗為不同。我們有些城市尚沒有足夠的麵包。我們有許多鐵路要修，我們一定要使工業不致停頓。運輸仍然是一個難題。上個月我們主要的問題是把糧食運到鄉下去，

把土地給農民並且來鼓勵他們，供給農具，以便他們可以耕種。我們已經把我們大部份的土地順利地播了種，有一次相當的收成，我們就過得去了。做爲一個大使，我自己的主要問題——在草約所需要的這些外交拜會和歌劇院之外——是從蘇聯運送大約兩百萬的波蘭人，主要是從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但也有運至中央亞細亞和西伯利亞的難民。

我們嚴重的需要波蘭的團結，以及許多有效率的工作者。我們不需要那些復活與蘇聯的舊糾紛或重提地主問題的人。我們一定要安定下來工作。」

「整個歐洲一定要安定下來工作，」我補充道。

「是的，歐洲——以及全世界。但是除非波蘭先安定下來歐洲是不能安定下來的。我們是在歐洲的中心。若干世紀以來，波蘭的任何不穩定都擾亂了歐洲的穩定。波蘭封建地主對於土地的貪婪，以及他們多變的同盟者不僅僅使波蘭動亂；他們在整個歐洲引起不安。戰前柏克的許多親法西斯政策，給第二次世界大戰開了綠燈。仍然支持這些政策的波蘭人，就是今天對於同盟國講調的一個主要威脅。一個安定，民主，和蘇聯以及西方民主國都友善的波蘭，不但對於波蘭人，並且對於世界和平都是首要的。」

「一座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橋樑，」我試探着說。

「不是，不是，不是一座橋樑，」他反對道。「可以說是位於交叉路口上的一個舒服的家！對於隣人和友善的來客都熱誠的招待。」

他的笑容好了一些。因為一座橋是造來可以自兩個方向來踐踏的，但是一個家却是一處親屬居住的地方。

第十二章 他們站在一起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星期天的早晨，許多樂隊的音樂和耀眼的旗幟把華沙廢墟上的一塊空地給改變了。在那從前的劇院方場上，現在破磚爛瓦都清除了，幾萬慶祝的人民站上了隊，他們擠到市府大廳塌下來的那一邊的破磚堆和灣曲的鐵架子上面。更高一些，他們爬到突出的架子或鐵標上，以便搶先看一下三天以前在華沙成立的「團結」的新政府。

我是乘專機而來的聯合國——美國，英國，蘇聯，和法國——的二十餘位記者中之一。這一天全世界的視線都在看著華沙。我們知道這一點，方場上的羣衆知道這一點，六個電影記者也知道這一點，正急忙地把這歷史上的一刻記錄在他們的膠捲上。

自從民族解放委員會在盧布林建立了在解放了的波蘭領土上的第一個事實上的政府起，差不多一年已經過去了。新波蘭的委應已經在出現，這些曾經在本書中描寫過了。臨時政府已然在華沙執行了五個月的職務，並且爲蘇聯所承認。但是波蘭仍舊是一個國際問題，因爲在倫敦延長了

生命的流亡政府——仍然爲英國和美國所承認的——繼續在散佈惡意的中傷。這種不安的局面延遲了波蘭的內部重建，並且擾亂了每一個人，特別是戰爭的末期，在同盟國所控制的領土內解放了大約二百萬的波蘭人，他們只能通過國際間的協議才能回到家裏去。在幾個月的冗長的討論之後，最後總算獲得了那項協議。

解決的路線會在二月初的雅爾達會議中獲得。比波蘭更大的強國爲了他們自己戰後的安寧，須要看見「波蘭問題」的解決。三巨頭——羅斯福，斯大林和邱吉爾——當紅軍正在解放波蘭最後的一塊領土的時候，會獲到了一個協議。一旦這個華沙的臨時政府容納了波蘭國內外的「其他民主份子」——由三強的一個波蘭委員會所建議的條件——則大家保證完全承認這個擴大的臨時政府。

這個新的「全國統一的臨時政府」現在已經建立了起來。主要的職務仍然由那些老人所擔負，這些人的領導我已經差不多觀察了一年。貝魯特仍然是青遠的主席。莫拉夫斯基仍然是內閣總理。當我們集合在公開介紹新政府的那個方場上的時候，我看見許多本書所描寫過的老朋友。但也有新的面孔——這些面孔使這個政府爲華盛頓和倫敦所接受。米柯拉茲克自倫敦來到，做了副總理和農業部長。金斯坦奇克，和他一起來的一個P.P.S.（波蘭社會黨）的老黨員，做了新的

勞工部長。格拉布斯基，一個老年的個人主義者，一度是社會主義者，現在則是保守的民主份子，做了芮連的新的副主席之一，另外一個副主席則是年老的維多斯，做過好幾次戰後波蘭的總理，但是因為他的健康在德國佔領期間被損壞了，他不能參加這次華沙的盛舉。

爲通訊員和電影記者們所跟蹤着的政府人員，都走上那一半破損了的歌劇院的二層樓露台上，並且向方場上的羣衆演說。大家都強調全國團結的必要，爲了波蘭自己的復興，同時也爲了使波蘭在戰後各國中間成爲和諧的一環，而不是一個不和諧的音符。

在灰色的天幕下站着領聽着的人民。農民黨的綠旗，波蘭社會黨的紅衫和紅領結，和帶着一面白一面紅的旗幟的波蘭工人黨站在一排。更左邊我看見我所熟識的文德爾糖菓廠的女工們，她們會一路從普刺格徒步走到這裏。在羣衆四週的那些裝飾過的卡車上站着「華沙重砲者」縱隊，提醒大家知道，這個破壞了的首都的重建工作是不斷地在進行着。

每個人都在唱國歌——「波蘭沒有亡」。每個演說的人都受到歡呼。一陣陣猛烈的急雨淋濕了那些旗幟，但是沒有阻喪人們的精神。他們向新自倫敦來的人們歡呼，一部份由於這些人的人格，大部份則是由於他們的在場所象徵的新的團結。歡笑的女孩子們穿着波蘭民族的花衣服，帶着在淪陷期間差不多藏了六年的珠子，圍在禿頭而滿面紅光的米柯拉茲克的身邊。農民黨的強

壯的青年人們用一個足球啦啦隊的節奏喊着「米——柯——拉——茲——克，米——柯——拉——茲——克」。

不管以後會發生什麼樣的內部鬭爭，這一刻却是過蠻月時的樣子。新的政府人員顯然高興回到波蘭的家裏來，同時政府裏邊其他的人也高興要他們回來。

「我要求所有的波蘭人，甚至那些到現在還站在一邊的人，都出來並且爲波蘭的重建而工作。」米柯拉茲克同時在號召那些曾經支持過以前的政府以及曾經反對過它的人。並且兩派人都在向他歡呼。「爲了團結」他曾三次從倫敦飛往莫斯科的傳說，已經在散佈着了。只有那些更世故一些人了解到他的固執曾經延遲了協議的獲得，並且他假如在九個月以前就接受了貝魯特的請求，他本就可以做了總理，並且使波蘭免去許多苦難。這已經是晚了，但晚了總比永遠不接受要好些。

巨大的收穫是波蘭再也不是一個國際爭論的中心了。可以馬上獲得承認，和外國建立穩定的關係，以及經濟上的救濟。

統一的政府馬上開始行動。總部已經爲新部長們指定了，是在普刺格的一座爲戰爭所破壞的灰色建築物，它目前是政府的所在地。政府已經自我三個月以前所見的那條擁擠的雪街移出來

了。它的部門正在擴大着，一座建築又一座建築地增加着。衛生部，商業部和交通部已經在西岸有了新修好的房子，別的部在更多的房子修好之後將馬上搬進去。

我們坐飛機做一次波蘭的旅行。到處——在西利西亞，在克拉考夫，並且北到波羅的海——我都碰見從盧布林來的老朋友，現在正在更廣大的規模上工作着。

在卡多維斯，我和查瓦斯基將軍共進早餐。他現在是上西利西亞的省長了——這地方是波蘭煤炭和鋼鐵的王國。這裏加上以前德國的西利西亞，波蘭具有中歐最主要的產煤區，有六百萬萬噸的儲藏量。新的省長希望在挽救歐洲的饑饉上，西利西亞要扮演一個戰略上的並且有利的角色，只要能從德國的什麼地方取得足夠的運煤車，因為全歐洲大陸上的車皮都堆在德國。

「一個禮拜之內，在我們得到足夠的車輛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到充份的產量，」他告訴我。「因為紅軍的迅速前進，再加上波蘭礦工英勇的保護，每日產量將近二十五萬噸的八十個大礦，完好地被救復了。由於阻止德國人水淹煤礦，許多礦工自波蘭政府得到勳章。」

在許多糾纏着的生產問題中間，查瓦斯基看起來比在盧布林更年青一些，並且特別更快活一

些。當我告訴了他這一點時，他笑了。

「我是一個煤礦工人，並且我終於回到老家了！我加入了軍隊來解放我的國家。我從斯大林格勒打到西利西亞，並且我從下士升到將軍。但是在我們解放了西利西亞之後，我甚至等不及去佔領柏林了。我要求政府讓我動手去開煤礦。」這位將軍和戰前波蘭的「上校制度」是多麼大的信賴柏林呀！他誠意地拋棄了他的波蘭軍副總司令的職位而為和平來組織生產！「我可以不可以一個對比呀！他誠意地拋棄了他的波蘭軍副總司令的職位而為和平來組織生產！我可以不可以指給你看看我開始做礦工的那個煤礦？」查瓦斯基繼續說。「我那架老機器沒有在工作，但是它還仍然在那裏。」

於是我們開車經過那些沿着郊外電車的像匹次盤似的煤谷和鋼鐵城市，並且來到「巴黎煤礦」，所以這樣叫的原因是因為它以前屬於法國的資本。礦工們會要求過把它改名為「查瓦斯基將軍煤礦」，但是這位將軍，告訴他們說：「你們的產量如何？我還要在西利西亞保持我的名譽呢。不能把我的名字叫在一個二等的礦上。等你們在這個區域裏贏得第一等的時候，再來找我談。」

在巴黎煤礦中礦工們圍繞了他，並且那些「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和他談的」老礦工們拍拍他的背，一面叫道，「在西利西亞，我們現在是佔第二位了，我們要擊敗的只有一個西納煤礦了！」

隨後他們告訴他，他們已經把他的老機器修理好了，並且重新在使用它。

這之後除了下到礦裏去看看查瓦斯基的機器而外，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了。將軍開着它前後走了一下，於是揮揮他的衣服，微笑了。「記下來，我仍然能够依靠誠實的勞動來過活，假如我必須這樣做的話。」

「你坐在那個位子上是多久的事情了？」我問他。

「二十二年了，」他說道；跟着又回憶地加上說，「因為反對皮爾蘇斯基式的政府，其中有十一年是在波蘭的幾個監獄裏過的。」

自礦上回來的途中，查瓦斯基指給我那座撥煤的地方監獄，他說在那裏他開始了他的監獄生涯。當我問他會屬於那一黨的時候，他的眼睛亮了起來。「民主黨」他笑了。「現在我們在波蘭有四個民主的黨派了，但那時候却只有一個！」

我在那個煤和鋼鐵的王國家呆了三天，那裏大約有三十個公司，其中摻雜了許多戰前屬於外國資本的煤礦。德國人奪取了所有這一切，強迫外國的礦主按照德國的價錢出賣。他們在礦裏使用奴隸勞工，包括蘇聯和英國的戰俘。查瓦斯基的巴魯煤礦中，他們曾有過五百個英國奴隸。現在這些礦已經做為戰利品直接屬於波蘭政府了。任何非納粹的礦主，在過一切事變之後，如果

尚能提出他應得的股份的時候，可以得到最後的考慮。這是在東歐紅軍所解放了的土地上的一般政策，做為清算納粹所有權以及使工業重新繼續進行的最快的方法。

西利亞的煤礦分爲十個管理區，每區有一個主任，一個生產經理，一個營業經理，由工業部長——我們的老朋友敘斯教授——派來的。每區所選出來的工人委員會在生產上負有顧問的職責，在社會福利以及口糧分配上負有管理的職責。

「目前食糧是一個棘手的问题，」查瓦斯基說。「過去四個月中間蘇聯和紅軍一直在養活整個西利亞。在波蘭的新收成以及運煤車到達之後，西利亞將會有助於平衡波蘭的全國預算。我們不但有足夠波蘭工業之用的煤，並且還可以賣給迫切需要煤的歐洲。瑞典已經在談判！但是我們第一次出口的煤，將是給莫斯科和列車格勒的不收費的禮物！」

我們開車經過以前德屬西利亞的成熟了的裸麥，在這裏，從東部運來的波蘭農民已經正在土地上安頓下來，以前的農民都被德國人趕到西邊去了。我們遇見作家，詩人，古代首都克拉考夫的大學校裏的人物，在克拉考夫那些古代的教堂，歷史上的欄杆，甚至在那些狹窄的街道和市場上的和尚和尼姑，都好像從來也不知道這次的戰爭。

從那往北，我們乘飛機穿過陽光和雲雨，飛過棋盤式的土地，森林和城鎮——廣大的土地——最後盤旋在灰色的波羅的海上面，我們在那湖邊的機場上降落了，那裏飛揚着波蘭，美國，法國，蘇聯和英國的五種旗子。我們已經來到丹斯克海港了——爲世所熟知的名字是但澤，但是現在又恢復了這個古代的名稱，這是九九七年第一批到達這裏的波蘭基督徒所定的名字。

「丹斯克」的意思是「到丹麥去」。這以前是波蘭人進入丹麥海洋世界的入口，那時橫行一世的異教徒的海盜們把西自英倫三島，東至那夫郭若得的海岸全給掃蕩了。今天他們指給你看——波蘭人喜歡指給你看這些東西——離維斯杜拉河口不遠在奧利瓦的一座古老的石頭教堂，在那裏邊一張用拉丁文寫在牛皮紙上的文件傳達了羅馬教皇的祝禱，允許七個村庄免除了對國王或封建地主的一切捐稅，但是每星期得爲「丹斯克的碼頭」做三天的工作。

那只是開端。三個世紀之後，條頓的騎士來了，向東面伸張過去，於是波蘭爲了海洋的長期戰爭開始了。那一千年的戰爭到今天才得到勝利。但是古老的和近代的海港都在廢墟中間。當紅軍和波蘭軍進來的時候，希特勒動青年團的黨徒們放了火。

在焦黑的建築物中間，我看見一座四層樓的正面，仍然孤伶伶地站在灰燼中，在最高的一層有一條完全用石頭刻出來的莊嚴的船，帶着正向空中駛去的樣子。還是十六世紀的美麗的雕刻。

那時候在許多波羅的海國家中自由貿易的城市的基爾特，通過商會組織，聯合經商。附近姑著一座大的石門，被煙燻黑了但沒有被毀壞，上邊用拉丁文寫着：「經過這座門波蘭財富走到世界上去。」

那還在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候，那時英國剛剛開始她的航海業，商業還是一樁新鮮事物。許多世紀已經過去了，但在奧肯斯基的靈魂上，這故事還是年青的。是的，奧肯斯基，我在第一次旅程中所碰見的那位自阿富汗尼斯坦經盧布林而來的老朋友。他現在是這個聯合港口區省長了，這個區或包括維斯杜拉河口上的老丹斯克，沿海岸上去十四哩的新蓋尼亞，以及在這中間的若干小的海岸城鎮。

我們在左保的一座臨時的政府建築裏找到他，這是丹斯克和蓋尼亞中間的一座海濱遊息所。那位海港重建負責人正在解釋：「僅僅自丹斯克把殘餘的東西清走就需要一千萬輛卡車工作一天。但是首先我們必須集中精力開四個泊船所——兩個在丹斯克，兩個在蓋尼亞。德國剛好在主要的水道上沉下若干戰艦，裏面藏滿了炸藥。但使我們最擔心的是六十四個還未找出來的磁性水雷——這些大野戰可以幾個月沒有動靜，然後當一隻船走過的時候爆炸了。」

聽着這些擔心的事情，我們來到了奧肯斯基的辦公室。於是奧肯斯基進來了，發現我們正在

等着他；二十五個人排成長三列，像一班學生正在等着教授。

他臉紅了。他弄得手足無措。他的敏感的手指搔過他的白色頭髮。最後他請求道：「你們這位需要什麼？你們一定討厭廢墟了吧。我們去海邊好不好！」

於是我們穿過這個憔悴的供遊息的小城鎮，有些記者在說，「多麼可笑的一個老傢伙！」我覺得心痛，因為我喜歡奧肯斯基，並且我願意他成功。我們在一座大堤上走了很遠，以前從卡爾諾來的賭徒們時常在這裏散步。他們說在皮爾蘇斯基的時代，這是波羅的海最好的賭場；但是那卡爾諾旅館現在是一個軍醫院了。不管怎樣，舞還在，天也還在，充滿了北方日落時的金光。並且一條長的海岸線在金光下呈深綠色。

「在那後面就是丹斯克」——奧肯斯基指着南邊籠罩着那廢墟的暮色——「我們那深入波蘭內地的老河港。那邊就是蘇尼亞——他指着西北落日的地方——」當德國人佔領了丹斯克的時候，我們在那裏建了一個新港，用一條鐵路穿過那滑稽的波蘭走廊。但這一切實際上只是一個大港。「他一面歎氣一面加上道：「這七百年來我們做了一場惡夢。」

在這個緯度上夏天的陽光停留得很久。當港口工程師拿來一張紙交給奧肯斯基的時候，一定是在半個鐘頭之後了。他念了一下，於是笑了，跟着他帶着一種新的莊嚴轉向我們。

「因為今天我們的港口開放了，一列車的西利西亞的煤在今天早晨到達了——這是西利西亞的礦工們送給英列寧格勒的禮物。並且港口主任剛剛報告說一條蘇聯的船平安進入丹斯克港，而兩條瑞典的船正在外面等著。」

「這以前我不能告訴你們，」他道歉道：「因為我也不知道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我正在擔心那些水雷。你看，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海港，但是要確知它是一個安全的海港——這邊需要相當的時間。」

「但是現在我們在東面有我們的新朋友蘇聯，沒有他們我們永遠也不會回來的。並且現在我們又重新被那些西方的老朋友們所承認了。不光是將有一個大港，而且還將有一條自維斯杜拉河到德尼伯河的龐大的內地水道。我們要重建許多運河，公路和鐵路來適應我們的新聯繫：到莫斯科，到列寧格勒，到基輔，到巴黎，以及到西方的許多城市的道路。」

「波蘭，」當我們轉向暗下去的海岸的時候，他說道：「正住在世界的中心，」我想起四千年以前是那古老的中國，第一次稱自己為「中間的王國」。但是我沒有提醒奧肯斯基，因為對每一個人，他的祖國都應該是世界上「中間的王國」。

波蘭看起來真的是一個相當的中心。感謝土地改革，全波蘭五分之一的土地被重分過，並且波蘭已經成爲一個農民自己已有土地可耕的國家。感謝紅軍的戰略，波蘭在歐洲的中心有了她的煤炭和鋼鐵的王國完好無損——比戰前所有的工業還要巨大。感謝蘇聯的支持和西方同盟國的同意，波蘭很快就會有波羅的海最大的海港，與她的內河水路連接了起來。

在我們回到華沙以後，我們發現莫拉夫斯基總理比我從前所見的更增加了信心。在我們旅行的這短短的一個禮拜中間，十一個國家已經承認了他的政府。他告訴我們紅軍正在不斷地撤退，並且實際上將近有五百萬在國外波蘭人全都要回來。「我們一定要取得我們的收成，帶回來我們分散在各地的人民，並且舉行我們全國的大選。」

就今天任何一個國家所能達到的獨立性而言，就波蘭人所能完成並利用的財富，民主，以及政治口號中的所有其他詞句而言，似乎波蘭在她的歷史上第一次有機會來得到一個收支十分平衡的經濟。這將需要大量的勞力，但波蘭農民知道勞動。這將需要很多的計劃，但是什麼時候波蘭人會缺乏過計劃呢？這將需要愛國的熱誠，但波蘭素以愛國而聞名。

這也將需要波蘭人在歷史上所從未表現過的團結，現在他們能夠完成這一點嗎？
機會正在那裏等待着——它是以極大的代價所換來的。